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第二五期

目錄

- 1 應用ADDIE模式研發兒童情緒教育方案及其成效評估之研究

劉若蓓、涂妙如

- 45 歷經藥癮母單親養育之女兒的成長逆境與其影響：以一位用毒青少年為例

鄭青玫

- 80 父母衝突對青少年人際問題之影響：人際環狀模型的應用

劉蓉果

【學術活動紀實－2024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特邀演講】

- 122 湯玲玲教授特邀演講「The Future of Seniors in the Family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Care」學術活動紀實

林如萍、余佳玟、陳怡君

- 131 Janet F. Werker教授特邀演講「Perceptu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學術活動紀實

楊雯煊、周姍姍、王馨敏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

2024 年第 25 期

主 編 王 馨 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副 主 編 周 麗 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編輯委員 吳 志 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吳 齊 殷 (中央研究院)
利 翠 珊 (私立輔仁大學)
沈 瓊 桃 (國立臺灣大學)
周 玉 慧 (中央研究院)
李 輝 (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
林 如 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唐 先 梅 (國立空中大學)
張 鑑 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郭李宗文 (國立臺東大學)
程 景 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楊 金 寶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劉 惠 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賴 文 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蕭 英 玲 (私立輔仁大學)
聶 西 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名依姓氏筆畫排序)

助理編輯 林亞寧

附 啓

-
- 1.本學報原名「家政教育學報」，創刊於 1998 年。
 - 2.本學報自 2006 年起（第 8 期）改名為「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
 - 3.本學報投稿及審核網頁：<http://ojs.lib.ntnu.edu.tw/index.php/hdfs>
 - 4.本學報電子期刊網頁：
http://da.lib.ntnu.edu.tw/ntnuir/ug-9.jsp?xsd_name=ir_dtd&handle=CE3498B5-DC8A-BB3C-FEA1-9E5C2FCBBB27
-

(工本費每冊新臺幣 200 元整)

應用ADDIE模式研發兒童情緒教育方案及其成效評估之研究

劉若蓓

台灣家庭教育推展協會

涂妙如*

天主教輔仁大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

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研發一套適合國小低年級兒童之情緒教育方案，並以準實驗研究法進行評估，瞭解此方案對國小低年級兒童情緒能力的效應。本研究應用 ADDIE 模式研發情緒教育方案，並經實務專家審查。成效評估部分，邀約國小低年級兒童進行入班實作，實驗組學童實施本研究研發之情緒教育方案，控制組學童實施繪本品格故事課程，研究者於實施介入方案前後均邀請受試兒童（實驗組計 41 位，含 15 位男童與 26 位女童；控制組計 31 位，含 14 位男童與 17 位女童）家長填答簡淑真與郭李宗文（2006）編製之「3-6 歲幼兒情緒能力發展量表（家長版）」，以了解兒童情緒能力前後測的表現情形。本研究所獲結果如下：1.完成研發適合國小低年級兒童之情緒教育方案，內容包含情緒能力之「覺察與辨識」、「理解」、「表達」與「調節」等四個構面，每一構面各設計三個單元活動，加上相見歡與課程總複習共計 14 個單元；此方案並獲得國小低年級班級教師高度肯定。2.實驗組兒童「情緒能力」量表總分與四個構面分數，前後測皆達顯著差異；而控制組則無顯著差異。3.本研究亦發現此情緒教育方案對男童較具顯著成效。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以供教育實務應用及未來研究參考。

關鍵詞：ADDIE 模式、情緒能力、情緒教育方案、國小低年級兒童

*本篇通訊作者：涂妙如，通訊方式：081429@mail.fju.edu.tw。

壹、緒論

情緒能力對個人的學習（Ashdown & Bernard, 2012；Housman et al., 2018；Thomas & Allen, 2021）、人際與家庭的互動（許仲余等人，2014；簡淑真，2001；Chernyshenko et al., 2018；Zulfadil et al., 2020），抑或職場表現（Hwa & Amin, 2016），均為非常重要的核心能力，也是個體未來自我調節的重要基礎（Housman et al., 2018）。穩定的情緒對個人健康與適應能力更是重要指標（葉在庭，2011；Jones et al., 2017；Wilding & Claridge, 2016）。足見情緒能力的重要性，也是本研究主要關切的議題。

情緒教育主要目標為培養兒童處理情緒的能力，幫助兒童認識自己的特質，能適切且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情緒和真正的想法，在人際關係中瞭解與同理他人的情緒、感受及需要，進而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彼此互助合作，同時也能在現實生活中靈活地應對當下的情況、解決問題和做出有效的情緒調節策略，以達較佳的生活適應（Bar-On, 2006；Mayer et al., 2008）。研究顯示，學校教育提供持續且有效的情緒教育，能使兒童獲得以及發展重要的情緒能力（Elias, 2003；Low et al., 2019；Mahoney & Weissberg, 2018；Wu et al., 2022），此為本研究主要動機之一。

從國際視角來看，美國於 1994 年由 Goleman 和一群專家學者成立總部設在美國芝加哥伊利諾大學的「學業、社會情緒能力學習協同機構」（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CASEL），二十多年來致力提升兒童的社會與情緒能力，提供有關情緒教育方案與實務經驗的教育、研究及決策，以促進兒童福祉（引自 CASEL 官方網站，2023）。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則於 2002 年向全球 140 個教育單位，發佈社會情緒學習課程實施原則（Elias, 2003）。在歐洲方面，馬爾他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alta）和歐洲社會情緒能力組織（European Network for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ENSEC）於 2007 年開始合作國際情緒教育雜誌（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Emotion Education, IJEE）推動有實證研究並有效預防介入的情緒教育方案，幫助歐洲兒童社會情緒能力發展（引自馬爾他大學官方網站）。

而我國學校中的情緒教育早期多以輔導的角度來處理兒童的情緒問題（詹棟樑，1971），而後以潛在的方式融入學校教育，如營造合宜的學校環境設計、調整教師的態度等，至於課程方面早年僅於健康教育中有一課提及「認識自己」稍有論述（翁世雄，1996），之後以道德教育（張碧雲，2000）及課程（如國語課）融入方式進行情緒教育（唐淑華、吳盈瑩，2001）。可見過往在學校教育中，情緒教育多處於隱身的角色。鑒於近年社會對情緒教育日益看重，我國教育體系遂逐步地將情緒教育內涵納入各階段的課程綱要之中。最早修訂的幼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於擬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階段即將情緒領域正式納入教育範疇（幸曼玲等人，2015；教育部，2012），成為最早將情緒教育明訂於課程大綱中的教育階段。學童教育階段則於修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也要求將情緒教育融入各科，以培養學童情緒素養（教育部，2014）。而家庭教育方面，教育部於 2020 年 6 月修訂家庭教育範圍時，新增「情緒教育：指增進家人互動之情緒覺察、表達與管理之教育活動及服務」（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2020），強調家庭教育的範圍須涵蓋情緒教育。顯見近年情緒教育已成為國內教育體系與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內容。然而對應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內涵的更新，Wilkinson 與 Kao（2019）訪談了 27 位臺灣幼兒教師，發現臺灣幼兒教師並未將教導幼兒社會情緒發展視為重要的議題與自己的責任，研究人員指出實在需要優先透過職前教育與在職教育來強化幼兒教育師資對於情緒教育的看重與應用。因此，目前還需持續投入心力研發具體可行的情緒教育方案，方能幫助教師有效引導兒童發展情緒能力，達到促進兒童身心健康、減少行為問題的目標，此為本研究之主要動機之二。依據神經科學和兒童發展的研究指出，0-6 歲是發展覺察與辨識、理解、表達與調節等情緒能力的敏感時期（Housman et al., 2018）。Saltali 與 Deniz（2010）進一步指出 4-8 歲是學習辨識情緒線索、瞭解情緒的原因與影響，以及合宜行為表現的最佳時機，同時也是情緒教育介入的最佳階段。透過家庭與學校教育，可幫助兒童學習情緒能力，不僅有助於學業表現，對兒童未來福祉均有很大助益（謝曼盈、潘靖瑛，2019；Mahoney & Weissberg, 2018）。考量個體的發展與目前正式學校教育開始於 6 足歲，故本研究以 6-8 歲兒童為研究對象，採用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 design, ID）中最簡易且普遍用於描述系統教學開發方法的「ADDIE 模式」[Analysis, Design,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林曜聖，2022；Peterson, 2003），設計本研究之情緒教育方案，研發一套適合國小

一至二年級學童參與之情緒教育方案，並了解此方案的效應。

另外，有關情緒能力的發展亦有研究指出學前階段男女童的發展具差異性，女童表現較佳的利社會行為，男童則於施測初期出現較多情緒困難，但相較女童，男童的進步較多（McTaggart et al., 2022）。Bajgar 等人（2005）以 10-11 歲兒童為研究對象的結果也指出情緒表達與情緒理解之情緒意識具性別差異性，女童優於男童。故本研究亦探究情緒教育對於男女童之效應。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為設計一套適合國小低年級學童的情緒教育方案，並探討此情緒方案於國小低年級兒童實施後，其情緒能力（覺察與辨識、表達、理解、調節）之表現情形，及了解不同性別學童的學習成效。

貳、文獻探討

一、情緒能力的重要性與內涵

情緒能力（Emotional Competence）是指在引發情緒感受的人際互動中，個體覺察自己和他人的感受與情緒，有目的且完整地表達情緒，辨識與理解不同的情緒，並思考與反思，在必要時調節情緒的表達與經驗自我效能展現的能力（Denham et al., 2016；Mayer & Salovey, 1997）。情緒能力是動態的，是個體對特定行為的判斷，在引發情緒的當下，個體管理情緒的有效技能（Saarni, 1999）。研究指出情緒能力對兒童社會關係和行為的良好發展具影響力，並指出兒童時期是獲得情緒能力的最佳時期，學校機構提供必要的支持性教育，可協助兒童發展重要的情緒能力（Saltali & Deniz, 2010；Wu et al., 2022）。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5）指出個體的情緒能力與社交能力、學業成就、語言、認知、生理發展、身體健康以及行為調節密切相關。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和國際成人能力評量（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PIAAC）中涵蓋愈來愈多的社會情緒能力，顯示這些能力與重要的生活表現有關（Chernyshenko et al., 2018）。情緒能力有助於兒童表現利社會行為、發展友誼

以及對衝突做出適當反應，幫助兒童在學習上更集中注意力並能更聚焦在有興趣的事物上，以充分發展其能力（Gershon & Pellitteri, 2018；Havighurst et al., 2013；Meher et al., 2021）。

有關情緒能力的內涵，Goleman（1995）提出情緒能力包含下列五個面向：1.認識自身情緒的能力，覺察事件發生所引發的情緒，是發展良好情緒能力的基礎；2.妥善管理情緒的能力；3.自我激勵；4.認知他人的情緒（有同理心）；5.人際關係的管理。而 Mayer 與 Salovey 於 1997 年修訂情緒智力的內涵，包含四個能力：1. 準確的覺察、評估並表達自己或他人情緒的能力-學習辨識自己和他人的情緒，並發展辨識複雜情緒、瞭解他人情緒反應、能適切回應，且能覺察他人需要，具備同理的能力；2.情緒促進思考能力，不同類型情緒可使人有多元觀點的思考；3.瞭解、分析及運用情緒知識的能力，瞭解情緒發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運用策略調節情緒；4.調節情緒以促進情緒和智力成長的能力，覺察與管理自己與他人的情緒。Saarni（1999）進一步將情緒能力分為八個向度：1.覺察自己情緒狀態；2.辨識他人情緒；3.符合社會規範，適當的表達自己情緒；4.同理他人情緒；5.理解內在情緒和外在表現間可能存在不一致；6.運用策略調節負向的情緒；7.理解情緒如何影響關係；8.情緒的自我效能。綜合 Goleman、Mayer、Salovey 和 Saarni 等學者提出的情緒能力內涵，同時納入《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之情緒領域內容（教育部，2017）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學習指標（教育部，2014）。本研究之情緒能力包含情緒覺察與辨識、情緒理解、情緒表達與情緒調節等四個面向，茲整理如下表 1，以下分述之。

表 1
各學者情緒能力內涵之整理表

	Goleman(1995)	Mayer 與 Salovey(1997)	Saarni(1999)
情緒覺察與辨識	• 認識自身情緒的能力	• 準確的覺察、評估自己或他人情緒的能力	• 辨識自己的情緒狀態 • 辨別他人的情緒
情緒理解	• 認知他人的情緒 • 人際關係的管理	• 情緒促進思考的能力 • 瞭解、分析情緒及運用情緒知識的能力	• 同理他人的情緒 • 理解內在情緒和外在表現之間可能存在不一致 • 理解情緒如何影響關係

（續下頁）

表 1

各學者情緒能力內涵之整理表 (續)

	Goleman(1995)	Mayer 與 Salovey(1997)	Saarni(1999)
情緒表達	• 認知他人的情緒 (能接納他人對情緒的 表達方式)	• 準確的表達自己或他人 情緒的能力	• 符合社會規範，適當表 達自己的情緒
情緒調節	• 妥善管理情緒 • 自我激勵	• 調節情緒以促進情緒和 智力成長的能力	• 運用策略調節負面情緒 • 情緒的自我效能

(一) 情緒覺察與辨識 (Emotional Awareness)

情緒覺察與辨識是指個體在刺激發生當下或是在事件發生後，能覺察與辨識自己在這刺激或事件上有甚麼狀態和產生情緒類型(教育部，2017)。個體的情緒乃受到事件刺激而引發一系列行為和心理反應(簡淑真，2001)。4至8歲是兒童學習辨識情緒線索、瞭解情緒產生原因和影響，以及行為表現等情緒能力發展的最佳時期(Saltali & Deniz, 2010)。兒童經由成熟與學習，情緒覺察與辨識能力會逐漸發展，從嬰兒用哭表達感受與需求，並與成人的回應產生連結，漸漸地，當嬰兒哭時，照顧者回應並滿足嬰兒的需求，嬰兒的大腦即會連結這時的情緒感受。2-5歲的兒童已知道哪些事情會引起基本情緒反應，如喜、怒、哀、樂，以及分辨哪些情緒是負向的，且會發現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同時感受一種以上的情緒(如既興奮又害怕)；4-6歲兒童情緒覺察與表達更加豐富，能體驗到複雜情緒(如孤單、忌妒)，且能清楚描述情緒；7-8歲時，可充分理解他人的情緒(翟敏如，2012；簡淑真，2001；Saltali & Deniz, 2010)。

依照個體處理情緒的過程與過去研究結果顯示，情緒覺察與辨識是情緒表達、理解與調節的基礎(Boden & Tompson, 2015；Gross, 2015; Penza-Clyve & Zeman, 2002；Van Beveren et al., 2019)。這部分的教學活動設計可藉由不同的媒介，引導兒童觀察自己或他人的情緒反應，進而判斷情緒的狀態和種類，以促進兒童的情緒覺察與辨識能力(教育部，2017)。

(二) 情緒理解 (Emotional Reasoning)

情緒理解是指個體透過先前的經歷瞭解哪些事件將產生哪種情緒，也就是瞭解情緒來源與原因，以及對此事件的想法，並接納、尊重每個人的情緒與想

法是獨特的（教育部，2017）。兒童期是情緒理解能力發展的重要時期，兒童透過外在事件的線索，依據過去經驗做情緒推論，理解情境原因、記憶線索、欲求、信念和道德規範在情緒中的作用，並且理解表面情緒和真實情緒間的區別，以及情緒是可隱藏的，不同的情緒或是對立的情緒是可以並存的（周育如、黃迺毓，2011；Pons & Harris, 2005）。

情緒理解很重要的部分是瞭解情緒的來源及所產生的結果，以及情緒造成的影響為何。Havighurst 等人指出（2015）出現問題行為與兒童較差的情緒理解能力及情緒調節能力有關。在同儕人際互動中，兒童的情緒理解能力可幫助其瞭解自己和他人情緒，以及瞭解情緒的前因後果，如此可以避免產生衝突或誤解他人情緒，進而使兒童有佳的人際關係。在人際關係中理解或誤解他人的情緒會造成對方正向或負向的反應。例如，當兒童誤解感到悲傷情緒的朋友，並對他做出生氣反應時，他們的關係就會產生負面的影響（Finlon et al., 2015）。設計此部分教學活動時，將兒童的生活經驗轉為情境狀況，與兒童討論情緒產生的可能原因，並引導兒童運用同理心，以利社會行為與同儕互動並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提升兒童情緒理解能力。

（三）情緒表達（Emotional Expressing）

情緒表達是指個體學習以符合所處文化的社會規範以及期望，適宜地依情況與角色，透過臉部表情、肢體動作/姿勢、聲調或語彙等非口語或口語方式來表達情緒（簡淑貞，2001）。然而最初的情緒表達是非常個人的、直接的、隨意的，它是未經過情緒理解與情緒調節過程即直接表達（教育部，2017）。適當的情緒表達以及準確辨識他人非語言互動的情緒表達，對兒童的社會能力發展非常重要（Prosen & Smrtnik Vitulic, 2018）。研究顯示情緒表達力強的兒童，能夠很容易地交朋友，也決定了人際互動的品質，進而能保持長期良好的人際關係（許仲余等人，2014）。相反的，有行為問題的兒童則可能與缺乏適當的情緒表達能力有關（Kromm et al., 2015）。因此，兒童隨著成長，經由學習增加其情緒理解和調節能力，情緒表達可慢慢進展到符合社會文化的期待（教育部，2017）。

有關情緒表達的教學活動設計透過提供有趣的材料、真誠與合宜的示範，並與兒童建立良好與安全的關係，在兒童覺察與辨識自己的情緒後，引導他們以適當方式表達，並尊重兒童的情緒經歷，鼓勵他們表現正向情緒，接納負向

情緒的流露，用適切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緒。

（四）情緒調節（Emotional Regulation）

情緒調節能力是指一系列涉及情緒產生，個體學習運用各種策略來改變負向情緒或過度激動情緒的能力（教育部，2017）。情緒調節能力亦常被理解為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能力（Housman et al., 2018）。情緒調節涉及情緒狀態的發生、程度和持續時間，可能是有意或自發的，而調節的目標是上調正向情緒和下調負向情緒（Pat-Horenczyk et al., 2015）。能夠理解和調節情緒並在入學時表現出正向情緒的兒童，更有可能與同儕和教師建立正向以及支持性的人際關係，能更多地參與學習，並取得較佳的學習成就（Denham et al., 2016）。

關於兒童情緒調節的策略，Gershon 與 Pellitteri（2018）指出可運用兒童認知的注意力分散（Cognitive distraction）、行為的注意力分散（Behavioral distraction）和情境修復（Situation repair）作為情緒調節的有效策略。另外，Rao 與 Gibson（2019）發現學齡兒童最常使用的三個情緒調節策略為 1.目標替代（Goal substitution），選擇一個替代性的目標來代替原先所無法達到的目標；2.目標恢復（Goal reinstatement），採取行動實現最初始的目標；以及 3.後設認知策略（Metacognitive strategies），改變個體的想法和目標。所以，情緒調節的教學活動設計可運用各種有效的策略或方法，讓兒童改變想法或下調負向情緒，例如：和朋友玩、深呼吸、等待、放棄自我的堅持及找到事情的真相等策略來調節情緒（教育部，2017）。

Izard 等人（2004）指出情緒能力不佳是精神病理學發展的早期風險因子，影響兒童人際互動、情緒和行為發展，對於將來人際關係、外顯行為、自我調節和學業成就均有重要影響。因此，有愈來愈多的情緒教育方案，透過「覺察與辨識」自己與他人的情緒，「理解」情緒的發生是事出有因，然後以適切方式「表達」自己或他人的情緒，並尋求多樣性「調節」情緒策略等四個面向的教育內涵，來改善兒童人際、情緒和行為問題，增加保護因子，提升兒童情緒能力、促進兒童心理健康、培養良好人際關係，以增進兒童未來福祉（翟敏如，2012；Hughes & Cline, 2015；Wu et al., 2022）。

二、情緒教育的內涵

吳英璋（2001）指出情緒教育是協助兒童敏銳覺察當下的情緒，並知道引發情緒的原因，進而反思情緒出現的來源。Bar-On（2006）進一步指出情緒教育主要在教導兒童能有效地覺察和表達自己的情緒、理解他人並與之互動，以及處理日常需求之能力。而 Gunter 等人（2012）則強調情緒教育須能提供運用自我調節策略，靈活地應對日常中的挑戰和壓力之能力。林建福（2010）指出情緒教育是一個活動歷程，協助兒童對情緒有敏銳的覺察與辨識，引發適當的動機做適宜的表達，進而更加瞭解自己，建立正向與積極的自我概念。

綜上所述，本研究定義「情緒教育」為：透過活動歷程，幫助兒童認識自己的特質；引導兒童對自己或他人的情緒能敏銳覺察與辨識；能知道情緒出現的原因或產生的來源；能適切正向積極地表達自己的情緒和真正的想法；在人際關係中瞭解與同理他人的情緒、感受及需要，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在現實生活中能靈活地應對當下情況、解決問題和做出有效情緒調節策略與方法，進而建立正向與積極的自我概念。

此外，研究者整理近 10 年（2009-2020 年）國內有關 4-8 歲情緒教育研究的文獻，發現採用質性研究的情緒教育方案，多半使用行動研究法，並以自己任教園所或班級做為研究對象，探討實際教學現場的真正問題，並協助研究對象學習問題解決或改善困境等，如李欣蓓與蘇育令（2013）以及其他 24 篇的學位論文。採量化研究者，多半使用準實驗研究法，以研究工具進行前後測評量，對課程成效做出解釋，如梁珀華與陳崇慧（2011）、翟敏如（2012）、郭秀霞（2013）、陳祖昱等人（2016）以及常雅珍等人（2017）的研究。研究結果指出透過情緒教育介入活動，兒童情緒能力均有進步，兒童能自我肯定且表現正向積極。足見推動情緒教育確實能有具體成效。

三、情緒教育方案的設計與評估

（一）情緒教育方案設計

國外情緒教育方案多由政策長期關注並由學術單位成立的機構長期推動，且以長期實證研究為基礎研發情緒教育方案（White & Walker, 2018）。如總部設立於美國芝加哥伊利諾大學的「學業、社會情緒能力學習協同機構」（CASEL），此機構的使命是建立有效的社會情緒學習，使之成為從幼兒園到

高中教育的重要部分(CASEL, 2023)。CASEL 審查了 80 個符合基本標準的「社會情緒能力學習」SEL 課程，並確定了 22 個優質且有效的實證研究課程，提供教學者依據學生行為、學校和社區需求選擇教育方案(CASEL, 2003)。而位於美國華盛頓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由 28 名傑出科學家組成的國家社會、情感和學術發展委員會(NCESAD)也基於實證研究的基礎，極力支持將社會和情緒學習與學術指導互相結合，並指出社會、情緒和認知領域在學習過程中是相互關聯的，為決策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個可實現教育兒童學習社會與情緒，以提升學業成就的方案(Jones et al., 2017)。

「學業、社會情緒能力學習協同機構」(CASEL)在「2013 CASEL 指南」(CASEL, 2013)中提出有效的社會情緒學習方案-幼兒園與小學版，乃依照以下三個目標進行：1.精心設計的課程方案，有系統地提升兒童情緒能力，並提供時間、練習機會以及長期的課程規劃；2.提供高品質的師培，包括初階培訓與持續教育，以確保良好的教學品質；3.以實證為本的研究，至少含一個詳細進行的評估，證明對兒童的行為或學習成就有積極影響；以及以情緒能力為基礎的五個核心能力，包含：1.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2.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3.社會覺察(Social awareness)；4.人際關係技巧(Relationship skills)；以及 5.負責任的決定(Responsible decision making)。

研究者參考 CASEL (2013) 指南中有效的社會情緒學習方案_幼兒園與國小版，其中七個適合幼兒與學童的情緒教育方案，包含「AI's Pals」、「HighScope Educational Approach for preschool」、「I Can Problem Solve」、「The Incredible Years Series」、「PATHS」、「Peace Works: Peacemaking Skills for Little Kids」與「Tools of the Mind」。發現 CASEL 推薦給幼兒與低年級學童的有效情緒教育方案，平均每學年授課堂數約 40-83 堂不等；每堂課時間長度不等，含 10-15 分鐘、20 分鐘或是 45 分鐘；每週課程數則依年級而有不同規劃。至於教學方式，包含：示範故事、玩偶、戲劇、角色扮演、影片、遊戲、情緒教練、小組討論對話、分享等，以及與不同學術領域整合的課程，這些課程都強調提供參與者練習情緒技巧的機會。

接續研究者以電子資料庫(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用「情緒教育」為關鍵字，搜尋國內近十年情緒教育方案之相關研究，並以低年級學童為主要研究對象，篩選出 10 篇研究，然較多為學位論文。發現國內低年級學童之情緒教育方案多為個別因實際教學需要，依「情緒覺察與辨識」、「情緒表達」、

「情緒理解」與「情緒調節」等不同情緒能力面向作為課程架構來設計情緒教育方案。探討的議題較多為情緒教育方案實施過程對兒童情緒能力的影響。情緒教育方案平均每學期授課週數為 10-15 週，活動次數為 12-30 次，一週 1 至 2 次活動，每次活動時間長度為 40-80 分鐘。而情緒主題涵蓋情緒能力四個構面者只有二篇（陳亞穎，2013；鄭靜育，2013），研究數量較少。教學策略最常見的是繪本教學，再透過討論分享進行活動（尤慧美，2017；林美玲，2014；邱宇晴，2020；馬文倩，2018；郭秀霞，2013；曾明鑫，2016；葉姿伶，2011；謝秀媚，2010；謝佳純，2019）。其次為體驗活動（馬文倩，2018；陳亞穎，2013；謝佳純，2019）。除此之外，還有運用「我」訊息（陳亞穎，2013；葉姿伶，2011）、理情 ABC 理論（馬文倩，2018；葉姿伶，2011），以及運用多元學習活動的設計，如藝術活動（邱宇晴，2020）、角色扮演與影片教學（謝秀媚，2010）等教學策略，課程設計皆為單元教學。且上述研究結果多半建議課程設計應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運用多元教學活動增加學生學習興趣，以及多提供學生技能練習機會，並做長期規劃，讓課程有充裕時間進行，更臻完善之教學成效。

基於上述情緒教育方案之探討，本研究設計之情緒教育方案，以情緒能力的四個面向（覺察與辨識、理解、表達、調節）為核心，同時包含 Lawson 等人（2019）提出的核心成分，社交技巧（social skill）、辨識自己與他人的情緒（identifying one's own and others' feelings）與行為適應技巧/放鬆（behavioral coping skills/relaxation），以及 Wu 等人（2022）提出的二個情緒關鍵能力，標明情緒（emotional labeling）與情緒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 of emotions）。同時結合先前研究較廣泛使用的教學策略，包含情緒繪本教學、角色扮演、影片、體驗活動、我訊息、情境狀況學習、理情 ABC 理論技巧、小組討論分享等方式。並於共讀繪本時運用對話式情緒言談技巧「PEER」步驟與「CROWD」提示方法，引導學童探究文本主角的情緒狀態、想法，培養學童情緒能力（周育如、黃迺毓，2010；翟敏如，2013；翟敏如，2014a；翟敏如，2014b；顏嘉辰、翟敏如，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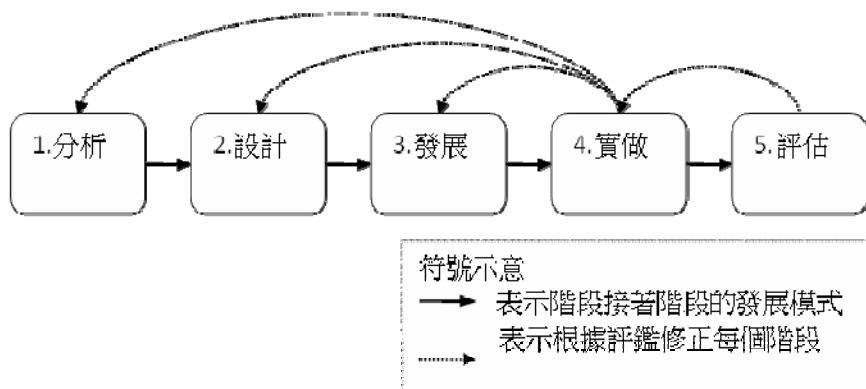
此外，由國外的情緒教育方案中看出方案設計課程堂數與每週課程數均較為豐富，時間也具彈性。而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 Design, ID）是一種組織化、系統化的程序，提供方案規劃的藍圖（楊馥如，2009）。系統性的教學設計，在教學前須分析學習者需求、設定教學目標，接續設計有組織、循序漸進的有

效教學方案，每個程序是環環相扣依序發展，且根據評估修正每個階段的執行方式，易於應用和靈活處理（Durak & Atzai, 2016；Molenda, 2015）。

本研究考量情緒教育方案設計的完整性與可執行性，採用系統性教學設計中最簡易且普遍用於有系統地發展教學的方法-「ADDIE 模式」(林曜聖，2022；Peterson, 2003) 進行設計。「ADDIE 模式」(如圖 1 所示) 為一具有順序性、且也具迭代作用的教材開發模式，此模式已被許多研究證實為有助於教材發展或教學創新（陳奕璇，2022；陳惠珍，2022；盧秀琴、林毓哲，2018）。其模式包含五個階段：1.分析(Analysis)階段：瞭解教學目標與任務，進行需求分析、學習者分析、內容分析，決定教學的目的是要解決甚麼問題；2.設計（Design）階段，進行學習目標的設定、學習內容以及學習評估的設計，將分析的資料進行設計以產出指引教學發展的藍圖；3.發展（Development）階段，依據設計階段的結果，撰寫課程活動設計與發展評估工具；4.實施（Implementation）階段，應用所設計的教案進行教學活動、執行教學評估；5.評估（Evaluation）階段，進行形成性與總結性的評估，評估學習者學習成效以及課程設計品質(Molenda, 2015)。

圖 1

應用 ADDIE 模式發展兒童情緒教育方案



基於上述，本研究於分析（Analysis）階段，透過文獻蒐集瞭解情緒教育目標與重要性，並進行需求分析、學習者分析與內容分析；在設計（Design）階段，設定情緒教育的學習目標、學習內容及學習評估方式；在發展（Development）階段，依據設計階段的結果，撰寫情緒教育方案活動設計與發

展評估工具，並邀請專家審查；在實施（Implementation）階段，將設計之情緒教育方案於國小班級現場實做，並請協同教師與實驗組班級教師協助完成教學觀察評估；在評估（Evaluation）階段，完成形成性與總結性的評估（黃嘉雄，2004）。教學實施以單元教學為主，包含 1.「引起動機」引起學童學習動機與興趣；2.「發展活動」採用思考、練習、解決問題等活動，充份操作主要教學內容；3.「綜合活動」整理、發表、運用與評估主要教學內容等三階段。以環環相扣的系統思維創建有效教學，讓學習者有效地達到情緒教育方案的學習目標。

（二）情緒教育方案評估

Denham 等人（2016）指出對兒童任何的衡量有兩個原則：1.目的性（purposefulness）--根據其使用的目的，如評估兒童情緒能力或評估方案結果來設計或選擇評量；2.系統性（systematicity）--適齡的情緒能力發展任務，並為提升兒童情緒能力制定明確標準，如情緒能力定義。此標準決定了評估工具多元化的選擇。而多元評量則有專業多元、內涵多元、過程多元、方式多元（如紙筆測驗、實作量表、軼事紀錄、口語評量、檔案評量等）、人員多元及結果多元等特質（李坤崇，2002）。國外情緒教育方案的評估，包含使用觀察與測量學生行為評估的方案，如「AI's Pals」；使用自陳、觀察與測量學生行為評估的方案，如「HighScope Educational Approach for preschool」、「I Can Problem Solve」與「PATHS」；使用自陳評估的方案，如「The Incredible Years Series」；使用測量學生行為評估的方案，如「Peace Works: Peacemaking Skills for Little Kids」；使用自陳與測量學生行為評估的方案，如「Tools of the Mind」。且各情緒教育方案的評估結果均有具體成效，如減少問題行為的方案，「I Can Problem Solve」與「Tools of the Mind」；增加利社會行為與減少情緒困擾的方案，如「PATHS」；增加兒童利社會行為、減少問題行為和情緒困擾的方案，如「AI's Pals」；提高兒童學業成績、增加利社會行為、減少問題行為和情緒困擾的方案，如「High Scope Educational Approach for preschool」等。

國內低年級學童情緒教育方案的評估最常用是學習單（馬文倩，2018；湛靜宜，2017；黃薇芯，2015；謝佳純，2019），其他評估如前後測（林京穎，2018；蔡雅如，2013），使用情緒調節量表做前測（謝佳純，2019）；半結構式訪談，方案實施前後各訪談一次，相隔約 3 個月（馬文倩，2018；黃薇芯，2015）；觀察（馬文倩，2018；黃薇芯，2015；謝佳純，2019），以及回饋問

卷與教學紀錄與省思等。各情緒教育方案的成效，如減少負向情緒，增加正向情緒（黃薇芯，2015；蔡雅如，2013）；減少問題行為與情緒困擾（尤慧美，2017）；提升自我控制能力如自制力、自覺力、堅持性與延宕滿足（湛靜宜，2017）；情緒理解有顯著進步（林京穎，2018）；能運用策略正向應對生氣情緒（馬文倩，2018），以及提升情緒調節能力（謝佳純，2019）等。

CASEL 提出評估兒童情緒教育方案設計的適當性有下列四項標準：1.是否適合兒童的發展階段 2.精心設計的方案是否以課室教學為主。3.是否符合情緒能力的學習目標。4.是否能提供兒童練習技能的機會（CASEL, 2013）。此外，Hyson 與 Williams（2004）提出達成以情緒為中心的課程（Emotional-Centered Curriculum）目標需能「營造安全感的學習環境」、「協助兒童理解情緒」、「教師示範真誠與合宜的情緒行為」、「支持兒童調節情緒」、「辨識並尊重兒童情緒表達風格」和「讓學習與正向情緒（如產生好奇和快樂等）結為一體。學習評量則是幫助教學者清楚瞭解兒童的學習證據、評估學習成效並能真實回饋課程與教學對兒童學習的影響（陳紀萍，2018）。

綜合上述，本情緒方案的形成性評估包含學習單、情緒臉譜與情緒積木的實際操作、課堂上分享討論、口語報告、參與活動，觀察與教學觀察省思手札等多元、多次的評估。總結性評估則使用「幼兒情緒發展量表（家長版）」，邀請受試學童家長依據平日觀察填寫情緒量表。以期能研發出一套精簡的、有效的、容易學習與執行的情緒教育教材，作為學校教師進行情緒教育的參考教材。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應用 ADDIE 模式研發兒童情緒教育方案(請參見附錄二)，接續採用準實驗設計，包含實驗組與控制組，給予不同實驗處理（即情緒教育方案與品格教育繪本介入），了解情緒教育方案的成效。於教學過程中，以教學觀察評估表（附錄三）收集實驗組班級教師與協同教師的意見，以及研究者執行教學

後的教學省思札記（附錄四），作為修正本情緒教育方案之依據。

本研究配合受試學校彈性課程時間，實驗組實施研究者研發之兒童情緒教育方案，為期 13 週，每週一次，每次 40 分鐘；控制組實施研究者設計之品格故事課程，例如紙袋公主、拼拼湊湊的變色龍、勇敢的莎莎等，引導兒童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的感受與想法，一樣為期 13 週，每週一次，每次 40 分鐘（詳見附錄一），藉以探討低年級兒童接受不同實驗處理後，對兒童情緒能力的影響。兒童情緒能力表現：以簡淑真與郭李宗文（2006）編製的「幼兒情緒能力發展量表（家長版）」，邀請參與學童家長完成前後測分數代表之。前測量表於課程實施前一週發放，一週內回收；後測量表於課程實施後一週發放與回收。此量表包含四個構面，分別為：情緒覺察與辨識能力、情緒理解能力、情緒表達能力與情緒調節能力，符合本研究情緒教育方案設計之內容。

本研究設計之情緒教育方案包含四個教學面向，分別為「情緒覺察與辨識」、「情緒理解」、「情緒表達」與「情緒調節」，並涵蓋「自己」及「他人與環境」兩個學習面向。對照《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教育部，2014）與《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教育部，2017），本研究研發之兒童情緒教育方案，從「自己」的面向學習「覺察與辨識自己的情緒」、「理解自己情緒出現的原因」、「合宜地表達自己的情緒」、「運用策略調節自己的情緒」，再引導兒童擴大思考「他人與環境」面向的「覺察與辨識生活環境中他人和擬人化物件的情緒」、「理解生活環境中他人和擬人化物件情緒產生的原因」與「適當地表達生活環境中他人和擬人化物件的情緒」。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桃園市某國小低年級兒童為研究對象，原參與本研究計畫之班級數共計四班（含一年級與二年級，見表 1），均由研究者擔任教學者，並配搭三位助教進行情緒教育方案活動。排除家長填答前後測資料不完整者、無法確認前後測為同一人者，以及一年級控制組因家長參與研究意願不高使得該班無法進行實驗方案之人數後。以二年級計 41 位實驗組（男童 15 位、女童 26 位）與 31 位控制組（男童 14 位、女童 17 位）進行後續分析。本研究於情緒方案介入前，完成實驗組與控制組同質性考驗，結果顯示：二組學童之情緒能力總量表與各分量表皆未達顯著差異，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童的情緒能力於情緒教育

方案介入前無顯著差異。

表 2

實驗組與控制組參與人數摘要表

	(G1)實驗組	(G2-1)實驗組	(G2-2)實驗組	控制組
人數	31	30	32	31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二年級	二年級
學童性別	女 16、男 15	女 16、男 14	女 18、男 14	女 17、男 14
教學主教	研究者	研究者	研究者	研究者
教學助教	助教 A	助教 B	助教 C	助教 C
班導師	T1(年資 12 年)	T2(年資 14 年)	T3(年資 15 年)	T4

三、研究工具

(一) 幼兒情緒能力發展量表（家長版）

考量家長對於子女的了解應較學校班級老師更為深入與細緻，故本研究以簡淑真與郭李宗文（2006）編製之「3-6 歲幼兒情緒能力發展量表（家長版）」作為瞭解學童情緒能力之工具。該量表係依據「六歲幼兒情緒領域發展量表」（幸曼玲、簡淑真，2005）以及 Mayer 與 Salovey 提出之情緒智力理論為基礎進行題項編擬（林文婷等人，2008），分為四個分量表，包括：情緒覺察與辨識、情緒理解、情緒表達與情緒調節。題項之勾選，分為「未出現」、「需要提醒與協助才能做到」、「有時做到有時稍加提醒即可做到」、「可以自己完成」以及「未曾觀察到此表現」等五個選項，分為 1~4 計分。勾選「未出現」得 1 分、勾選「需要提醒與協助才能做到」得 2 分、勾選「有時做到有時稍加提醒即可做到」得 3 分、勾選「可以自己完成」得 4 分，至於勾選「未曾觀察到此表現」者仍計 1 分。故得分愈高，表示情緒能力愈佳。本量表係採用建構效度，先根據相關文獻與理論基礎進行題項編擬，再經多位專家學者審查，修正題項敘述建立專家效度。接續邀約 111 位幼兒母親進行題項試預，經統計考驗刪除不符合評估指標之題項後剩下 28 題，取得總量表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 係數為.86，表示「幼兒情緒能力發展量表（家長版）」乃具良好之內部一致性與穩定性，各分量表 Cronbach α 係數介於.55~.69，見下表 2（劉宜芳、郭李宗文，

2010)。基於研發此工具時適用於 3-6 歲兒童，而本研究受試兒童為 7-8 歲國小低年級學童，故於此工具正式使用前，除完成學者專家審查評估外，亦邀請低年級教師與低年級家長進行問卷合適性之檢視與評估。確認研究工具之合適性後，方進行正式量表之前後測。

表 3

幼兒情緒能力發展量表各構面之信度

因素名稱	題號	Cronbach α 係數
情緒察覺與辨識	1-6	.68
情緒理解	7-14	.69
情緒表達	15-22	.55
情緒調節	23-28	.68
幼兒情緒能力發展量表	1-28	.86

（二）兒童情緒教育方案教學觀察評估表

基於本研究目的之一乃研發適合兒童之情緒教育方案，為瞭解本情緒方案執行時的合適性，由協同助教與受試學童之班級教師使用研究者設計的觀察者評估表（附錄三），於活動時，觀察活動目標、活動前、中、後歷程以及結果與成效進行評估，提供方案設計與內容修正建議與回饋意見。

（三）教學觀察省思札記

研究者於每次情緒教育活動教學過程中觀察學生，以及活動結束後依據學生的反應、回饋或互動完成教學觀察省思札記（附錄四），以檢視教學活動歷程，作為改善與調整教案設計的參考。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本研究研發具學理基礎且符合幼兒園及國小課綱之兒童情緒教育方案

本研究應用 ADDIE 模式發展兒童情緒教育方案，於分析（Analysis）階段透過文獻蒐集與分析瞭解情緒教育目標，確認「兒童情緒教育方案」之教學目標符合情緒能力四個構面的內涵。於設計（Design）階段，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包含國小低年級的健康與體育領域、國語文領域、生活課程領域，以及《幼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情緒領域的四個能力與學習指標，設計本研究之兒童情緒教育方案教案架構，如下表 3。

表 4

本研究研發之兒童情緒教育方案課程大綱與幼小課綱對照表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 四項情緒領域能力與面向	本研究之兒童情緒 教育方案教案架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情緒能力相關的 學習領域	
		領域	第一階段學習內容
情-1-1 覺察與辨識自己的情緒	L01-L04 自己與他人的情緒 覺察與辨識	健康與體育	Fa-I-3 情緒體驗與分辨的方法。
情-1-2 覺察與辨識生活環境中他人和擬人化物件的情緒			
情-3-1 理解自己情緒出現的原因	L5、L7、L9 自己與對他人的情緒理解	國語文	1-I-3 能理解話語、詩歌、故事的訊息，有適切的表情跟肢體語言。
情-3-2 理解生活環境中他人和擬人化物件情緒產生的原因			2-I-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生活	6-I-1 覺察自己可能對生活中的人、事、物產生影響，學習調整情緒與行為。
			7-I-3 覺知他人的感受，體會他人的立場及學習體諒他人，並尊重和自己不同觀點的意見。
情-2-1 合宜地表達自己的情緒	L6、L8、L10 自己與對他人的情緒表達	國語文	1-I-3 能理解話語、詩歌、故事的訊息，有適切的表情跟肢體語言。
情-2-2 適當地表達生活環境中他人和擬人化物件的情緒			2-I-3 與他人交談時，能適當的提問、合宜的回答，並分享想法。
		生活	Bb-I-1 自我情感的表達。
			Bb-I-2 人際交流的情感。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的感受與想法。
			7-I-1 以對方能理解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續下頁)

表 4

本研究研發之兒童情緒教育方案課程大綱與幼小課綱對照表（續）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 四項情緒領域能力與面 向	本研究之兒童情緒 教育方案教案架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情緒能力相關的 學習領域	
		領域	第一階段學習內容
情-4-1 運用策略調節自 己的情緒	L11-L13 對自己的情緒調節	生活	D-I-2 情緒調整的學習

接續於發展（Development）階段，根據先前分析之情緒教育方案發展目標（Analysis）-涵蓋情緒能力四個面向，並配合設計階段的教案架構（Design），發展情緒教育方案之教案內容（Development）。本研究研發之教案於執行前，皆透過備課讀書會與三位資深教育志工討論，確認教案內容與教學方式；教案執行過程中（Implementation），除了三位資深教育志工擔任教學助教的教學觀察回饋外，亦邀請實驗組學童班級導師完成每一單元之教學觀察評估紀錄，給予教學回饋（Evaluation）。實驗組學童的三位班級導師均有超過 12 年以上的國小教師經歷。教育資深志工與班級老師均為本情緒教育方案之審查專家，提供具體、務實的修正建議。最後，再加入研究者與實驗組幼兒的課堂反應，作為調整本情緒教育方案之依據。故本研究研發之情緒教育方案，係應用「ADDIE 模式」逐步發展，並經實務專家審查與實際教學實作，深具教學應用價值。

二、實驗組與控制組實驗介入前之情緒能力分析

首先評估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童於方案進行前的情緒能力，作為了解實驗介入的效果。從表 4 可知，實驗組與控制組之獨立樣本 t 檢定，情緒能力總量表與情緒能力分量表（ $t_{\text{總表}}=.04, p=.97>.05$ ； $t_{\text{情緒覺察與辨識}}=.14, p=.89>.05$ ； $t_{\text{情緒理解}}=.11, p=.91>.05$ ； $t_{\text{情緒表達}}=.04, p=.97>.05$ ； $t_{\text{情緒調節}}=.23, p=.98>.05$ ）皆未達顯著差異。表示本研究之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情緒教育方案介入前其情緒能力並無差異，處於相同的起始點。

表 5

實驗組與控制組前測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實驗組($N=41$)		控制組($N=31$)		t 值	p 值
	M	SD	M	SD		
情緒能力總量表	3.56	.36	3.55	.30	.04	.97
情緒覺察與辨識能力分量表	3.72	.34	3.71	.33	.14	.89
情緒理解能力分量表	3.53	.42	3.52	.42	.11	.91
情緒表達能力分量表	3.61	.40	3.61	.40	.04	.97
情緒調節能力分量表	3.36	.53	3.35	.51	.23	.98

二、實驗組與控制組前後測之差異分析

接續分析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童在「幼兒情緒能力發展量表」之總量表與各分量表前後測得分之單題平均數和標準差。由表 5 得知，實驗組學生情緒能力總量表前測平均數為 3.56，後測平均數為 3.73，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 ($t=-3.08$, $p<.05$) 達顯著差異，顯示實驗介入具有成效。此外，各分量表的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如下：「情緒覺察與辨識」能力分量表的前測平均數為 3.72，後測平均數為 3.82 ($t=-2.27$, $p<.05$)，達顯著水準；「情緒理解」能力分量表的前測平均數為 3.53，後測平均數為 3.75 ($t=-3.55$, $p<.05$)，達顯著水準；「情緒表達」能力分量表的前測平均數為 3.61，後測平均數為 3.79 ($t=-3.14$, $p<.05$)，達顯著水準；「情緒調節」能力的前測平均數為 3.36，後測平均數為 3.58 ($t=-3.23$, $p<.05$)，達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實驗組的學生在 13 週的「兒童情緒教育方案」介入後，情緒能力總分與四個構面分數皆達顯著差異，後測平均數都明顯優於前測平均數。表示情緒教育方案介入具有顯著成效，而控制組前後測分數均未達顯著差異。

表 6

實驗組與控制組前測、後測得分之描述性資料與相依樣本 t 檢定

	前測		後測		t 值	p 值
	M	SD	M	SD		
實驗組 ($N=41$)						
情緒能力總量表	3.56	.36	3.73	.23	-3.80	.000***
情緒覺察與辨識能力分量表	3.72	.34	3.82	.24	-2.27	.029*
情緒理解能力分量表	3.53	.42	3.75	.27	-3.55	.001***
情緒表達能力分量表	3.61	.40	3.79	.28	-3.14	.003**
情緒調節能力分量表	3.36	.53	3.58	.37	-2.56	.014*
控制組($N=31$)						
情緒能力總量表	3.55	.30	3.63	.46	-.84	.41
情緒覺察與辨識能力分量表	3.71	.33	3.73	.46	-.16	.88
情緒理解能力分量表	3.52	.42	3.67	.53	-1.76	.09
情緒表達能力分量表	3.61	.40	3.63	.50	-.19	.85
情緒調節能力分量表	3.35	.51	3.50	.53	-1.27	.22

註：* $p<.05$ ，** $p<.01$ ，*** $p<.001$

三、實驗組與控制組前後測情緒能力之性別差異分析

接續探討不同性別學童情緒能力的學習成效，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之性別分組前後測平均數後，由表 6 可知：實驗組男童之前後測平均數差異較女童大，包含情緒能力量表總分、情緒理解、情緒表達與情緒調節等分量表，其前後測分數均達顯著差異（ $t_{\text{總分}}=-2.91$ 、 $t_{\text{情緒理解}}=-3.08$ 、 $t_{\text{情緒表達}}=-2.66$ 、 $t_{\text{情緒調節}}=-2.71$ ， $p<.05$ ），僅情緒覺察與辨識分量表之前後測分數未達顯著差異（ $t_{\text{情緒覺察與辨識}}=-.95$ ， $p>.05$ ）。反觀實驗組女童之前後測分數，僅情緒能力量表總分以及情緒覺察與辨識分量表分數達顯著差異（ $t_{\text{總分}}=-2.62$ 、 $t_{\text{情緒覺察與辨識}}=-2.42$ ， $p<.05$ ），其餘分量表之前後測分數皆未達顯著差異（ $t_{\text{情緒理解}}=-2.07$ 、 $t_{\text{情緒表達}}=-1.84$ 、 $t_{\text{情緒調節}}=-1.09$ ， $p>.05$ ）。由此可知，實驗介入對於男童較具成效。而控制組男女童之前後測分數檢定則均未達顯著水準。

且本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女童之情緒能力，無論前測或後測分數，均明顯地優於男童，此發現與 Bajgar 等人（2005）以及 Colle 與 Del Giudice（2011）的研究結果一致，均指出女童的情緒能力普遍優於男童；而 Ran（2018）運用電位

生理學之研究進一步指出，男女性以不同方式處理情緒刺激，研究人員提供可預測與不可預測之情緒臉孔進行實驗，發現女性的反應準確度高於男性；男性對於快樂的臉孔具有知覺偏好，女性則對憤怒臉孔具較高的敏感性。至於情緒覺察與辨識能力，係指個體知覺自己因外在刺激所產生的情緒變化，整合過去情緒經驗而進行正、負向評估及解釋的認知過程（Rieffe et al., 2008）；在這樣的定義中，情緒覺察與辨識反映了多元的內涵。Colle 與 Del Giudice（2011）以 122 名 7 歲兒童進行研究，與本研究同樣發現女童的情緒覺察與辨識能力優於男童。對於本研究男童的情緒覺察與辨識能力之前後測分數未達顯著差異之原因，研究者推論可能因情緒覺察（emotion awareness）（Rieffe & Rooij, 2012）與情緒辨識能力（emotion recognition）（Wells et al., 2021）需較高度的觀察力與敏銳度，同時須能整合過去情緒經驗進行認知，或受到過去經驗影響（Assed et al., 2020；Laamanen et al., 2022），恐無法於短時間即習得策略，故未有明顯改變，值得持續探究。

至於本研究女童僅情緒能力總量表和察覺與辨識分量表在情緒教育介入前後達顯著差異，而理解分量表、表達分量表、調節分量表則未達顯著差異。經檢視女童前測分數介於 3.47~3.81（ $M=3.66$ ）；後測分數介於 3.56~3.92（ $M=3.77$ ），而量表題項滿分為 4 分，顯見女童的前後測分數相當高，研究者推論可能受到研究工具天花板效應之限制，無法呈現出女童學習成效的差異性，值得後續研究持續關注。此外，McTaggart 等人（2022）以學前幼兒為對象的研究結果也同樣發現：實驗介入後，男童的進步幅度較大。而依據教育部統計 109 學年度情緒行為障礙的國中小學生人數，男童（3,078 位）人數是女童（463 位）的 6.6 倍，比例差異懸殊（教育部，2020），顯見男童有較高比例的情緒行為障礙風險，需積極介入輔導。本研究發現男童在經過實驗處理（情緒教育方案課程介入）後，情緒能力總分、情緒理解、表達與調節能力均達顯著差異，顯示本情緒教育方案對男童具有顯著成效，實值得積極推廣運用。

表 7

實驗組與控制組性別分組的前後測平均數與相依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組別	性別		男童				女童			
	前測	後測	t 值	p 值			前測	後測	t 值	p 值
	$N=15$	$N=15$					$N=26$	$N=26$		
實驗組 ($N=41$)										
情緒能力總量表	3.38	3.66	-2.91	.01**			3.66	3.77	-2.62	.02*
覺察與辨識分量表	3.57	3.66	-.95	.36			3.81	3.92	-2.42	.02*
理解分量表	3.32	3.68	-3.08	.01**			3.64	3.79	-2.07	.05
表達分量表	3.44	3.76	-2.66	.02*			3.71	3.81	-1.84	.08
調節分量表	3.17	3.53	-2.71	.02*			3.47	3.56	-1.09	.29
控制組 ($N=31$)	$N=14$	$N=14$					$N=17$	$N=17$		
情緒能力總量表	3.55	3.65	-.57	.58			3.56	3.61	-.71	.49
覺察與辨識分量表	3.73	3.74	-.06	.95			3.70	3.72	-.21	.84
理解分量表	3.54	3.72	-1.18	.26			3.49	3.62	-1.30	.21
表達分量表	3.63	3.63	.00	1.0			3.59	3.62	-.42	.68
調節分量表	3.29	3.50	-1.10	.29			3.42	3.46	-.62	.55

註：* $p < .05$ 、** $p < .01$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本研究完成研發具成效之兒童情緒教育方案（見附錄二）

本研究完成研發一套適合國小低年級學童之情緒教育方案，內容包含情緒能力之「覺察與辨識」、「理解」、「表達」與「調節」等四個構面。每個構面各有三個單元活動，加上相見歡與課程總複習共計 14 個單元，每週一次、每次活動 40 分鐘。教學方法運用繪本教學、情緒言談、體驗活動、角色扮演、我訊息與理情 ABC 理論技巧等多元策略，讓兒童透過主動探索、體驗、觀察、團體討論、實作、分享或個人獨立操作等多元方式學習，能有效提升兒童情緒能

力。此外，檢視各班教師教學觀察評估紀錄，共回收 38 份觀察者評估表，五點量表之平均分數為 4.92 分，顯示班級教師均十分肯定此情緒教育方案之教案設計與活動執行的專業能力。

（二）本研究研發之「兒童情緒教育方案」能有效提升兒童情緒能力，且男童進步較顯著

1.實驗組學童的「情緒能力」總分以及四個構面分數，前後測皆達顯著差異，有明顯的進步，控制組則無顯著差異。顯示本研究研發之「兒童情緒教育方案」具有成效。

2.情緒能力之性別差異部分，實驗組男童前後測分數，除情緒覺察與辨識外，情緒能力總分、情緒理解、表達與調節分量表皆達顯著差異。而實驗組女童僅總分及情緒覺察與辨識分量表達顯著差異。雖女童前後測分數皆優於男童，但男童的進步幅度較大，表示此情緒教育方案對男童有較佳成效。控制組男女童則皆無顯著差異。

二、建議

（一）對教師與教學實務工作者的建議

本研究研發之「兒童情緒教育方案」經前後測分析結果指出學童情緒能力均有明顯進步，且男童的效應更加顯著，建議教師與情緒教育實務工作者可參考應用本研究研發之「兒童情緒教育方案」，以期有助於提升學童情緒能力。並建議未來可由學校或班級做為推動情緒教育介入方案的執行單位，採用長期方式實施情教育，能以情緒為中心進行教學，拓展應用至其他科目，方能更有效地推動情緒教育，以期達到較佳之成效。

其次，建議邀約家長成為情緒教育之合作推動者，並提供家長理解情緒知能的機會，如情緒教育之親職講座，方有利於成為子女學習的榜樣，並於家庭生活中提供子女有更多練習與持續精進情緒能力的機會。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在研究工具方面，建議可研發適合評量國小學童情緒能力之量表，同時運

用多元評量的方式，除邀請家長填答量表外，亦可邀請班級教師與學童填答量表或進行訪談，進一步理解男女童情緒能力發展情形。研究對象方面，建議可招募其他面向之對象，涵蓋不同區域、背景、不同學校規模，探究情緒教育方案介入的成效是否因背景因素而有差異。此外，本研究研發之方案與幼兒園教保活動情緒領域的四個能力相符，亦可擴大應用情緒教育方案的實施對象至幼兒園中大班，了解本研究研發之情緒教育方案在幼兒園的適用情形及其成效。

參考文獻

- 尤慧美（2017）。以親子共讀進行情緒困擾兒童的情緒教育之探究（系統編號：105NTNT1094001）〔碩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吳英璋（2001）。情緒教育的理論與內涵。**學生輔導雙月刊**，75，66-79。
<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JournalContentDetail?SysId=A01026040>
- 李坤崇（2002）。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能力指標概念分析。**教育研究月刊**，98，111-122。
<http://ericdata.com/tw/detail.aspx?no=48684>
- 李欣蓓、蘇育令（2013）。教師使用情緒繪本進行幼兒情緒教學之行動研究。**輔仁民生學誌**，19（2），53-69。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0276149-201312-201407170005-201407170005-53-69>
- 周育如、黃迺毓（2010）。親子共讀情緒言談與幼兒情緒理解能力之關係檢視。**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5（3），33-60。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2073753X-201009-201307090028-201307090028-33-60>
- 周育如、黃迺毓（2011）。文化下的建構：幼兒對情緒內涵的理解。**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13，1-26。
[https://doi.org/10.6246/JHDFS.201112_\(13\).0001](https://doi.org/10.6246/JHDFS.201112_(13).0001)
- 幸曼玲、楊金寶、丘嘉慧、柯華葳、蔡敏玲、金瑞芝、郭李宗文、簡淑真、林玫君（2015）。**新課綱想說的事：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的理念與發展**。心理出版社。
- 幸曼玲、簡淑真（2005）。**國民教育幼兒班課程綱要之能力指標專案研究**。教育部委託專案研究報告。

- 林文婷、簡淑真、郭李宗文（2008）。教師情緒智力與幼兒情緒能力之相關研究。載於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主編，**幼兒保育論壇**（86-114 頁）。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https://doi.org/10.29780/YEPYLT.200808.0086>
- 林京穎（2018）。繪本融入情緒教育活動與幼兒情緒理解表現之探究（系統編號：106NTNU5261008）〔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林建福（2010）。情緒教育的哲學探究：迷思、重要性與建議。**教育研究集刊**，56（4），1-26。[https://doi.org/10.6910/BER.201012_\(56-4\).0001](https://doi.org/10.6910/BER.201012_(56-4).0001)
- 林曜聖（2022）。「ADDIE 模式」及「SCOTEAM 教學要素」在大學課程的教學設計之應用：以大學「教學原理」課程為例。**教學實踐與創新**，5（1），99-149。
<https://doi.10.53106/261654492022030501003>
- 林美玲（2014）。運用電子繪本進行情緒教育的教學成效之研究—以國小二年級學生為例（系統編號：102VNU01396006）〔碩士論文，萬能科技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邱宇晴（2020）。與壞情緒對「畫」：以負向情緒處理為題的兒童情緒教育共創繪本（系統編號：108TNUA0819008）〔碩士論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唐淑華、吳盈瑩（2001）。「上國語課了！」～一個以融入方式進行情緒教育課程設計的行動研究。**課程與教學**，4（3），1-34+191。<https://doi.org/10.6384/CIQ.200107.0001>
- 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2020 年 6 月 23 日）修正公布。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57>
- 翁世雄（1996）。從情緒文盲談學校情緒教育。**師友月刊**，354，87-89。
<https://doi.org/10.6437/EM.199612.0087>
- 馬文倩（2018）。透過情緒教育策略提升國小二年級學童生氣情緒因應之行動研究（系統編號：106NHU00096007）〔碩士論文，南華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常雅珍、洪錦益、曾榮祥、黃詩媛（2017）。正向情緒教學應用於國小學童之研究：以自信、知足、感恩課程實施為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類**，11（1），79-108。
[https://doi.org/10.6618/HSSRP.2017.11\(1\)4](https://doi.org/10.6618/HSSRP.2017.11(1)4)
- 張碧雲（2000）。小學生的必修課題（上）—小學生的道德教育與情緒教育。**師友月刊**，402，85-89。<https://doi.org/10.6437/EM.200012.0085>
- 教育部（2012）。**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全國教保資訊網。
https://www.ece.moe.edu.tw/ch/preschool/course/curriculum_framework/cf_1/

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國家教育研究院。

<https://www.naer.edu.tw/PageSyllabus?fid=52>

教育部（2017）。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全國教保資訊網。

<https://www.ece.moe.edu.tw/ch/preschool/.galleries/preschool-files/NEW1.pdf>

教育部（2020）。中華民國特殊教育統計年報。教育部。

https://stats.moe.gov.tw/files/ebook/Education_Statistics/109/109edu.pdf

梁珀華、陳崇慧（2011）。教師班級經營風格與情緒教育對國小一年級學童情緒智力之影響。朝陽人文社會學刊，9（1），199-233。

<http://ir.lib.cyut.edu.tw:8080/bitstream/310901800/12220/1/8.pdf>

許仲余、蘇育令、賴孟龍（2014）。幼兒學習區同儕互動情緒表達之個案研究。幼兒教保研究，13，27-52。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997468X-201412-201501230021-201501230021-27-52>

郭秀霞（2013）。繪本融入情緒教育課程對國小二年級情緒調整能力之影響。教育研究論壇，5（1），99-115。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P20140311001-201312-201403110028-201403110028-99-115>

陳亞穎（2013）。「覺辨感行省」情緒教育陶冶策略之行動研究——以國小一年級為例（系統編號：101NDHU5331025）〔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陳奕璇（2022）。師資培育生數位學習媒材設計實作歷程之策略應用。台灣教育研究期刊，3（6），141-170。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P20220316001-202211-202212220008-202212220008-141-170>

陳紀萍（2018）。幼兒教師形成性評量實踐知識之個案研究（系統編號：106NTNU5261004）〔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陳祖昱、陳美純、林美玲（2016）。運用電子繪本進行情緒教育的教學成效之研究——以國小二年級學生為例。通識論叢，19，59-90。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9917929-201606-20161030011-201610030011-59-90>

陳惠珍（2022）。程式設計融入幼教師資培育課程之教學實踐歷程探討。課程與教學，25

- (3) , 107-132。 [https://doi.org/10.6384/CIQ.202207_25\(3\).0005](https://doi.org/10.6384/CIQ.202207_25(3).0005)
- 曾明鑫 (2016)。**網路繪本讀書會實施情緒教育之行動研究——探討學習歷程與學習結果** (系統編號: 104FJU01164009) [碩士論文, 輔仁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湛靜宜 (2017)。**實施情緒教育以提升幼兒自我控制能力之研究** (系統編號: 105CYUT0709007) [碩士論文, 朝陽科技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黃嘉雄 (2004)。**釐清泰勒的課程評鑑觀**。**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學報**, 17 (1), 27-50。
<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JournalContentDetail?SysId=A04002643>
- 黃薇芯 (2015)。**運用情緒教育課程提升幼兒情緒能力之行動研究** (系統編號: 103NPTU0096014) [碩士論文, 國立屏東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楊馥如 (2009)。**國一階段生命教育多媒體遊戲學習教材研發與評鑑研究**。**藝術學報**, 85, 479-503。 <https://doi.org/10.6793/JNTCA.200910.0479>
- 葉在庭 (2011)。**情緒與健康——兼論正向情緒的保護作用**。**應用心理研究**, 51, 1-12。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5609251-201109-201208090025-201208090025-1-12>
- 葉姿伶 (2011)。**情緒教育應用於班級經營之行動研究** (系統編號: 099NTPTC611013) [碩士論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詹棟樑 (1971)。**值得重視的兒童情緒教育**。**師友月刊**, 48, 22-24。
<https://doi.org/10.6437/EM.197106.0022>
- 翟敏如 (2012)。**探究繪本融入情緒教育活動對幼兒情緒認知與調節能力之影響**。**教育心理學報**, 44 (1), 27-48。 <https://doi.org/10.6251/BEP.20110704>
- 翟敏如 (2013)。**對話式閱讀技巧應用於幼兒情緒繪本共讀之初探**。**課程與教學**, 16 (4), 209-237。 [https://doi.org/10.6384/CIQ.201310_16\(4\).0008](https://doi.org/10.6384/CIQ.201310_16(4).0008)
- 翟敏如 (2014a)。**分析情緒繪本於幼兒情緒學習之應用與限制**。**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報**, 10 (2), 89-111。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8197205-201406-201406170015-201406170015-89-111>
- 翟敏如 (2014b)。**幼教師提問技巧於生氣繪本共讀活動之探究**。**慈濟大學教育研究學刊**, 11, 247-275。 DOI: 10.6754/TCUJ.201412_(11).0008
- 劉宜芳、郭李宗文 (2010)。**基隆市幼兒情緒能力之調查研究**。**第六屆國際親子論壇**, 台中: 亞洲大學。
- 蔡雅如 (2013)。**實施情緒教育課程對幼兒情緒能力之影響** (系統編號: 102NCYU5096031)

- 〔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鄭靜育（2013）。運用理情課程方案進行國小二年級學童情緒教育之行動研究（系統編號：102NHCT5212006）〔碩士論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盧秀琴、林毓哲（2018）。國小教師開發「昆蟲桌遊教具」以增強學童「沈浸經驗、科學過程技能」。《課程與教學》，21（1），105-131。
[https://doi.org/10.6384/CIQ.201801_21\(1\).0005](https://doi.org/10.6384/CIQ.201801_21(1).0005)
- 謝秀媚（2010）。情緒教育課程對提升國小一年級學童情緒智力效果之研究－關係管理面向的探討（系統編號：097FJU00164025）〔碩士論文，輔仁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謝佳純（2019）。繪本融入情緒教育教學成效之研究-以國小一年級生為例（系統編號：107KYIT0457035）〔碩士論文，高苑科技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謝曼盈、潘靖瑛（2019）。社會與情緒學習課程對幼兒覺察他人情緒能力之影響。《慈濟大學教育研究學刊》，14，99-127。
[https://doi.org/10.6754/TCUJ.201709_\(14\).0004](https://doi.org/10.6754/TCUJ.201709_(14).0004)
- 簡淑真（2001）。幼兒情緒知多少？百位幼兒情緒報告書。《台東師院學報》，12（1），45-70。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61/57/5e.html>
- 簡淑真、郭李宗文（2006）。幼托整合後幼兒園教保活動綱要及能力指標：情緒領域期中報告。教育部委託專案研究報告。
- 顏嘉辰、翟敏如（2016）。情緒言談共讀技巧介入訓練對幼兒情緒認知及情緒調節能力之影響。《教育心理學報》，48（1），113-132。
<https://doi.org/10.6251/BEP.20151030>
- Ashdown, D. M., & Bernard, M. E. (2012). Can explicit instruction in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kills benefit the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well-be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young childre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 39(6), 397–405.
<https://doi.org/10.1007/s10643-011-0481-x>
- Assed, M. M., Khafif, T. C., Belizario, G. O., Fatorelli, R., Rocca, C. C. de A., & de Pádua Serafim, A. (2020).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in maltreated children: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Child & Family Studies*, 29(5), 1493–1509.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9-01636-w>
- Bajgar, J., Ciarrochi, J., Lane, R., & Deane, F. P. (2005). Development of the levels of emotional awareness scale for children (LEAS-C).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3(4), 569–586.
<https://doi.org/10.1348/026151005X35417>
- Bar-On, R.(2006). The Bar-On model of emotional-social intelligence (ESI). *Psicothema*, 18,

- 13-25. <https://www.psicothema.com/pdf/3271.pdf>
- Boden, M. T., & Thompson, R. J. (2015). Facets of emotional awareness and associations with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epression. *Emotion, 15*(3), 399-410. DOI: 10.1037/emo0000057
- CASEL (2003). Safe and sound: An educational leader's guide to evidence-based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 programs. <https://casel.org/safe-and-sound-guide-to-sel-programs/>
- CASEL (2013). Effective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programs: preschool and elementary school edition. 2013 CASEL Guide. In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581699.pdf>
- CASEL (2023). Home page. <https://casel.org/about-us/our-mission-work/> Program Guide. <https://pg.casel.org/>
- Chernyshenko, O. S., Kankaraš, M. & Drasgow, F. (2018).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 for student success and wellbeing: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OECD study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 *OECD Education Working Papers, 173*, 1-136. <https://doi.org/10.1787/db1d8e59-en>
- Colle, L., & Del Giudice, M. (2011).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in middle childhood. *Social Development, 20*(1), 51–72. <https://doi.org/10.1111/j.1467-9507.2010.00576.x>
- Denham, S. A., Ferrier, D. E., Howarth, G. Z., Herndon, K. J., & Bassett, H. H. (2016). Key considerations in assessing young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tence.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46*(3), 299–317. <https://doi.org/10.1080/0305764X.2016.1146659>
- Durak, G., & Ataizi, M. (2016). The ABC's of online course design according to ADDIE model. *Univers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9), 2084-2091.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J1113889.pdf>
- Elias, M.J. (2003). Academic and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Educational Practices Series-11. *UNESCO,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https://eric.ed.gov/?id=ED473695>
- Finlon, K. J., Izard, C. E., Seidenfeld, A., Johnson, S. R., Cavadel, E. W., Ewing, E. S., & Morgan, J. K. (2015). Emotion-based preventive intervention: Effectively promoting emotion knowledge and adaptive behavior among at-risk preschooler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7*(4 Pt 1), 1353–1365.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14001461>
- Gershon, P. & Pellitteri, J. (2018). Promoti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

- review of progra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otional Education*, 10(2), 26-41.
<https://eric.ed.gov/?id=EJ1197563>
- Goleman, D. (1995).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antam Books.
- Gross, J. J. (2015). Emotion regulatio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6(1), 1–26. <https://doi.org/10.1080/1047840X.2014.940781>
- Gunter, L., Caldarella, P., Korth, B. B., & Young, K. R. (2012). Promot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in preschool students: a study of “strong start pre-k.”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 40(3), 151–159. <https://doi.org/10.1007/s10643-012-0507-z>
- Havighurst, S., Duncombe, M., Frankling, E., Holland, K., Kehoe, C., & Stargatt, R. (2015). An emotion-focused early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with emerging conduct problem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3(4), 749-760.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14-9944-z>
- Havighurst, S., Wilson, K., Harley, A., Kehoe, C., Efron, D., & Prior, M. (2013). 'Tuning into kids': reducing young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using an emotion coaching Parenting program. *Child Psychiatry & Human Development*, 44(2), 247-264.
<https://doi.org/10.1007/s10578-012-0322-1>
- Housman, D. K., Denham, S. A., & Cabral, H. (2018). Building young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self-regulation from birth: The “begin to...ECSE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otional Education*, 10(2), 5–25.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162327691.pdf>
- Hughes, C., & Cline, T. (2015). An evaluation of the preschool PATHS curriculum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childre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n Practice*, 31(1), 73–85.
<https://doi.org/10.1080/02667363.2014.988327>
- Hwa, M. A. C., & Amin, H. (2016). Why emotion at work matters: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labour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workplace behaviours among service workers in east Malaysia. *Kajian Malaysia: Journal of Malaysian Studies*, 34(1), 79–105.
<https://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direct=true&AuthType=shib&db=a9h&AN=116649604&lang=zh-tw&site=ehost-live>.
- Hyson, M. & Williams, L. R. (2004). *The 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 Building an Emotion-Centered Curriculum(2nd)*.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Izard, C. E., Trentacosta, C. J., King, K. A., & Mostow, A. J. (2004). An emotion-based prevention program for Head Start children.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15(4), 407–422. https://doi.org/10.1207/s15566935eed1504_4

- Jones, S. M., Kahn, J., & Aspen Institute, N. C. on S. E. & A. D. (NCSEAD). (2017). The evidence base for how we learn: supporting students' social, emotional,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Consensus statements of evidence from the council of distinguished scientists. In *Aspen Institute*. Aspen Institute.
https://www.aspen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9/SEAD-Research-Brief-9.12_updated-web.pdf
- Kromm, H., Färber, M., & Holodyski, M. (2015). Felt or false smiles? Volitional regulation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4-, 6-, and 8-year-old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86(2), 579–597.
<https://doi.org/10.1111/cdev.12315>
- Laamanen, P., Kiuru, N., Flykt, M., Vänskä, M., Hietanen, J. K., Peltola, M. J., Kurkela, E., Poikkeus, P., Tiitinen, A., & Lindblom, J. (2022). How do early family systems predict emotion recognition in middle childhood? *Social Development*, 31(1), 196–211.
<https://doi.org/10.1111/sode.12526>
- Lawson, G. M., McKenzie, M. E., Becker, K. D., Selby, L., & Hoover, S. A. (2019). The core components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programs. *Prevention science*, 20(4), 457–467. <https://doi.org/10.1007/s11121-018-0953-y>
- Low, S., Smolkowski, K., Cook, C., & Desfosses, D. (2019). Two-year impact of a universal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curriculum: group differences from developmentally sensitive trends over tim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5(2), 415–433. DOI: 10.1037/dev0000621
- Mahoney, J. L., & Weissberg, R. P. (2018). SEL: what the research say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76(2), 34-35. <https://www.ascd.org/el/articles/sel-what-the-research-says>
- Mayer, J. D., & Salovey, P. (1997). What i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P. Salovey & D. J. Sluyter (Eds.), *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pp. 3-34). Harper Collins. <https://psycnet.apa.org/record/1997-08644-001>
- Mayer, J. D., Salovey, P., & Caruso, D. R. (2008).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w ability or eclectic trai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3(6), 503–517. DOI: 10.1037/0003-066X.63.6.503
- McTaggart, V., McGill, R., & Stephens, S. (2022).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ies during the pre-school year.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 Care*, 192(12), 1952–1966. <https://doi.org/10.1080/03004430.2021.1957859>
- Meher, V., Baral, R., & Bankira, S. (2021). An analysi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four-year integrated B.Ed. trainees. *Shanlax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 Education*, 9(2), 108–116. <https://doi.org/10.34293/education.v9i2.3555>
- Molenda, M. (2015). In search of the elusive ADDIE model.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54(2), 40–42. <https://doi.org/10.1002/pfi.21461>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5). *Skills for social progress: The power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 OECD Skills Studies,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ceri/skills-for-social-progress-key-messages.pdf>
- Pat-Horenczyk, R., Shi, C., Schramm-Yavin, S., Bar-Halpern, M., & Tan, L. (2015). Building emotion and affect regulation (BEAR): preliminary evidence from an open trial in children's residential group homes in Singapore. *Child & Youth Care Forum*, 44(2), 175–190. <https://doi.org/10.1007/s10566-014-9276-8>
- Penza-Clyve, S., & Zeman, J. (2002).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emotion expression scale for children (EESC).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31(4), 540–547. <https://doi.org/10.1207/153744202320802205>
- Peterson, C. (2003). Brining ADDIE to life: Instructional design at its best. *Educational Multimedia and Hypermedia*, 12(3), 227–241. <https://www.learntechlib.org/primary/p/2074/>
- Pons, F., & Harris, P. L. (2005). Longitudinal change and longitudinal stability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emotion understanding. *Cognition & Emotion*, 19(8), 1158–1174.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0500282108>
- Prosen, S., & Smrtnik Vitulic, H. (2018). Children's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the preschool context.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88(12), 1673–1681. <https://doi.org/10.1080/03004430.2016.1278367>
- Ran, G. (2018). Human sex differences in emotion prediction: evidence from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Social Behavior &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6(6), 925–934. <https://doi.org/10.2224/sbp.6769>
- Rao, Z., & Gibson, J. (2019). Motivations for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Chinese school-aged children. *Motivation & Emotion*, 43(3), 371–386. <https://doi.org/10.1007/s11031-018-9740-0>
- Rieffe, C., & Rooij, M. (2012).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awareness and internalising symptoms during late childhood.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1(6), 349–356. <https://doi.org/10.1007/s00787-012-0267-8>
- Rieffe, C., Oosterveld, P., Miers, A. C., Terwogt, M. M., & Ly, V. (2008). Emotion awareness and

- internalising sympto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 emotion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revised.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5(8), 756–761.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08.08.001>
- Saarni, C. (1999). *A skill-based model of emotional competence: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ED430678. <https://eric.ed.gov/?id=ED430678>
- Saltali, N. D., & Deniz, M. E. (2010). The effects of an emo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on the emotional skills of six-year-old children attending preschool. *Educational Sciences: Theory and Practice*, 10(4), 2123–2140. <https://eric.ed.gov/?id=EJ919874>
- Thomas, C. L., & Allen, K. (2021). Driving engagement: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academic buoyancy on student engagement. *Journal of Further & Higher Education*, 45(1), 107–119. <https://doi.org/10.1080/0309877X.2020.1741520>
- Van Beveren, M.-L., Kuppens, S., Hankin, B., & Braet, C. (2019). Because you had a bad day: general and daily relations between reactive temperament,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youth. *PLoS ONE*, 14(10), 1–25.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4126>
- Wells, A. E., Hunnikin, L. M., Ash, D. P., & van Goozen, S. H. M. (2021). Improving emotion recognition is associated with subsequent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behavioural problems.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30(11), 1769–1777.
<https://doi.org/10.1007/s00787-020-01652-y>
- White, A., & Walker, S. (2018). Enhancing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evidence-based resource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43(4), 4-12.
<https://doi.org/10.23965/AJEC.43.4.01>
- Wilding, L., & Claridge, S. (2016). The emotional literacy support assistant (ELSA) programme: parental perceptions of its impact in school and at hom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n Practice*, 32(2), 180–196. <https://doi.org/10.1080/02667363.2016.1146573>
- Wilkinson, J. E., & Kao, C. P. (2019). Aspects of socio-emotional learning in Taiwan's pre-school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eachers'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Policy*, 13, 1. <https://doi.org/10.1186/s40723-019-0057-6>
- Wu, M. Y. H., Frydenberg, E., & McKenzie, V. (2022).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What are the learning outcomes from a preschool SEL program (COPE-Resilience) in Taiwan and Australia. In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Schools* (pp. 149-168).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003013778-12>

Zulfadil, Hendriani, S., & Machasin. (2020).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team performance through knowledge sharing, team conflict, and the structure mechanism.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39(3), 269–292. <https://doi.org/10.1108/JMD-12-2018-0354>

附錄一

繪本品格故事課程表

週次	故事名稱	主題軸	學習表現	學習表現說明
1	相見歡活動			
2	阿淪亡子歷險記	悅納自己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的感受與想法。	1.探索並分享自己的外在特徵和興趣喜好。
3	灰王子			2.探索並分享自己的成長會受到家庭、學校及社區文化的影響。
4	毛頭小鷹		1-I-2 覺察每個人均有其獨特性與長處，進而欣賞自己的優點、喜歡自己。	3.探索並分享自己的生活會受到自然與社會環境變遷的影響。
5	紙袋公主			1.透過班級、學校、家庭、社區等活動，發現每個人因性別、族群、宗教、文化等有所異同，並具有獨特性。
6	拼拼湊湊的變色龍			2.覺察自己與他人各具特色與長處，進而欣賞自己的獨特與優點。
7	珊瑚			3.從參與各類的活動中，探索並適度發揮自己的長處。
8	勇敢的莎莎	探究事理	1-I-4 珍視自己並學習照顧自己的方法，且能適切、安全的行動。	1.覺知環境及其變化所造成的危險，運用合適的應變方法保護自己。
9	把帽子還給我			2.覺察生活中的變動，對自己可能造成的影響，並學習適應的方法。
10	好一個吵架天		2-I-3 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會相互影響。	1.觀察生物現象，覺察生物的生存會相互影響。
11	自戀的小雪			2.接觸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彼此之間是有關連性的。
12	波利為什麼要吵架？		2-I-4 在發現及解決問題的歷程中，學習探索與探究人、事、物的方法。	3.覺察生活周遭人、事、物間會形成相互影響的關係。
13	朱家故事			1.從探索活動中體會感官和知覺對認識人、事、物的重要性。
14	紅公雞			2.學習發現問題與提出問題的方式。
				3.從瞭解問題中思考可能的原因，以提出解決的方法並採取行動。

附錄二

修正後之情緒教育方案

向度	課程單元	課程目標	活動設計
	1. 相見歡	師生關係與班級常規建立	- 引起動機：志工教師自介紹。 - 發展活動：1.體驗活動：遊戲：小青蛙、小蝴蝶，抓！ 2.人偶拼圖，訂定班級公約。 - 綜合活動：學習單—情緒氣象表。
情緒覺察與辨識	2. 情緒辨識高手	對自己情緒的覺察與辨識	- 引起動機：情緒兒歌律動—好朋友一起走，覺察情緒。 - 發展活動： - 臉譜正負向分辨遊戲，透過律動分辨正負向情緒。 - 繪本—口水龍，瞭解同一個情緒有程度的差異。 - 綜合活動：情緒遊戲動一動（正負向情緒）&情緒溫度計學習單。
	3. 情緒放大鏡	對自己情緒的覺察與辨識	- 引起動機：繪本—口水龍回顧，辨別自己的同一種情緒也有程度上的差異。 - 發展活動：體驗活動-矇眼探路，透過活動辨識自己的同一種情緒在不同情境中會出現程度上的差異，以及在同一事件中存在著多種情緒。 - 綜合活動：情緒積木疊疊疊—檢視是否能辨識同一事件中自己有兩種以上的情緒。
	4. 情緒大探索	對他人情緒的覺察與辨識	- 引起動機：情緒歷險，透過情緒卡遊戲，運用聲音表情辨識情緒。 - 發展活動：繪本—我的感覺你的感覺，透過情緒狀況題，辨識情境事件或是故事中角色的情緒。 - 綜合活動：學習單—情緒連一連，從事件脈絡中辨識他人的情緒與辨識文本中主角情緒的評估。

附錄二

修正後之情緒教育方案（續）

向度	課程單元	課程目標	活動設計
情緒理解	5. 情緒的理解	對自己的情緒理解	■ 引起動機：看臉說情緒，猜同學臉部表情是哪個臉部表情圖卡。 ■ 發展活動： a. 影片教學—發生甚麼事？說出看影片的心情，並說出是甚麼原因，讓自己有這個情緒。 b. 情緒臉譜造句—因為…所以…，瞭解自己在不同狀況下會有不同情緒。 ■ 綜合活動：快問快答遊戲，評量學生是否達到學習指標。
情緒表達	6. 情緒的表達	對自己的情緒表達	■ 引起動機：緊繃放鬆遊戲，學習放鬆肢體，並為情緒調節做預備。 ■ 發展活動： a. 活動猜猜我的感覺，經驗口語與非口語的情緒表達。 b. 繪本—菲力的 17 種情緒，瞭解、管理與表達情緒感受。 ■ 綜合活動：學習單一情緒表達連一連、勾一勾，檢視自己的情緒表達。
情緒理解	7. 我能理解你	對他人的情緒理解	■ 引起動機：分享「因為…，所以…」運用的情形。 ■ 發展活動：繪本教學—鱷魚怕怕牙醫怕怕，理解自己的情緒表達會影響他人，以及瞭解他人在不同的情況下，會有不同的情緒。 ■ 綜合活動：狀況題運用「因為…，所以…」，教學回顧與評量。

附錄二

修正後之情緒教育方案（續）

向度	課程單元	課程目標	活動設計
情緒表達	8. 有話好好	對他人的情緒表達	■ 引起動機：情緒猜猜小達人，經驗情緒沒有表達清楚，很容易猜錯 ■ 發展活動：繪本—愛哭公主，學習接納他人情緒表達的方式（同理），並能適切地使用語言的形式表達繪本中他人的情緒。 ■ 綜合活動：活動—情緒表達你我他，再次確認如何適切表達情緒。
情緒理解	9. 情緒你我他	對他人的情緒理解	■ 引起動機：複習上週課程內容，分享練習表達他人情緒的心得。 ■ 發展活動：啊，怎麼了！透過情境題，體驗甚麼是同理他人的情緒，並練習運用「因為…，所以…，對嗎？」的句型來表達他人的情緒。 ■ 綜合活動：因為，所以，對嗎？運用情境狀況影片，評估學生能運用因為所以對嗎，表達他人情緒。
情緒表達	10. 情緒小劇場	對環境的情緒表達	■ 引起動機：反應大？反應小，經驗反應大小給人的感受並體會適當反應的重要。 ■ 發展活動：1.情境表演：我把你的糖果吃光（反應小）；2.影片欣賞：小男孩糖果被吃光（反應大）；媽媽吃光女孩糖果（反應適中），學習如何使用語言適切地情緒表達—我訊息技巧。 ■ 綜合活動：學習單一情緒表達四步驟，確認知道適切的表達情緒的步驟。

附錄二

修正後之情緒教育方案（續）

向度	課程單元	課程目標	活動設計
情緒調節	11. 想法轉個彎	對自己的情緒調節	- 引起動機：缺角的圓，美勞創意發想，感受想法轉變帶來的驚喜。 - 發展活動：想法轉個彎，運用理情情緒教育理論設計的正向 123，學習用正向的想法，駁斥負向的想法。 - 綜合活動：學習單一正向 123，統整發展活動的駁斥，並能運用出來。
	12. 我有好方法	對自己的情緒調節	- 引起動機：繪本—口水龍回顧，理解情緒累積，沒有處理就會爆炸。 - 發展活動：繪本—家有生氣小恐龍，學習在情緒會高漲前，運用好方法，調節情緒。 - 綜合活動：學習單一聰明選擇情緒調節的好方法。
	13. 我可以勇敢	對環境的情緒調節	- 引起動機：引導反思，提問出乎意料的事或狀況是什麼，引發學生在遇到突發狀況時會如何的反應。 - 發展活動：繪本—123 飛吧！探討勇敢相關議題的繪本，在碰到出乎意料的狀況時能運用已學習的情緒能力，表現出適當的情緒並尋求解決的方法。 - 綜合活動：體驗活動—帶著勇氣闖關趣，在遊戲中運用所學解決狀況題。
	14. 總複習	再次回顧所有情緒能力	- 引起動機：預告情緒教育方案活動即將結束，透過遊戲來回顧過去的學習。 - 發展活動：體驗活動—「矇眼大探索」，透過活動引導學生使用觸覺、聽覺、嗅覺，靠著繩索所指示的路徑進行，經歷產生的情緒以及遇到困難時，思考如何突破繼續完成任務，作為課程的總複習。 - 綜合活動：回顧活動，再次帶領同學思考這學期學習的情緒能力四個面向。

附錄三

兒童情緒教育方案觀察者評估表

兒童情緒教育方案觀察者評估表					
單元名稱：L3 情緒放大鏡			填表人： T3		
評估面向	評估項目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A、教案使用	A-1.能掌握活動流程時間，順利完成該課程	5	4	3	2 1
	A-2.能掌握活動與活動間的銜接	5	4	3	2 1
	A-3.各活動時間分配適當	5	4	3	2 1
	A-4.清楚課程之主題目標，與引導方向	5	4	3	2 1
	A-5.課程活動設計能引起兒童的學習動機，參與度高	5	4	3	2 1
	A-6.有提供兒童練習技能的機會	5	4	3	2 1
	A-7.學習評量符合兒童程度，兒童容易進行	5	4	3	2 1
B、專業態度	B-1.能敏銳覺察兒童的需求、情緒或特殊狀況（不適應行為），並以合宜的策略回應與引導兒童。	5	4	3	2 1
	B-2.反思提問前顯易懂，兒童能理解	5	4	3	2 1
	B-3.引導反思後，能聽答及歸納整理兒童的回應，並以開放的語言提示或建設性的回饋，鼓勵兒童進一步思考。	5	4	3	2 1
	B-4.能使用正向語言引導兒童同儕間互動	5	4	3	2 1
	B-5.能注意每位參與的兒童，適時提供輔導與協助	5	4	3	2 1
意見：					
- 情緒積木在台前使用大積木示範同一件事兩位老師有不同也有相同的情緒（有相同情緒積木只有一個一起使用），有助於活動進行的流暢。 - 孩子免不了沒有拿到小積木或是拿來丟，先暫放下課室管理這時候即是情緒教育的機會（沒拿到是甚麼心情？用口說來表達/丟小積木或是打架（小朋友說會打架）老師會是甚麼心情？ - 老師要去除自己的刻板印象，情境題目是忘了帶餐盒。 有一位同學挑選了高興，幸福，開心……以為他在胡鬧，但他說因為爸爸會送來所以覺得開心幸福。 - 不同的班級氛圍不同，有的班級小組挪動椅子坐在一起使用小積木，有班級個人至小組桌上拿好放到自己座位上。					

附錄四

教學觀察省思札記

教學日期	109 年 10 月 13 日	教學者	G1 實驗組：R G2-1 實驗組：R/TA2 G2-2 實驗組：R/TA3
教學單元	情緒教育方案第一單元 相見歡		
重要事件	G2-1 實驗組體驗活動，忘了使用情緒卡。但學生們還是可以說出現在自己在遊戲當下的心情，且也會兩種以上的情緒。		
教學觀察與省思	■ 班導師已經是先跟學生們說今天開始會上情緒教育的課程，所以可以感受到學生們的期待。 ■ 在做人形偶拼圖時，原本有幾位小朋友說要拚成一個愛心，所以我們以為是一個大大的愛心形狀，但是人形偶拼出來卻是有點像又有點不像，此時坐在前面一位安靜、動作又慢的小朋友卻指著拼圖說有愛心喔，大家還說哪裡有？經過助教請他指出來後，大家才說，對耶！好多的小愛心，原來是拼圖中間的空隙呈現出很多的小愛心，讓我們大家都感到很驚艷！另外一位男孩說，我看到大家都在一起（孩子的觀察力真是強大呀！）這讓大家有不同的角度看見每個人給出一個愛心，然後在一起快樂學習。 ■ 情緒氣象表，原本設計是課後作業，因為還有時間，所以在課堂上請小朋友圈選今天的心情。發現還是需要在課堂上做一次，因為有小朋友搞不清楚這張學習單要怎麼做。 ■ 助教在引導學生做人形偶拼圖時，會一直執著要孩子們說出可以依照自己特長給予的貢獻這點，反倒孩子們是說不出來的，依照教材的設計是讓孩子看到人偶拼圖每個人呈現出的色彩、以及最會做的有同與不同，做到彼此欣賞，給對方一個鼓勵，收到朋友的鼓勵，心情如何？我們這麼多特別的人聚在一起上課，可以在做些甚麼事讓我們事開心快樂的一起學習的呢？然後在引導學生做人偶拼圖，拼出大家快樂學習的樣子。		
課程修正與調整	■ 助教在做人形偶拼圖時，說成拼成你的心情，後來臨時介入做了要呈現大家可以快樂學習的拼圖。才讓學生明白這個活動的目的。人形偶的拼圖活動說詞要調整讓讀教材的人能更掌握活動目標。 ■ 學習單，要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說明，學生才不會全部都勾選。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DDIE Model in Developing and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ldren's Emotional Education Programs

Jo-Chien Liu¹ Miao-Ju Tu²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an emo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suitable for junior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and assess its effectiveness on the emotional competence of such children using a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 The emo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was developed using the ADDIE model and reviewed by experts in the fiel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gram, junior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a classroom setting. The emo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was implemented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followed a character story curriculum using picture books. The researcher invited the parents of the participating children (41 childre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cluding 15 boys and 26 girls; 31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including 14 boys and 17 girls) to complete the “Emotional Competence Rating Scale for 3–6-year-olds (Parent Version)” by Kuo and Chien (2006)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o assess changes in children's emotional competence. The study yield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 a comprehensive emo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suitable for junior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was developed, encompassing the four components of emotional competence: “awareness and recognition,” “comprehension,” “expression,” and “regulation.” Each component consisted of three unit activities, and so along with a meet-and-greet activity and a curriculum review, there were 14 units in total. The

¹ Taiwan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Association

²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gram received high praise from the junior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Seco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hildren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the pre- and post-test stages in terms of both total scores and the scores for each of the four components of “emotional competence,” whereas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scores. Third,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emo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had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on boys.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we propose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within education and use them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ADDIE model, emotional competence, emo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juni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收稿日期：2023 年 04 月 26 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3 年 07 月 31 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3 年 10 月 11 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3 年 11 月 29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3 年 11 月 29 日

歷經藥癮母單親養育之女兒的成長逆境 與其影響：以一位用毒青少年為例

鄭青玫*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

摘要

本研究以一位歷經藥癮母單親養育之女兒（代號A）的成長逆境做探究焦點，了解母親為隱晦的安非他命使用者，A經驗的成長逆境與影響，採敘說研究之整體－內容分析法做資料分析。研究發現三個歷程主題：(1)童年前期：未婚母用毒被生父拋棄，A經歷單親、被母疏忽拒絕、經濟困境致居處不定等逆境，A知覺「沒人要我／我不重要」，以親職化因應。(2)童年後期至青春前期：A發現母親的吸毒秘密，以否認、隱瞞因應；長期受疏忽斷母女連結，因應孤單，A開始賦於偏差同儕，也因出現種種行為問題常遭母肢暴管教。面對隱晦用毒、職業低賤、頻繁施暴的母親，A深覺羞恥，對外隱匿，但內在積恨，最後以暴因應。(3)後青春前期：A翹家止母肢暴；A受同儕邀約開始用毒，因毒多次受觀護，母親的態度從拒絕到轉成釋權展愛，母女關係出現轉化，A漸信「自己重要」。惟吸毒問題持續侵蝕信任，A過往「我不重要、不信任」的創傷持續影響其情緒調節能力，母女常觸發高衝突。母女界線持續黏結，習慣親職化的A憂家破裂，動念戒毒以為母模範。根據發現提出單親藥癮家庭研究與輔導建議。

關鍵詞：單親母藥癮、成長逆境、跨代藥癮

*本篇通訊作者：鄭青玫，通訊方式：may6371500@nhu.edu.tw。

感謝匿名審稿委員所給予之寶貴意見，對本文品質的提升深具助益。

感謝研究參與者受訪，對藥癮家庭親子互動、童年逆境影響的了解深具貢獻。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檢視國內藥癮女性組織單親家庭者不少，但以單親藥癮母子次系統互動的研究卻顯稀少，以成長於單親藥癮家庭之子代對成長逆境的知覺為探究焦點更是闕如。本文主要探究一位歷經藥癮母單親養育長大之女兒（代號A），其經歷的成長逆境、所受之影響，主要關注在成長逆境、藥癮、單親母親的養育管教、母女關係緊張、青少年藥物濫用發展等議題。

二、文獻回顧

（一）成長逆境對個人的影響

個體成長過程經歷逆境，進入成人時期其身、心疾病風險大增。成長逆境（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以下簡稱 ACEs），指發生在個體青春前期（0~18 歲）所遭遇的各種虐待、家庭功能障礙和忽視。對 ACEs 最早的研究始於 Felitti 等人（1998），其將 ACEs 分為七類，3 類虐待（心理、身體和性虐待）和 4 類家庭功能障礙（母親受暴、與濫用藥物的家人同住、患有精神病或有自殺傾向、曾被監禁）。其以成人做回溯調查，研究發現 1.超過 1/2 受試者報導至少經驗一類的 ACEs；2.不同 ACEs 間彼此相關聯，經歷越多者，日後可能經歷越多重的健康問題；3.ACEs 的數量與成人時期出現高風險行為之間呈現等級關係；相較於無經歷者，經驗四類或以上者，成人時期出現酗酒、藥物濫用、憂鬱和自殺企圖的危機增高為 4 到 12 倍；4. ACEs 與成人時期的生理疾病呈現等級關係。該研究揭示 ACEs 的普遍性、累積的 ACEs 對成人時期的身、心健康、內化和外化行為問題產生深遠的影響。Scott 等人（2013）進行 ACEs 各類別共同出現的狀況，研究結果支持三因素模型：虐待（身體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家庭功能障礙（家人藥物濫用、父母入監、家人患有心理疾病、母親受

暴)和混合(單親、沒有父母、情緒／生理忽略)。

ACEs 領域的研究蓬勃發展(Hunt et al., 2017; Houtepen et al., 2020), Afifi 等人(2020)調查 1002 名加拿大青少年,研究發現 ACEs 經驗與青少年物質使用機率增加有關。Friestad 等人(2014)調查女性囚犯的 ACEs 經歷,發現女性囚犯於成長期間遭受情感、身體和性虐待的機率高,分別為 39%、36% 和 19%,情感和身體上的忽視分別為 31%和 33%。縱觀整體 ACEs 報告,僅 17% 無 ACEs 經歷,34%的女囚經歷了 5 次以上,ACEs 的累積顯著增加了自殺未遂和藥物濫用的風險。Evans 等人(2019)的研究發現,鴉片類藥物依賴男性和女性之 ACEs 的患病率都很高(>80%),超過四成的參與者暴露於 3 種以上 ACEs 類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兒童期性虐待和情感忽視;暴露於 3 種以上 ACEs 的女性,更容易共症情感性或焦慮障礙。Molina 與 Whittaker(2022)整理文獻指出,經驗 ACEs 使心理疾病的風險增高,例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情緒調節困難、依附困難、不當用藥風險增高。

ACEs 研究領域的豐碩使後設分析也相當可觀,對 ACEs 的成因與影響了解更多,例如 Pilkington 等人(2021)納入 33 篇研究,一致的支持成年早期的適應不良模式與童年虐待和受忽視的歷史有關。Hughes 等人(2017)的後設分析共納入 37 篇研究,研究發現:與沒有 ACEs 的個體相比,擁有至少 4 個 ACEs 的個體,其所有的健康結果風險都更高;其中,ACEs 與身體缺乏活動、超重或肥胖、糖尿病的關聯較弱或適度(合併優勢比 ORs 小於 2);與吸菸、酗酒、自評健康狀況不佳、癌症、心臟病和呼吸系統疾病關聯為中等(ORs 為 2 至 3);性冒險、精神疾病和酗酒問題則為強度(ORs 超過 3 至 6);與有問題的藥物使用以及人際暴力和自我暴力之關聯最強(ORs 超過 7)。Miu 等人(2022)指出 ACEs 最近的研究趨勢主要集中在理解潛在的心理機制,其中,情緒調節能力是突出的因素,其納入 215 項符合條件的研究進行後設分析,結果表明,ACEs 與情緒調節困難以及習慣性的反芻(指重複的進行負向思考)和壓抑呈正相關;這些情緒調節措施與精神病理呈正相關。Mansueto 等人(2021)分析 18 篇 ACEs 研究,發現在非臨床和臨床人群中,擔憂和反芻似乎在童年遭受虐待或忽視的成年人中很常見;反芻似乎與惡化的臨床症狀有關,例如嚴重的精神症狀、憂鬱、煩躁、自殺意念、認知問題、創傷後壓力症狀和攻擊性。以上顯示,經驗多重 ACEs,與個體之身體心理疾病風險增高有關,例如自殺未遂、創傷症候、依附困難;特別是經歷忽視與虐待,或經歷多重 ACEs 與物質使用的增加

率有關；情緒調節困難以及習慣性的反芻是重要的心理機制。

國內，童年逆境主題的探究（曾瑋琪，2022；廖建銘，2022；梁碩娟，2022）近期增加中。Beal 等人(2019)回顧 ACEs 文獻指出，三十年的研究發現，強調了成長逆境和虐待對個體社會心理功能、風險行為的長期負面影響。ACEs 的研究使識別童年創傷更顯重要，激發創傷知情社區和實踐的運動（the movements to develop trauma-informed communities and practices）。

（二）親代藥物依賴是子代經驗成長逆境的危險因子

近來學者關注不同類型的 ACEs 產生的不利影響。在 ACEs 三因素模型中，親代藥物依賴被歸為家庭功能障礙（Scott et al., 2013），在 DSM-V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中，物質使用障礙症將物質依賴與物質濫用合併，其包含了從輕度到重度的慢性復發，或強迫性使用藥物。個體因受藥物直接極度活化大腦酬賞系統，正常活動便被忽略。各類診斷標準為十二個月內，至少出現該類藥物之兩項有關心理、生理依賴、社會功能損害的症狀（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2014）。

Lipari 與 Horn(2017)以 2009~2014 年美國全國藥物使用與健康調查數據資料庫指出，過去一年內大約有 1/8 之 17 歲以下的兒、青，與家中至少一位是患有藥癮問題的父母生活。與藥癮親代同住，子代經驗逆境，受虐風險增高；親代使用非法藥物，子代出現適應問題風險增高（Forrester et al., 2016）。Beal 等人（2019）的研究結果表明，在具有複雜創傷史的青年中，重要的是要區分意外悲劇（例如，自然災害、父母離婚）、家庭不穩定（例如，父母濫用藥物或心理健康問題）和家庭暴力（例如身體虐待或性虐待）的不同風險，該研究發現家暴與較差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質量有關，而家庭不穩定與個體的吸煙和吸食大麻有關。Bryant 等人（2020）以美國一家健康中心的 4378 名患者做調查，結果發現 84.8% 的患者報告至少經驗過一次 ACEs，49.1% 的患者的 ACEs 評分 ≥ 4 。在控制種族/民族和性別後，父母濫用藥物、身體虐待和性虐待是患者發生任何物質使用障礙的最強預測因素。

單親女性藥物濫用家庭之子代，其成長逆境值得關注。國內女性使用非法藥物之統計顯示（呂淑好、白其卉，2018；呂淑好，2008；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21），20-50 歲女性藥物濫用者不少，女性毒癮犯家庭組成爲單親者多，育有一名以上子女者多於無子女者（蔡田木、賴擁連，2014），女性藥

物依賴者處於育齡階段，不僅對女性個人，還會對母職、妻職功能產生巨大影響。單親文獻顯示「女性複合單親弱勢」其社會不利的處境多於男性，貧窮、生活處境議題尤受關注（黃明玉等人，2014），本研究以藥癮家庭親子相關主題在國內碩博士論文系統與華藝期刊系統做文獻檢視，僅七筆（劉筱雯，2008；張嘉珊，2013；鄭寶玉，2010；鄭于沛，2013；鄭于沛、陳俊全，2014；鄭青玫，2018；殷開薇、蔡佩真，2019），其中，以單親藥癮家庭為主要探究者無。整理這七篇文獻內容，該類家庭通常有孤立邊緣、經濟困境、生活不穩定、親職失功能，子女受疏忽、受虐或目睹家暴經驗高、次系統間界線混淆、子代親職化，表現出不適合發展階段的角色倒反，承擔著被迫照顧家庭照顧父母的現象、出現內化或外化問題等。綜上，國內藥癮家庭親子研究稀少，以女單親藥癮家庭親子探究闕如，成長於女性單親複合藥癮環境，子代身處雙重弱勢環境，在藥癮母親所建構之親職環境裡，子代可能經歷那些逆境與影響？成長逆境中的親子互動為何？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三）親代和子代藥物濫用的代間傳播

國外文獻已經注意到藥物濫用跨代傳播的問題，藥物濫用父母是子女藥物使用、濫用和依賴的高風險因素（Lipari & Horn, 2017；Sadat-Shirazi et al., 2022），但當前對藥物濫用跨代傳播的原因仍知之甚少（Kendler et al., 2015）。Kendler 等人（2015）的研究發現，基因之外，藥物濫用父母所提供的撫養環境對子代非法藥物使用有高風險影響；Kendler 等人（2020）之研究確定了六個影響子代藥物濫用的最重要風險因素，包括：(1)婚生父母的犯罪行為(2)社區偏差同儕(3)破碎家庭(4)父母藥物濫用(5)高風險父母的犯罪行為(6)家庭搬家次數，其結論是，藥物濫用從高風險父母傳給子女的部分原因是一系列潛在可溯性風險因素的影響。以上六大風險因子，家庭即佔了五項。

國內一如國外，有過度忽略單親家庭藥物濫用的探究現象（Hemovich & Crano, 2009），藥物濫用跨代傳播的探究更是闕如，當國內女性藥癮者單親為多，女性、藥癮者，複合單親家庭結構，親子生活處境恐較一般女單親親子生活更為不利；發展心理學家指出要進行關係發展路徑的研究，個體內部知覺的檢查對於理解關係路徑或關係重組背後的機制特別有用（Branje et al., 2011），本研究關注成長於藥癮女單親家庭下的子代，處於弱勢的高風險環境，其所經驗之成長逆境為何？成長逆境下，子代所受影響為何？子代藥物濫用之發展歷

程為何？子代知覺其與成長逆境的關聯為何？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二、研究問題

基於以上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問題：

（一）歷經藥癮母單親養育之用毒青少年，所歷之成長逆境、所受影響為何？

（二）歷經藥癮母單親養育之用毒青少年，如何因應成長逆境？

（三）歷經藥癮母單親養育之用毒青少年，個人藥物濫用的發展歷程為何？自覺個人的藥物濫用與成長逆境、母女關係互動之間的關聯為何？

貳、研究方法

一、質性敘說研究

本研究旨為瞭解一位成長於藥癮母單親家庭之女性子代，其所經驗之成長逆境與所受影響，採質性敘說研究方法進行探究。由於藥癮主題常與社會汙名有關，藥癮者本人與其家庭對外常以隱匿因應（鄭青玫，2018，2021），要進行探究，資料蒐集並不容易，加上，從子代的角度探究藥癮家庭親子互動的研究稀少，學者（潘淑滿，2003；齊力，2003）指出當所關注的生活現象稀少，屬探索性、主題是互動、角色或者是關係、發展，重視的是研究參與者身處在所探究現象之情境脈絡裡的主觀知覺與所賦予的意義，企圖從深入探索中了解其豐富的意義，質性研究是適合的取向。而本研究旨趣是成長逆境中的母女故事，關注的是女兒的知覺，敘說研究為社會建構互動論，關注的是個體的真實，認為個體可以透過敘事詮釋自己重要的人際經驗與所受的影響（Gergen & Gergen, 1988），所以，質性敘說研究是適合本研究的設計。

二、研究參與者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參與者所設條件是滿 18 歲、其親代和研究參與者本

人有吸毒問題、確定研究參與者當前無受暴、無思覺失調症狀且對成長逆境中的親子互動有清楚記憶者。研究參與者A符合受訪條件，係透過研究者工作網絡同仁介紹招募而得。A總共受訪2次，約10個小時。A之基本資料如下：

(一) 單親家庭結構、居住地：A之外祖代離異、A母未婚生姊弟二人（手足差11歲）。多數時間A與A母不是與外婆同住（中部）就是與外公同住（南部）；A幼兒園大班、小五，與A母曾幾次短暫分居；小四，A與A母曾在外短租。

(二) 成長過程主要管教者：小三前為外祖代，小三後為A母與外祖代；外祖代為權威管教方式，A母為放任、權威管教方式。

(三) 非法藥物使用史：A母從15歲時初用；A10歲時發現A母使用安非他命；A16歲時，A母向A坦承用毒。A之用酒、藥史，A國中初期即開始酗酒，國三下，A於朋友邀約下使用咖啡包，受訪時，A因使用毒品第四次受管束勒戒。

三、研究工具

包括基本資料表、家庭圖、訪談大綱、研究團隊。

訪談大綱部分，本研究主要關注一位歷經藥癮母單親養育之女兒的成長逆境與其所受影響，根據研究問題發展訪談大綱：(1)不同時期，女兒所經驗之成長逆境、所受影響與因應：不同時期，母女之間的關係為何？常有的互動為何？造成這種關係的原因為何？與母女間曾經歷那些事或衝突互動有關？（追蹤母女互動、女兒如何知覺、所受影響、因應）(2)母親用毒、自我用毒與母女關係互動、所受影響：知悉母親用毒的歷程為何？母親用毒對母女互動關係的影響為何？個人用毒的發展歷程為何？與用毒母親的關聯為何？對母女互動關係的影響為何？

研究團隊部分，包括研究者、訪談員、謄稿員、校稿員與協同編碼者。研究進行期間，研究者扮演的角色與任務包括：研究者、招募研究參與者、訪談員、謄稿員訓練者、校稿員、資料分析者等。編碼者有二位，含研究者，皆為輔導與諮商系所博士，皆領有心理師證照，實務工作經驗皆達20年。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資料蒐集

本研究使用半結構式訪談大綱，訪談過程以A之家庭圖（繪製家庭成員間之親密度）為基（A共繪製三幅），以A之回憶與敘說為主，彈性調整訪序。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取敘說研究之整體——內容分析法完成資料分析。Lieblich 等人（1998）的「整體——內容」敘說分析是指將焦點置於個體完整生命故事所呈現的內容，研究者藉由對個體生命故事片段內容的理解，進而整合出故事的整體意義。依其建議的分析步驟，本研究分析程序如下：

(1)母女互動與母親用毒、子代經歷童年逆境、兒虐歷程的脈絡浮現，此階段兩位編碼者先各自反覆閱讀逐字稿，標記意義單元、進行命名，之後聚會討論，並對歧異求取共識。(2)撰寫整體印象，由研究者根據研究問題撰寫，彙整出一份約4000字整體印象描述文。(3)決定整體故事當中焦點，彙整的概念範疇包括單親母的養育與管教（分為女兒發覺母親用毒前、後的養育環境與管教），女兒所經歷成長逆境、受兒虐、女兒因應、對自我影響、母女關係轉化、女兒對藥物濫用的發展與維持的知覺等數個概念範疇。(4)彙整檢核，將研究結果重新回到逐字稿與意義單元文本中進行檢核，以確認所得之分析結果具有邏輯上的合理性。

（三）研究可信賴性

以下對資料蒐集與分析的嚴謹性做說明。

1.資料蒐集

- (1)參考藥物濫用、家庭系統理論、成長逆境、兒虐文獻以對家庭互動敏感；還參考青少年發展、華人文化自我等文獻以形成訪綱。
- (2)面訪地點在研究參與者所處之保護機構，為其熟悉、安靜，避免受擾的場所。
- (3)以溫暖友善的態度建立關係，於充分的研究說明與澄清疑義後簽訂研究參與同意書、建立基本資料表、家庭圖。
- (4)訪員長期從事強制諮商，全程以研究參與者熟悉的國台語進行訪談，

從維持友善的關係促進研究參與者深描以維持資料蒐集品質的可信賴性。

2.資料分析

- (1)文本檢核：首次文本檢核，研究參與者給.85 評分，之後經補訪澄清補齊相關脈絡資料。
- (2)協同分析：與協同編碼者先各自分析資料之意義單元，再聚會討論，針對歧異達成共識完成編碼。研究者於完成主題分析後，請協同編碼者進行檢視、討論歧異，力求資料分析的嚴謹與可信賴性。

（四）研究倫理

單親藥癮家庭子代屬脆弱個案，無害、自主為本研究最優先考量，研究倫理執行如下：

1.訪談初始即執行知情同意程序：介紹本研究主題與目的、研究流程、潛在風險（舉例說明研究參與者於敘說成長逆境之經歷時可能觸發個人創傷，引發身心波動）、保護說明（視研究參與者需要媒合所需資源，例如提供情緒支持、轉介諮商服務）、清楚告知可中途退出與中止、匿名機密性、家暴安全評估，並進行疑問與澄清才簽署同意書。

2.公正與合理原則：研究者抱持尊重、感激與不斷反思的態度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訪談結束時提供了一份小禮品致謝；於獲刊登期刊加註對研究參與者的感謝。

3.將所有訪談原始資料包括錄音檔、訪談文本、札記和資料分析記錄等作匿名保存。

4.告知研究資料於獲刊登三年後銷毀。

參、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發現

本研究故事主角為子代A，其母親（以下簡稱A母）為隱晦的安非他命使用者，A成長於單親母隱晦用毒之養育環境，所受成長逆境繁多，研究發現共包括三個歷程主題：(1)童年前期（指A國小中年級（約10歲）以前）：A母未婚懷孕期間因用毒遭A生父拋棄，A經驗單親；A母開始工作後，A自此長期受母親情感疏忽拒絕；A因母親的經濟困境經驗居處不定，產生「沒有人要我」的知覺，A以伺機撫慰母親因應，希冀加強母女連結。(2)童年後期至青春前期（指國小中年級至國二）：A發現A母的吸毒秘密，A以否認、隱瞞因應。不久，A出現行為問題，原本只受疏忽拒絕的A，開始受母肢暴管教。面對不是疏忽放任，就是施暴不當管教的A母，只要思及母親用毒、職業低賤，A常經驗羞恥；A對外隱匿，對內積恨，最後以暴因應。(3)後青春前期（指國三之後至今）：A以翹家止母施暴。A受同儕邀約用毒；A知覺A母憂被拋棄、轉以釋權展愛處理A之吸毒問題，母女關係出現轉化，A逐漸相信「自己重要」。惟吸毒問題持續侵蝕信任，A之脆弱自我仍時被牽動，母女界線持續黏結。A覺察複製A母以吸毒因應關係問題與壓力；A憂家破裂，動念戒毒以為母模範。（考量研究問題一，A之成長逆境經驗、所受影響，研究問題二，如何因應成長逆境，研究問題三，A知覺個人藥物濫用與母女互動關聯，為交織互動的發展歷程，為求於行文之間理出發展脈絡、減少書寫重複性，以下以三個歷程主題做研究發現說明，書寫過程，用毒、用藥會交替使用，皆指使用非法藥物）。

（一）童年前期

本研究A母於未婚懷孕期間，因用毒引發親密關係衝突，A母最後被A生父拋棄，A開始經驗多重逆境，包括單親、受A母情感疏忽拒絕，A母因經濟困境致A居處不定，A產生「沒有人要我」的知覺，A伺機撫慰母親，希冀加強親密，但A還是受母持續疏忽拒絕，母女幾乎切斷連結。（以下書寫研究發現時會於適當處以：「」（出自訪談對話編碼第幾句），引用A原來受訪之內文）。

A母15歲未婚生女，孕期間因用毒與A生父衝突鬧分手，祖母以重男輕女為藉口：「不要我」(0024)，A甫出生即由已離婚分居的外祖代和單親母照顧。4（或5）歲時母親開始工作，A對母親存有的印象是漠然、疏忽拒絕，例如，幼兒園時有一次迷路被送返：「擔心我的人阿嬤欸，不是她」(1083)；甫上學即遭同學恥笑單親，傷心的A詢問母親緣由卻受拒，A轉而詢問外婆。A記

憶中常感母親生理、心理缺位：「我媽…不是在上班，就是在男朋友家」（0636）…她在我的生活中…卻是沒聽我說過半句話的人」（0905）。

十歲前，A的自我知覺是：小皮球、沒有人要我。母親因經濟困境，無力支付撫養費用時，外祖代會：「不想顧我…踢來踢去」（0056），多次的居處不定，A形成：「我沒有人要」（1365）的知覺。另外，受A母疏忽拒絕，影響A：「妳是不是不要我，才會不理我」（1788）。三年級，A識字更多後，以偷閱A母日記了解A母狀態，A以伺機安慰A母，希冀加強母女連結。察覺母女關係與他人有異，A主動與母聊天卻受拒，母女連結幾乎斷裂：「跟她聊，她每次都拒絕我，我就不聊了」（0733）。A表示長期被疏忽拒絕：「好像被這個世界驅逐在外…小時候一直覺得是被這個世界遺忘的小孩…直到現在還找不到我的存在價值」（0139）。

（二）童年後期至青春期

1. A發現母親鎖門的吸毒秘密，憂母被抓、忠誠顧慮，A以否認隱瞞因應

探尋母親房間的化妝品、飾品是A童年中的美妙回憶，但房中特定位置的觸碰總換來母親：「大罵…把我趕出…再繼續鎖門」（0970）。小三時，由A母的日記本知道父母分開與A母吸毒有關。有一次A母未收好器具，A發現：「黑黑的…兩根吸管…阿嬤…叫我報警抓媽媽」（0638），憂母被抓、怕母憤怒，A以否認、隱瞞因應：「眼睛沒有看到的都不算」（0965）。

2. 受疏忽，因應孤單膩於偏差同儕；出現行為問題，開始頻受A母肢暴管教

(1) A母疏忽未覺A憂鬱、感覺貧窮、受性騷、與學校失去連結；A以禁制需求、隱秘因應

小三，A因人際問題憂鬱而自殘，母未發覺：「血…手指頭藏起來…裝什麼事情都沒有」（0120）。小四，母親與家人衝突被掃出門，首租在外，A經驗身體疏忽：「我會等她起床買飯給我吃…沒有力氣叫，太痛了」（0792），貧窮經驗使A少再跟母親開口表達欲求。這段時間，A開始沉迷電腦、上學出現不穩定，學校通知家長後，母僅要A自行請假處理。兩件可怕的事發生於租屋期間，其一，A幫母買

餐，險遭車撞；其二，A因母親工作被臨托給A母男性友人（後來知道是藥頭），A遭性騷，雖掙脫，但擔心被母責打，A隱秘處理。

(2)A因行為問題常受A母肢暴管教，A對外隱匿，對內積恨，終以暴回擊

退租後返回外公家居住，因孤單常往外跑，A認識、膩於偏差同儕，因此常目睹吸毒、販毒。因屢晚歸，A開始常受家人、A母體罰管教。小五，A出現拒學，A母因孕疏忽，但縱使學校通知家長，A母通常只是要A請假。A曠課拒學、在校行為問題持續發生，兩年內，A四度轉學，不斷遷居。最後，因A母生產，母女才返外婆家穩定居住達三年。此期間，A常因行為問題受A母失控虐待：「掐我…抓著我的頭去撞牆」（0518），母女關係變得十分疏離：「我甚麼事情都不讓她知道」（0989）。國二輔導老師發現A受家暴，欲通報止暴，但A因覺得：「被家暴…丟臉」（1272），A選擇隱秘。而家人因認同：「小孩子不乖，就是要打」（0891）亦從未制止。

受虐待，A感覺羞恥，常不斷反芻母親的不是，A氣憤的評論母親不適任，包括疏忽小孩，未善盡親職：「妳怎麼…這麼異常…正常的媽媽就是在家裡…去工作…誰會常常…鎖房間…三餐都不用」（1228）、迫未成年女兒養家：「憑甚麼是我啦？」（1055），憤怒、羞恥是A常有的感受，但也交雜著對母親的心疼：「暴露…家庭不正常…跟女兒要錢…最討厭人家看不起我的媽媽了…這一部份的丟臉是心疼」（2072）。而母親工作愈趨低賤：「怕人家知道…我都不講啊」（1050）…小吃部…（1302）」；母親吸毒亦讓A輕視、憤怒、無助、羞恥，A以裝傻隱匿因應：「荒謬（大聲）…有誰的父母在吃毒（台語）…我很看不起，可是…知道她瞞的用意在哪…很心疼…就會假裝不知道」（1987）。

面對施暴，A的態度從害怕、順從，走向對峙、抵抗。從小學高年級時A覺得母親：「打小孩出氣，可悲，可憐」（2287），到國中時轉為憤怒，開始回嘴挑戰母權。此時，A母就會以更強烈的肢暴回應，但事後，A母就會以自己躁鬱症解釋脫軌行為，A拒絕接受：「有病是妳的事…打我就不對」（2194）。恨意初始仍受倫常觀念、依附約束：「真的很恨她…一直揍我…畢竟她是我媽…我沒有資格恨她」

(0683)，國二，怨恨擊潰倫理、依附：「鐵了心，恨她了」(0864)，A首次逆倫回擊，發現未必會輸，母女互打漸成常態。

(三) 後青春期

1. A翹家、用毒，A母改變管教方式，轉為釋權展愛，A漸信自己重要

國三時，原本受肢暴管教的A開始對抗母親，之後，往往變成母女互打，A最後甚至開始翹家。幾次翹家是A對嚴重受暴的強烈抗議，這給母女彼此重新思索關係的機會：「看到簡訊我都好想哭喔…我好想媽媽」(0942)；A第一次翹家後回家：「她…在哭欸…道歉…怕到了吧？…我翹膀硬了阿」(0945)。回家後，A維持挑釁，母棄體罰管教，開始釋權：「(訪員澄清：妳媽媽做了很大的讓步齣？)很大啊，摔門…罵髒話…翹家回來就大尾了…大不了就不要住啦…然後她就會…哭(1320)…怕我不要她(2321)」。

畢業前夕，A的朋友邀約用毒，家人毫不知情。直至A與警察衝突，被驗尿、拘留，母才發覺A的吸毒問題。A表示會陸續用毒，主要是用來處理自小就有的睡眠困擾，情緒陷入憂鬱，或經驗存在虛無有關，A表示：「家人…從來沒有看過我的內心…用藥只是為了尋求開心」(1405)。

母親展愛，母女關係開始轉正。當一再被抓受觀護，A母經外公疏導，從不探視到展愛關懷，母女關係發生變化：「我又進少觀所了(第三次)，…我跟她說『我找不到人生的目標…妳走開…』…她就說『…找不到就繼續找(內容多為鼓勵、不放棄)』，事後我很後悔…跟我媽講…很對不起她…感情就變得比原本的好…甘願低頭了…怕說她真的放棄我」(1412-1420)。

母持續釋權展愛，A逐漸卸下憤恨盔甲，彼此的溝通更多，例如：「她說…想給我找一個爸爸，所以才會交男朋友(0106)…男方家長不同意…我是拖油瓶」(1306)。關係修復過程，A母要求A尊重，A開始正面回應：「尊重她啦，然後就是會比較好」(1856)，A也嘗試表達需求。A表示這些改變不容易也不習慣。母愛影響擴及到A與同儕的相處，過往A常因人際問題暴怒或憂鬱自殘，現在自殘稍有減少。

母女更多的正向互動，還包括母親放下身段解密吸毒。翹家回來

後，A最大的不同，就是敢在母親鎖門吸毒時敲門。疑女知悉，A母最後鼓起勇氣向A坦承：「鎖門…隱瞞就是擔心女兒看不起自己，…我說『我知道妳…在用阿』…其實…我看不起她用藥，可是我都要跟她講『我沒有』」（1557）。16歲過完生日，A首次對母表達：「不要吃（藥）了」（1198）。

陸續澄清誤會後，A發現：「我在媽媽心中應該還是重要的，只是她沒空理我…說小時候…她想要工作賺很多錢，讓我過比較好的生活」（0937）。

2.親職化使界線持續黏結

(1)吸毒持續侵蝕信任；共識避談因應仍難免觸發高衝突，實與親職化使界線混淆有關

母女逐漸親密，彼此約定「不用藥、出現突發事情要先告知對方」，A自覺開始擁有正常的家。惟吸毒議題未解，持續侵蝕信任：「我們之間的距離只剩下一步…我不相信她…不吃藥」（2318）。A也因母持續吸毒，持續經驗著逆境：「吃安非他命的人…（陳述母親幻覺內容）…我變得神經兮兮…不敢睡覺…（母若不吸毒）我會開始相信說…我講的話她真的…有接收到」（2334）。

避談吸毒是母女的共識，主要目的是為守護對方面子。但是，吸毒與隱瞞常常雙綁，後遺症是拉出關係不信任議題，這往往引爆母女的高衝突。A自小對母親「另有實情／欺瞞」十分敏感，因為與A過去成長「受拒、不信任」的創傷有關：「我一直都覺得說我是沒有人要的小孩…她心情不好…就是跟我說『走開，我好累、我要睡覺，不要吵我』，就是很標準的拒絕」（1797）。A看了日記後，才知道A母另有隱情：「原來我每次都是掃到風颱尾…吸食器就是一個很經典的瞞…偷偷的吸食…就算是善意的謊言，我都覺得妳在瞞我、妳在騙我」（1830）。

因吸毒引發的高衝突，其實與A在生活中，與吸毒母親的角色發生倒轉，A親職化的擔任著照顧母親的角色有關。由於A母常因吸毒闖下爛攤，A常在盛怒中幫忙收拾，隱瞞成為兩人生活中常有的戲碼，也因之常引發母女衝突：「比如說她懷孕，連我朋友都知道了，

我還不知道（大聲激動），這是最慘的…我會覺得妳在瞞我…妳不信任我，妳才不會第一個告訴我」（1850），說歸說，氣歸氣，A還是會幫忙籌錢協助母親墮胎。因之，「關懷的控制」是應對母親欺瞞的後遺症。小時候A以偷閱日記掌握母親狀態，化解「媽媽是不是不要我」的疑慮，A以伺機慰母加強母女連結。長大後，A加碼以看A母FB、與A母男友、朋友交好以掌握母親的動態。

母女彼此的關愛濃烈，常以斷絕關係、放棄不愛，脅迫對方停毒，A習慣親職化使母女界線明顯混淆：「『妳如果再讓我知道…我們就到這裡就好』…要時時講…我怕她堅持不住，又跑回去吃」（1566-1572），母子就在希望更親密，但卻不信任迴旋。

(2)覺察複製以毒因應關係壓力；親職化的A憂家破裂，動念戒毒以為母模範

A用藥後，對母親因為壓力過大（經濟、養家、用毒、覺得孤單不被了解）與用藥的關係有更多理解，包括用藥與情緒處理方式，自虐、虐人：「我跟她有一個習慣就是，關房間捶牆壁捶門…她只要用藥就有這種動作…用完（藥）難免情緒會很大嘛」（1211）。

A意識到吸毒母親對自己持續用毒的影響：「吃藥是我自己決定的…可是我後面吃藥真的是跟她有關…去年吧…她不跟我說話，我…很難過…吃藥來發洩、轉移注意力…就變得跟她一樣」（2210）。覺察複製與A離家、閱讀、社工協助有關：「後來回家…就變成她那個樣子…一個我不喜歡的樣子；…這本書，我了解說我越來越像她了…我討厭她吃藥，我也有（2208）…根本跟她一模一樣…搥牆…遷怒更是…社工師…他會幫我整理…後來會覺得…當別人的翅膀不是一件好事…自己都飛不起來了」（2502）。

惟雖有以上覺察，親職化似已成為習慣：「有能力…就做吧…畢竟是自己的媽媽」（1916）。現在動念想戒毒，親職化仍是主因：「爲了講她…我才戒毒…我做什麼事情從來都不是爲了我自己」（2213），細究A親職化背後的動因，與A「憂家破裂」有關：「我媽有可能會被抓…就沒媽媽了」（2364）。

二、綜合討論

根據研究發現進行綜論：

（一）A所歷之成長逆境、影響

1. A所受成長逆境多重，與A母身處性別階層弱勢、用毒所致有關

依據 Scott 等人（2013）原初對 ACEs 之分類：如頁 1，共十類，本研究子代所受成長逆境多重，有單親、受情感疏忽、身體疏忽、肢虐、與吸毒母親同住、曾受藥頭性騷擾、A 母長期使用安非他命，使 A 承受母親的（躁鬱、思覺失調—幻想）症狀。Felitti 等人（1998）指出，成長逆境的數量與成人期出現高風險行為之間呈現等級關係，經驗四類或以上者，成人期出現酗酒、藥物濫用、憂鬱和自殺企圖的危機相較於無經歷者增高 4 到 12 倍，對成人期的身心健康、內化外化行為問題產生深遠的影響。本研究子代從童年時期即出現憂鬱自殘，進入青春期後出現更多行為問題，例如高親子衝突、師生衝突、逃學翹家、酗酒、藥物濫用等，本研究發現支持該結論。

Felitti 等人指出不同逆境間彼此關聯，以本研究來說父權文化下成為單親、A 母用毒，兩者的交乘是 A 經歷成長逆境之原始肇因，交織出多種逆境。

首先，就肇因「身處性別階層弱勢」做說明：A 母未成年生女、吸毒釀衝突分手，祖母以孫女性別為藉口阻斷婚事使成單親。父權文化下，一般男性單親若需要，祖代多會主動協助照顧子代，子代通常可以穩定的住在祖代家，但 A 因 A 母未婚生女遭拋棄，A 成長於跨代單親的環境，因 A 母未能穩定支付外祖代 A 的照顧費用，使 A 經歷居處不定；單親 A 母追愛，屢遭男友家人嫌棄有拖油瓶，無法圓完整家庭的美夢、A 入小學隨即因單親遭霸凌。以上，與現存女性未婚單親文獻（謝玉玲等人，2014）一致，不論是親代、子代，皆易因單親受社會汙名。黃明玉等人（2014）指出，因性別階層弱勢、學歷低，單親女性容易出現經濟困境，本研究 A 母亦出現相同問題，A 受 A 母經濟困境的影響，被迫常常易地居住。另外，A 母正處追求親密任務滿足的階段，從 A 母一直在幫 A 找爸爸、拒絕回應 A 詢問單親成因來看，A 母似乎受困於被拋棄的創傷，推論囿於家要完整（雙親）的信念，A 母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工作、親密追求上，使 A 受情感疏忽。

其次，A母用毒，加劇子代的成長逆境。用毒增大開銷，需要更長時間工作，A母以安非他命維持清醒、處理壓力與情緒問題，隨後的耗弱惡化親子疏忽拒絕的問題。母親用毒惡化親職於藥癮文獻早獲支持（呂淑好、白其卉，2018），惟進一步深究，A母持秘隱瞞（單親成因、用毒），似乎更是親職疏忽、親子衝突產生惡化之主因，探討隱藏祕密的相關文獻（Slepian et al., 2017; Slepian et al., 2020; Slepian et al., 2020; Slepian, 2022）指出：秘密通常與羞恥的情緒相關；持有秘密與較低的幸福感有關；當一個人持有秘密，則此人常會處於自發地走神狀態。A母未婚生女被拋棄、用毒，兩者都容易因社會汙名帶給A母羞恥，應對「追求親密卻屢被拋棄、用毒的立即性需要與用後的羞恥」，其實A母應該是耗費心神的，而鎖門一拒絕受打擾是最容易處理的方式。文獻指出保密通常牽涉到包含監控、表達抑制和改變，這會大量消耗監管資源，並導致關係較低的交互質量（Slepian, 2022）。Lijtmaer（2017）指出代際間的秘密，親代留下的空白對子代產生負面影響，以本研究A母這兩個祕密而言，A母雖隱藏不談，皆可能使A母長期身心不在，情感疏忽子代。

2.成長於受疏忽拒絕的逆境，影響A形成「不要我／我不重要」的負向自我知覺

本研究A母需要賺錢養A，平時主要的照顧者為離異的外祖代，卻因母親的經濟困境被迫常常搬居、轉學，子代無法在其成長過程與照顧客體（外祖代、母親）產生信任安全的依附，引發A被拋棄的焦慮，對自我存在的價值質疑，加以A母的情感疏忽拒絕，A形成「不要我／我不重要」的負向自我知覺。許慈芳（2014）指出，離婚單親家庭子女的遷移影響子女適應。鄭于沛與陳俊全（2014）指出藥癮者所組織的家庭，生活形態不安定，經常產生經濟困境、居無定所、不當管教，破壞親子信任安全依附的發展。Tufail 等人（2015）的研究支持藥物濫用患者感知父母接受一拒絕、抑鬱症狀和自尊之間存在顯著關係；沮喪和自尊之間為顯著負相關。以上，顯見「父權社會性別階層下，女性、跨代單親、母親持密用毒」交乘出的初始照顧環境貧脊，影響親職功能，衍生種種成長逆境對A與母的依附、自我產生負向且深遠的影響。

（二）因應成長逆境

本研究A於小三才直接看到A母的用毒器具以及殘留物、並由外婆證實，本文論述即根據此時間點為A母隱晦吸毒的開始。以下說明A之行爲問題與受疏忽兒虐之發展脈絡的關聯，以及面對逆境，A如何因應。

1. A出現內化外化行爲問題，與母隱晦用毒，A受疏忽和肢暴管教或有關連

(1) 受疏忽拒絕斷母女連結；因應孤單，A從親職化轉成膩於偏差同儕

幼童時期，A即因A母忙著工作掙錢，遭受情感疏忽，經驗孤單。A初始以親職化策略（偷閱母親日記，伺機安慰壓力大的A母）加強母女連結。此處，A於童年時期即主動發展親職化行爲引人注目，Dariosis 等人（2023）整理親職化文獻指出，父母有疾病，例如愛滋、藥物成癮，家長失親職功能是子代親職化，出現角色逆轉和角色超載的常見根源之一。A發展親職化行爲時，A母是否開始用毒，受限於A的記憶回溯，本研究並未能確定先後順序，但與A發現母親吸毒的秘密是同一年。可以確定的是，受疏忽拒絕，A以親職化討好母親加強連結，母女親子界線開始出現混淆。

主動與母親近，卻遭母持續疏忽拒絕，A開始向外追求同儕隸屬。A 10歲時，首次因同儕問題出現自殘，此後，因人際陷在情緒裡而自殘是A時有的現象。從A因結交偏差同儕、出現行爲問題被母親嚴重體罰，但A還是要與偏差同儕一起，顯見，追求隸屬，人際界線混淆或許是A陷膩偏差同儕之主因。Hunt 等人（2017）的研究發現，有幼兒期逆境經驗的兒童，年僅 9 歲就可能開始出現內化和外化行爲問題，本研究A出現行爲問題約莫 10 歲，與文獻大體一致。Haslam 與 Taylor（2022）分析 21 篇忽視的研究指出，情感疏忽與關係質量下降有關；忽視會增加參與偏差同伴、極端外化行爲的風險。Musetti 等人（2021）指出，一些有兒童情感忽視病史的青少年常有難以在“自我”和“他人”之間建立清晰界限的議題，本研究A的親職化、膩於偏差同儕是一種追求關係連結的策略，長久下來使A與母親、A與人的界線混淆支持該論點。

(2)母親形象負面，憤怒羞恥縈繞；長期受兒虐，A積恨下以暴回擊因應

童年前期，A受A母長期疏忽拒絕，但從A開始結交偏差同儕，出現行為問題後，A受A母嚴重體罰長達6年。姑且不論A母是因壓力過大導致管教過當，或是交乘用藥導致情緒失控，本研究A之處境，皆與用藥親代常出現忽視、嚴重體罰管教的文獻（鄭于沛、陳俊全，2014；Lewis et al., 2015）一致。此處，從發展與親子互動關係、文化心理、心理動力、神經心理等觀點，說明子代因為「母親形象負面、不正常」，A經驗多種羞恥與恨意，如何發展為肢暴反擊的動力：

青少年心理發展文獻顯示，從青春早期到中期，親子關係會呈下降趨勢，中期到晚期將有所改善（Branje et al., 2011）。劉惠琴（2000）指出女兒們步入青春階段會開始質疑與挑戰母職的光環，女兒們在認同母親之前，得先質疑母職。本研究A母經常過度體罰，逐漸長大的A開始挑戰母權。Rohner與Rohner（1981）以控制和溫暖二個維度說明父母對子女的互動行為，其中，控制維度分為嚴格和寬容兩端；溫暖維度分為接受和拒絕兩端，而拒絕這端再分為兩個次組成：父母的敵意和攻擊、冷漠和忽視。Rothenberg等人（2022）依據該理論對九個國家的兒童進行跨文化研究，研究結果支持親代拒絕與兒童的外化和內化問題相關。本研究A母冷漠忽視、嚴厲攻擊的二極管教行為，二者傳遞的訊息其實一致，都是「拒絕」，母親拒絕影響子代內化和外化問題的發生，高衝突下母女依附關係破壞甚鉅。

再從文化心理來看，A於受訪時多次氣憤評論A母形象糟糕，不符合正常母親的樣子，包括A母很少履行母職的照顧行為，迫A親職化要負擔家計、常讓A收拾A母的爛攤子、A母工作愈趨低賤邊緣、用毒、家醜外揚等，A表示這樣的母親讓自己很丟臉，常經驗憤怒、羞恥。劉惠琴（2000）表示主流社會的家庭意識支配著各種處境下的人們，當A知覺母親與主流母親形象不符，認為母親「不合模」的自慚感，責備母親油然而生。

步入青春，面對經常性的嚴厲責打，A從自我勸慰「是媽媽，不能恨，到鐵了心，恨她了」，母女對峙、互打，A之心理狀態明顯改變，從原本持有倫理概念，與母尚有脆弱的依附，走向積久的憤恨

爆發，反擊A母。此處運用心理動力的概念理解之：當個人嚴重受創會反覆經歷羞恥與憤怒的循環（Mann, 2010），此將心智導向報復，個體處於分裂狀態：內在會不斷反芻，詆毀施暴者，產生的能量可將復仇者（即受暴者）與施暴者的關係斷開、復仇者（受暴者）與道德和社會秩序的關係斷開（Lansky, 2007）。本研究A處於這種狀態長達1-2年，舍勒提到：人怨恨時，心可能混亂無序，原有的價值系統可能會顛覆崩壞（引自韋海波，2007）。Miu 等人（2022）的後設分析發現 ACEs 與情緒調節困難以及習慣性的反芻（指重複的進行負向思考）和壓抑呈正相關；不當的情緒調節措施與精神病理呈正相關。本研究A長期處於A母疏忽拒絕，後來因行為問題被母強烈肢暴管教，A之身體、心理長期受創，A初始表面雖順從，但內心早已長期不斷反芻母親失職，竟然還有臉管教自己的思考，當A一發現不一定會輸，A母女互打成為常態，此處，A非以內化的精神病理呈現，A的情緒調節困難展現成外化施暴，以逆倫回擊因應。

葉光輝（2009）指出長期性的權威性孝道教養模式的代價易助長神經質，誘發焦慮與攻擊行為。呂宜芳（2017）的研究結果顯示父母嚴厲教養會增加青少年的憂鬱與憤怒，嚴厲教養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過程中，憤怒的中介效果強於憂鬱效果；Mosman 等人（2015）訪談八位自覺被母親拒絕的年輕女孩，研究指出母親拒絕產生低自我概念，威脅到個人的自我認同和安全感，此導致憤怒的發展，而憤怒可以變成敵意和怨恨。Calvete 等人（2015）訪談 15 名對父母施暴的青少年以及其父母，結果表明，這些施暴的青少年經常是暴力的直接受害者和目擊者。綜上，本研究A處在高壓環境裡，生理／神經內分泌系統常過度激發，情緒處理的調節出現問題（Repetti et al., 2002），累積的羞恥－憤恨循環斷開倫常，會對母親長期施暴予以肢暴反擊似乎就有跡可循了。

（三）A之藥物濫用與母女互動關聯的發展

此處論述進入青春期的A，A之親子關係曲線由下往上（Branje et al., 2011）的關鍵：子代翹家止暴、一再吸毒被觀護，母親釋權展愛開啓親子互動正向循環，關係逐漸轉正，A漸信自己重要。以下說明之。

1. A 翹家撼動母權，終止母親施暴，也給了母女重新審視關係重要性的機會

A 受嚴重家暴，最後翹家影響母親終止長期的施暴。此處與逃家青少年的研究（黃麗英，2004；張婷苑，2002）一致，這些研究指出青少年離家前常有激烈的親子衝突，因處於權力的弱勢，青少年以逃家撼動絕對親權。翹家讓 A 母女進入可能失去對方的體驗，A 母選擇放棄肢暴管教。

2. A 反覆藥物濫用受觀護，母轉為釋權展愛啟動關係轉化，子代漸信自己重要

子代為偏差同儕邀約開始用毒，一再復用被抓受觀護，A 母從拒絕到表達不放棄 A，A 母轉成持續的釋權展愛冰釋了子代的憤怒盔甲。Lopez 等人（2009）探究 18 名受監禁少女，研究發現有些被監禁少女知覺被父母拒絕和拋棄，但當父母試圖阻止她們吸毒，其會認為這是父母仍愛他們的證明。

另外，A 母釋權展愛的行為還包括母親解密吸毒、增加親子溝通的質量，這些對 A 母女關係的修復、A 的自我修復深具意義。共享現實理論指出人們藉由共享現實，例如分享祕密作為傳達重視這段關係（Bedrov & Liberman, 2021），以之與他人連結的基礎（Liu & Slepian, 2018），本研究 A 母解密自己有吸毒問題，祕密交換祕密，A 一改過去完全不讓 A 母知道自已的事的態度，自揭更多成長過程未跟母親訴說的孤單痛苦，獲 A 母正向回應，親子連結、溝通質量明顯提升，母女關係愈加親密，A 漸信母親重視自己。後設分析和縱向發展研究文獻指出，父母的溫暖和關愛與子女更健康的心理適應、更強的情緒穩定性和更積極的自尊有關（Rothenberg et al., 2022）；孫頌賢與修慧蘭（2004）的研究指出，大學生與父母親分享的提升，會影響親子界線，增加關係親密，其自我的被認同感也會受到提升，本研究與其發現一致。

3. 子代自我藥物濫用與母女互動的關聯

(1) 吸毒問題仍侵蝕著關係信任，母女共識避談常因 A 母隱瞞，拉出「我不重要、不信任」的逆境創傷，觸發高衝突

A表示母親「欺瞞」有遺毒，加以，自己也處在吸毒這個圈子裡，知道吸毒者說謊是常態，所以，A就是無法信任母親，此與藥癮家庭文獻（鄭于沛、陳俊全，2014；鄭青玫，2018，2021；Burstein et al., 2006）一致，不信任是該類家庭的議題。

面對吸毒，母女內外皆採共識避談，此與現存藥癮文獻（鄭青玫，2018；Burstein et al., 2006）一致，家人會避談吸毒者的吸毒問題。究其原因，對外隱瞞，應與中國社會存有父子一體，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的信念有關，因為榮辱與共，為避社會汙名所以共識避談（葉明華、楊國樞，1997）。對內避談，與A顧及A母臉面有關，華人文獻顯示，社群對於違反道德法律臉面的事件通常存有強烈恥感，家人間避而不談是幫彼此維持臉面的常用方法（黃光國，2009）。

惟A母持續失親職、一再破壞母女彼此不用藥、有事情要先告知對方的約定，A表示一旦發現母親「隱瞞」，往往暴怒。此處，A出現母女關係混淆、情緒調節的問題。探討祕密的相關文獻揭示維持祕密常有負面代價，因為沉默和祕密看似維持了家庭的平衡穩定，具功能性，然而，幫家人保持祕密的代價是變得孤立（Proulx-Bouche et al., 2011），一有風吹草動就變得警醒、不信任。Burstein 等人（2006）指出藥癮家庭，家人之間常持有分享個人真實的感覺會受傷的想法，因為害怕有人受傷，所以常採避談反應，但後果是，痛苦積累到極致往往爆發高衝突。

親職化的A表示除了收拾爛攤子令人憤怒外，最令A受不了的是「母親不信任自己」，這牽出A的成長創傷：「母親拒絕，雙方疏遠、不信任母親」，因之，爆發高衝突。過去藥癮親子文獻指出該類家庭常有信任、兒虐、親子高衝突問題，但較少深描細提與子代成長逆境心理動力的關聯，本研究A的故事提供清楚內在心理動力的描述幫助了理解。但，也發現到A成年後，母親轉為釋權展愛對A的自我雖有改善，但A母現在的「隱瞞」還是常常拉出A過去被拒，「母親不要我／我不重要」、「我不被信任、我不信任母親」的創傷，顯然，自我受創要復原，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兩篇 ACEs 的相關研究可用來理解A的情緒狀態，Miu 等人（2022）的後設分析研究發現，ACEs 與情緒調節困難以及習慣性的反芻（指重複的進行負向思考）和壓抑呈

正相關；Mansueto 等人（2021）分析 18 篇 ACEs 研究，發現擔憂和反芻似乎在童年遭受虐待或忽視的成年人中很常見；反芻與惡化的臨床症狀有關，例如憂鬱、煩躁、認知問題、創傷後壓力症狀和攻擊性、嚴重的精神症狀、自殺意念。

(2)以毒療心的序列

A 過去成長過程，親代「用毒」與「隱瞞」雙綁，A 一再將母親不回應、鎖門的外顯行為解讀為「疏忽、拒絕」。當前，A 一旦知覺到被母隱瞞，A 瞬間暴怒，此除了顯示 A 之情緒調節功能似已遭破壞外，後續，母女兩人高衝突後，A 母再度顯現拒絕，A 出現用毒撫慰自我的序列引人關注。發展心理學指出童年前期，特別是嬰幼童階段是子代與重要他人建立信任連結、人格發展自我建立的重要階段，單親未婚 A 母隱晦吸毒所致 A 之成長逆境—疏忽拒絕創傷深遠，持續影響成年後的 A 之自我不穩定，負向自我隱隱作祟，情緒調節受損，關係受挫，A 以毒療心。Molina 與 Whittaker（2022）指出，經驗 ACEs 使心理疾病的風險增高，其以類別方式例舉容易出現的風險，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情緒調節困難、依附困難、不當用藥風險增高。本研究發現這些風險在 A 的身上似乎有一序列關係：成長於身處性別階層弱勢單親母隱晦用毒的環境中，A 長期經驗 ACEs：受情感疏忽、受拒使依附困難，形成負向自我 → 當前關係受挫 → 勾出過去創傷 → 情緒調節困難 → 以毒療心。

子代表示開始用毒為偏差同儕邀約使用，與母親無關，但是，復用或是續用則與用藥撫慰身心（尋開心、好睡）、因應關係或是母女關係挫折有關，此與國內女性藥物濫用文獻（王伯碩、劉育偉，2016；蔡田木、賴擁連，2014）一致，女性維持用藥多與以藥處理關係挫折、壓力有關。藥物暴露兒童文獻指出暴露於孕期母親用藥的胎兒，不僅阻礙胎兒發育健康成長、出生後吸毒父母失親職功能的不當對待影響孩童人格及社會發展，甚至出現代間循環用藥（鄭于沛、陳俊全，2014）。本研究 A 母孕期用毒，A 於胎兒時期即為藥物暴露兒童，由於不知 A 母當時安非他命用量與持續使用多久，所以，A 出生時的難教養、出生後直到現在都有睡不好的問題，究竟與 A 母孕期用毒有多大關聯為本研究限制之處。但從 A 10 歲之後，A 長期成長於似

乎知道母親秘密吸毒的負面環境，A用藥之後，出現類似母親以毒療心、因應關係挫折的行爲，可以確信的是A因使用非法藥物快速療心或是處理睡眠問題，大腦酬賞機制一再受影響，用藥漸成A的習慣。以上，或許可以說A母用毒導致的親職不彰使子代形成負向的自我概念，母親的負向示範間接維持住了A的用毒，A遇挫，複製母親以毒撫慰自己，以此處理情緒。

4.覺察複製；親職化的A憂家破裂，動念戒毒以爲母模範

A逐漸意識到吸毒母親對自己的影響，縱使母親釋權展愛，母女關係逐漸修復，但實際上，A母失親職仍因吸毒問題未停，持續負向影響著A，A持續的親職化(賺錢養家、顧母、顧弟)其實是不得不然，A企圖掌握母親的狀態（以看母親的FB、與母親男友、朋友成爲好朋友），母女關係明顯混淆。藥酒癮文獻指出生長在有長期壓力的家庭子代容易親職化、與家人有共依附的現象，本研究A母吸毒，無能好好持家，A以自己有能，親職化承擔母職，連動念戒毒主要考量都不是爲了自己，而是與憂家破裂，試圖成爲母親的模範有關，顯見，親子糾結，子代負擔沉重，出現共依附種種特徵：失去自我、以母親、家庭爲先、界線混淆，充斥恥感，個體控制主要是爲避免失控（白瑋廷、張貴傑，2019），此破壞子代健康自我的發展。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發現A從幼童期即開始經驗多重成長逆境，與其單親母身處父權環境，性別階層弱勢又複合吸毒的秘密交織所致。其中，受母疏忽拒絕、受母肢暴管教對A破壞性最大，前者，使母女連結脆弱、受拒無法隸屬，破壞A的情緒調節能力，A形成負向自我概念；後者，使A累積憤恨，A之情緒調節機能受損更劇，A出現更多內化、外化行爲問題，A甚至以暴回應隱晦用毒、失親

職，卻還施暴管教的母親。進入後青春期的A，受同儕邀約始用毒，A一再因毒受觀護，母親從拒絕到轉以釋權展愛，不放棄女兒使母女關係出現轉化，A漸信「自己重要」。當前，A還是常受吸毒，時有隱瞞、失親職的單親母的影響，持續經驗著逆境，關係受挫，使「我不重要、不信任」的創傷仍時常被挑起，情緒調節困難，A出現類同母親壓力或關係受挫以毒療心的因應模式。

二、建議

針對本研究發現提出如下建議：

（一）研究

1.未來可進行不同家庭結構跨代藥癮之親子對偶探究：例如完整家庭、重組家庭、單親家庭等之不同性別親代用藥，與不同性別子代所受成長逆境發展歷程、藥物濫用發展與原因之對偶探究，此可對不同家庭結構下親子次系統子代成長逆境的發展、親職困境、跨代用藥發展有更完整的視角，對該類家庭之親子互動知覺之異同，因之產生哪些影響與親子因應有更多掌握。

2.藥癮家庭的求助歷程：本研究A母隱晦用毒從未被發現，以致持續對A之發展產生負向影響。但從該對母女其實也想正常化，都希望對方停毒，過正常的生活，建議未來可以以此藥癮家庭跨代停毒歷程做探究一面對藥癮戒治問題，若能突破，會經歷那些轉化歷程？當想要停毒過正常化生活卻不可得，雙方在正常與否的辯證歷程如何？

3.本研究A母因為隱瞞用毒，為了持守秘密，A重複承受A母拒絕的教養環境，隱晦用毒與直接用毒對子代產生的逆境會產生哪些異同影響引人好奇，建議未來可以針對親代隱晦以及直接用毒之親職環境做子代成長逆境產生哪些異同影響之比較探究。

4.本研究A母長期用毒，似乎已經出現精神症狀，子代持續經驗逆境，建議未來可針對合併精神症狀之藥癮親子互動，子代所歷成長逆境、對子代個人的世界觀、存在感產生哪些影響做持續探究。

（二）輔導實務

1.輔導人員服務藥癮家庭介入之繼續教育：本研究單親母使用非法藥物安

非他命後的藥性對親職產生諸多負面影響，安非他命藥性在A的故事中影響母親平時易有不去上班、疏忽女兒（例如藥性過後的耗弱）、體罰管教女兒易失控變成嚴重家暴（因藥性產生身心過激）的問題，因此，藥癮諮商工作人員應對不同藥品引發藥癮者本人之生理、心理、社會之異同影響應具基礎知識。另外，本研究單親母身處父權環境性別階層弱勢，單親汙名、單親小母親追愛受挫影響母女相處是A出生後即承受的，因之，輔導諮商人員需具備性別、多元文化敏感，此對藥癮親代對子代成長逆境與影響會有更深刻的理解，包括身處性別階層弱勢，單親、用毒更容易使子代經驗那些成長逆境，哪些失親職的行為或管教方式會分別對子代自我、依附、親職化—關係界線與混淆、情緒調節困境產生哪些影響。

2.藥癮親代介入：本研究發現單親隱晦用毒母親使子代經歷的逆境多元，子代後來出現用毒問題，多次進到觀護系統，卻從未被實務工作者發覺親代用毒問題引人注意。另外，子代只要發現單親藥癮母親「隱瞞用毒」或其他不適任親職的行為，就易挑起子代「我不重要、不信任」的成長創傷，子代親職化，雙方易觸發高衝突，母女界線明顯混淆，此時，當母親又以拒絕應對，子代受挫，子代以用毒處理關係受挫。針對以上，對藥癮親代介入的提醒是，實務工作者須留意個案家人是否同時有隱晦用毒的問題，因藥癮家庭常受制於用毒的社會汙名、自我汙名，用毒家人通常不會主動求助，因此，服務人員須培養與用毒家人建立信任關係的能力，以本故事為例，若能同理的理解與接納單親母身處父權環境性別階層弱勢，卻需要面對子代的吸毒問題，帶著非評論、非同情，卻是同理的態度與親代和子代互動，嘗試探問家庭的吸毒相關問題，親代放下防衛面對自己的吸毒問題或許就有可能。除此之外，要同時進行親代個人議題介入，檢視藥癮女性文獻，用藥女性常有關係問題或關係創傷問題，用藥是其處理痛苦或撫慰自我的方法，若具母職身分，用藥影響親職功能更是可期，以本研究為例，A母個人有關係創傷（例如被拋棄），可能影響產生負向自我、以及以負向方式（例如用毒、自殘、遷怒施暴等）應對壓力的問題，進而影響其親職失功能，因此，協助A母正視個人關係失落問題、用毒、自殘、施暴、情緒調節議題，以動機激起策略介入賦能A母，相信此更能正向帶動A母承擔母責，學習教養與不同發展階段子女的相關知能，使其「有能力持續」的釋權展愛，相信不只可以停止子代受成長逆境，對子代脆弱自我的修復更有助益。

3.藥癮子代介入：本研究子代受疏忽拒絕、兒虐管教，歷多重成長逆境，自我受創嚴重，人際界線混淆，情緒調節能力受破壞、對關係受挫十分敏感。因之，青少年藥癮子代的介入，除了受暴創傷評估、受暴安全管理、藥癮戒治外，尚須包括個人議題諮商，探討議題建議包括，受暴創傷與復原力、對吸毒母親不安全依附的內在運作模式、自我脆弱敏感、持有嚴重恥感，親職化與共依附等親子界線僵化或混淆議題、憤怒控制與情緒調節的議題等。

參考文獻

- 王伯碩、劉育偉（2016）。女性非法藥物濫用及其戒治歷程之實證研究。**藥物濫用防治**，1（2），27-61。<https://doi.org/10.6645/JSAR.2016.1.2.2>
- 白瑋廷、張貴傑（2019）。人際歷程治療取向於成年前期共依附子女的應用。**諮商與輔導**，402，32-34。
- 呂宜芳（2017）。嚴厲教養對青少年物質使用及暴力偏差之影響〔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
- 呂淑妤（2008）。女性與藥物濫用。**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11，189-209。<https://antidrug.moj.gov.tw>
- 呂淑妤、白其卉（2018）。女性毒癮者懷孕生產經驗及其影響調查（V03）。科技部（編號：MOST105-2629-B-227-001-）未出版。http://taiwan-gist.net/files/past_plan/105/105-12.pdf
- 殷開薇、蔡佩真（2019）。藥物濫用者子女的成长經驗之敘事研究。**藥物濫用防治**，4（4），33-56。[https://doi.org/10.6645/JSAR.201912_4\(4\).2](https://doi.org/10.6645/JSAR.201912_4(4).2)
- 孫頌賢、修慧蘭（2004）。大學生的親子界限：親子關係——自我界限量表編製與模式初探。**測驗學刊**，51（1），45-78。<https://doi.org/10.7108/PT.200406.0045>
- 梁碩娟（2022）。青少年成長逆境經驗、自尊與同儕關係之研究—以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資料庫為例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銘傳大學。
- 黃光國（2009）。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心理出版社。
- 黃麗英（2004）。國中逃家少年的家庭互動及社會支持之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 黃明玉、吳惠如、郭俊巖（2014）。從臺北市家庭發展帳戶方案探析女性戶長單親戶脫貧的可能。**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4，131-152。

- 韋海波（2007）。怨恨論：尼采與舍勒。**理論界**，3，166-168。
- 許慈芳（2014）。單親家庭成年子女親子關係之敘說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 張婷菀（2002）。由青少年的離家經驗探討家的意義〔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 張嘉珊（2013）。物質濫用家庭青少年生活及可能自我之探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https://doi.org/10.6346/NPUST.2013.00064>
- 曾瑋琪（2022）。成長逆境與偏差行為——以自我控制與心理病態性格為中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玄奘大學。
- 葉光輝（2009）。華人孝道雙元模型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本土心理學研究**，32，101-148。
<https://doi.org/10.6254/2009.32.101>
- 葉明華、楊國樞（1997）。中國人的家族主義：概念分析與實徵衡鑑。**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3，169-225。
- 廖建銘（2022）。成人成長逆境經驗者人格特質、心理韌性與生涯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https://doi.org/10.6345/NTNU202200463>
- 齊力（2003）。質性研究方法概論。載於齊力、林本炫（主編），**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1-18 頁）。南華教社所。
-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心理出版社。
- 鄭于沛（2013）。藥癮暴露兒童親職歷程之個案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 鄭于沛、陳俊全（2014）。藥物暴露兒童家庭之親職危機與復原。**臺灣社會福利學刊**，11，2，141-184。[https://doi.org/10.6265/TJSW.2014.11\(2\)4](https://doi.org/10.6265/TJSW.2014.11(2)4)
- 鄭寶玉（2010）。婦女藥物濫用者對家庭教養影響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
- 鄭青玫（2018）。親代藥物成癮、兒童虐待對子代個體化的影響——以一位成初期女性為例。**輔導與諮商學報**，40（2），25-56。
- 鄭青玫（2021）。一位近高齡男性海洛因成癮／販賣者之停藥循環歷程、家人互動關係敘說探究。**輔導與諮商學報**，43（3），71-104。
- 劉筱雯（2008）。藥癮者子代主觀陳述之困境與其韌性特質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劉惠琴（2000）。母女關係的社會建構。**應用心理研究**，6，97-130。

- 蔡田木、賴擁連（2014）。女性之藥物濫用原因、預防與處遇對策之研究。法務部保護司（編號：PG10304-0085）。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21）。**藥物濫用案件暨檢驗統計資料（105年年報分析）**。取自<https://www.fda.gov.tw/tc/site.aspx?sid=1578&r=1228262500>
- 謝玉玲、王舒芸、鄭清霞（2014）。不同單親家庭的生活處境：單親成因及其性別差異。**社會發展研究學刊**，14，1-25。https://doi.org/10.6687/JSDS.2014.14.1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4）。**DSM-V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台灣精神醫學會譯）。合記圖書出版社。（原著出版於 2013）
- Afifi, T. O., Taillieu, T., Salmon, S., Davila, I. G., Stewart-Tufescu, A. Fortier, J., Struck, S., Asmundson, G. J. G., Sareen, J., MacMillan, H. L.(2020).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 peer victimization, and substance use among adolescents. *Child Abuse & Neglect*, 106,104504.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20.104504.
- Beal, S. J., Wingrove, T., Mara, C. A., Lutz, N., J. G., & Greiner, M. V. (2019).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Associated Psychosocial Function in Adolescents with Complex Trauma. *Child & Youth Care Forum*, 48, 305–322. https://doi.org/10.1007/s10566-018-9479-5
- Bedrov, A. S., & Liberman, Z. (2021). It takes two (or more): The social nature of secrets. *WIREs Cognitive Science*, 12(6), e1576. https://doi.org/10.1002/wcs.1576
- Branje, S., Keijsers, L., Muriel van doorn., & Meeus, W. H. J. (2011). Interpersonal and Intrapersonal Processes in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s in Adolescence. In B. Laursen & W.A. Collins (Eds.), *Relationship pathways: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pp.257-276). Sage Thousand Oaks. https://doi.org/10.4135/9781452240565.n12
- Burstein, M., Stanger, C., Kamon, J., & Dumenci, L. (2006). Parent psychopathology, parenting, and chil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in substance-abusing families.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20(2), 97–106. https://doi.org/10.1037/0893-164X.20.2.97
- Bryant, D. J., Coman, E. N., Damian, A. J. (2020). Association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SUDs) in a multi-site safety net healthcare setting. *Addictive Behaviors Reports*, 12,1-6. https://doi.org/10.1016/j.abrep.2020.100293
- Calvete, E., Orue, I., Gámez-Guadix, M., del Hoyo-Bilbao, J., & de Arroyabe, E. L. (2015). Child-to-Parent Violence: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Roles of Family Violence and Parental Discipline Through the Stories Told by Spanish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Violence and Victims*,30(6), 935-47. https://doi.org/10.1891/0886-6708.VV-D-14-00105

- Dariotis, J. K., Chen, F. R., Park, Ye. R., Nowak, M. K., French, K. M., & Codamon, A. M. (2023). Parentification Vulnerability, Reactivity, Resilience, and Thriving: A Mixed Methods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 (13), 6197. <https://doi.org/10.3390/ijerph20136197>
- Evans, E. A., Goff, S. L., Upchurch, D. M., & Grella, C. E. (2019).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mental health comorbidity in men and women with opioid use disorders. *Addictive Behaviors*, 102, 106149. <https://doi.org/10.1016/j.addbeh.2019.106149>.
- Felitti, V. J., Anda, R. F., Nordenberg, D., Williamson, D. F., Spitz, A. M., Edwards, V., & Marks, J. S. (1998). 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abuse and household dysfunction to many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adults: Th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4, 245-258. [https://doi.org/10.1016/S0749-3797\(98\)00017-8](https://doi.org/10.1016/S0749-3797(98)00017-8)
- Forrester, D., Holland, S., Williams, A., & Copello, A. (2016). Helping families where parents misuse drugs or alcohol? A mixed methods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an intensive family preservation service.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21(1), 65-75. <https://doi.org/10.1111/cfs.12111>
- Friestad, C., Åse-Bente, R., & Kjelsberg, E. (2014).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mong women prisoners: Relationships to suicide attempts and drug abu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60(1), 40-46. <https://doi.org/10.1177/0020764012461235>
- Gergen, K. J., & Gergen, M. M. (1988). Narrative and the self as relationship.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1, 17-53. [https://doi.org/10.1016/S0065-2601\(08\)60223-3](https://doi.org/10.1016/S0065-2601(08)60223-3)
- Haslam, Z. & Taylor, E. P. (202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neglect and adolescent interpersonal functioning: A systematic review. *Child Abuse & Neglect*, 125, 1-13.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22.105510>.
- Hemovich, V., & Crano, W. D. (2009). Family structure and adolescent drug use: an exploration of single-parent families. *Substance Use & Misuse*, 44(14), 113. <http://doi.org/10.3109/10826080902858375>
- Houtepen, L. C., Heron, J., Suderman, M. J., Fraser, A., Chittleborough, C. R., & Howe, L. D. (2020). Associations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with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adolescent health and the role of family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in the UK. *PLOS Medicine*, 17(3), 1-21. <http://doi.org/10.1371/journal.pmed.1003031>.

- Hughes, K., Bellis, M.A., Hardcastle, K.A., Sethi, D., Butchart, A., Mikton, C., Jones, L., Dunne, M.P. (2017). The effect of multiple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n health: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Lancet Public Health*, 2(8), e356-e366.
[http://doi.org/10.1016/S2468-2667\(17\)30118-4](http://doi.org/10.1016/S2468-2667(17)30118-4).
- Hunt, T. K., Slack, K. S., & Berger, L. M. (2017).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middle childhood. *Child Abuse & Neglect*, 67, 391-402.
<http://doi.org/10.1016/j.chiabu.2016.11.005>.
- Kendler, K.S, Ohlsson, H., Sundquist, K., & Sundquist, J. (2015). The causes of parent-offspring transmission of drug abuse: a Swedish population-based study.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5(1), 87-95. <http://doi.org/10.1017/S0033291714001093>.
- Kendler, K. S., Ohlsson, H. J., Sundquist, J., & Sundquist, K. (2020). Facilitating Versus Inhibiting the Transmission of Drug Abuse from High-Risk Parents to Their Children: A Swedish National Study. *Twin Research and Human Genetics*, 23(1), 1-7.
<http://doi.org/10.1017/thg.2020.1>.
- Lansky, M. R. (2007). Unbearable Shame, Splitting, and Forgiveness in the Resolution of Vengefulnes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55(2), 571-593.
<https://doi.org/10.1177/00030651070550020901>
- Lewis, A. J., Holmes, N. M., Watkins, B., & Mathers, D. (2015). Children Impacted by Parental Substance Abuse: An Evaluation of the Supporting Kids and Their Environment Program.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4, 2398–2406.
<http://doi.org/10.1007/s10826-014-0043-0>
- Lieblich, A., Tuval-Masshiach, R., &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Sage.
- Lijtmaer, R. (2017). Untold Stories and the Power of Silence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ocial Traum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77(3), 274-284.
<http://doi.org/10.1057/s11231-017-9102-9>
- Lipari, R.N., & Van Horn, S. L. (2017). *Children Living With Parents who Have a Substance Use Disorder*. In: The CBHSQ Report. Rockville [MD] :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US).
https://www.samhsa.gov/data/sites/default/files/report_3223/ShortReport-3223.pdf
- Liu, Z., & Slepian, M. L. (2018). Secrecy: Unshared Realitie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3,

- 124-128. <http://doi.org/10.1016/j.copsyc.2018.03.006>.
- Lopez, V., Katsulis, Y., & Robillard, A. (2009). Drug use with parents as a relational strategy for incarcerated female adolescents. *Family Relations*, 58(2), 135-147.
<http://doi.org/10.1111/j.1741-3729.2008.00542.x>
- Mann, M. (2010). Shame veiled and unveiled: the shame affect and its re-emergence in the clinical setting.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70(3), 270-81. <http://doi.org/10.1057/ajp.2010.22>
- Mansueto, G., Cavallo, C., Palmieri, S., Ruggiero, G.M., Sassaroli, S., & Caselli, G. (2021).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repetitive negative thinking in adulthood: A systematic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 28(3), 557-568.
<http://doi.org/10.1002/cpp.2590>.
- Miu, A.C., Szentágotai-Tátar, A., Balázs, R., Nechita, D., Bunea, I., Pollak, S.D. (2022). Emotion regulation as mediator between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psychopathology: A meta-analysi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93, 102141. <http://doi.org/10.1016/j.cpr.2022.102141>
- Molina, G., & Whittaker, A. (2022). Treat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 in adults with a history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Reports*, 2, 1-15.
<https://doi.org/10.1016/j.dadr.2022.100028>
- Mosman, S. C., Poggenpoel, M., & Myburgh, C. (2015). Life stories of young women who experience rejection from their mothers. *Curationis*, 38(1), 1-8.
<http://doi.org/10.4102/curationis.v38i1.1429>
- Musetti, A., Grazia, V., Manari, T., Terrone, G., & Corsano, P. (2021). Linking childhood emotional neglect to adolescents' parent-related loneliness: Self-other differentiation and emotional detachment from parents as mediators. *Child Abuse & Neglect*, 122, 105338.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21.105338>
- Pilkington, P.D., Bishop, A., & Younan, R. (2021).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early maladaptive schemas in adulthoo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 28(3), 569-584. <http://doi.org/10.1002/cpp.2533>.
- Proulx-Bouche, K., Blais, M., Fernet, M., Richard, M., Otis, J., Lévy, J. J., Samson, J., Lapointe, N., Morin, G., Thériault, J., & Trottier, G. (2011). Silence et divulgation dans des familles d'adolescents vivant avec le VIH depuis la naissance: une exploration qualitative. *Paediatr*

- Child Health*, 16(7), 404–408. <https://doi.org/10.1093/pch/16.7.404>
- Repetti, R. L., Taylor, S. E., & Seeman, T. E. (2002). Risky Families: Family Social Environments and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of Offspr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2, 330-366.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8.2.330>
- Rohner, R. P., & Rohner, R. E. (1981). 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and Parental Control: Cross-Cultural Codes. *Ethnology*, 20, 3, 245-260. <https://doi.org/10.2307/3773230>
- Rothenberg, W. A., Ali, S., Rohner, R. P., Lansford, J. E., Britner, P. A., Giunta, L. D., ...Deater-Deckard, K. (2022). Effects of 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on Children'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A Longitudinal, Multicultural Study.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31,1,29-47.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21-02072-5>
- Sadat-Shirazi, M. S., Sadeghi-Adl, M., Akbarabadi, A., Ashabi, G., Mokri, A., & Zarrindast, M. R. (2022). Inter/Transgenerational Effects of Drugs of Abuse: A Scoping Review. *CNS Neurological Disorders Drug Targets*, 22(4), 512-538. <https://doi.org/10.2174/1871527321666220429122819>
- Scott, B. G., Burke, N. J., Weems, C. F., Hellman, J. L., & Carrión, V. G. (2013). The interrelation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within an at-risk pediatric sample. *Journal of Child & Adolescent Trauma*, 6(3), 217–229. <https://doi.org/10.1080/19361521.2013.811459>
- Slepian, M. L., Chun, J. S., & Mason, M. F. (2017). The experience of secre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1), 1-33. <https://doi.org/10.1037/pspa0000085>.
- Slepian, M. L., Kirby, J. N., & Kalokerinos, E. K. (2020). Shame, guilt, and secrets on the mind. *Emotion*, 20(2), 323-328. <https://doi.org/10.1037/emo0000542>.
- Slepian, M. L., Greenaway, K. H., & Masicampo, E. J. (2020). Thinking Through Secrets: 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ought Suppression in Secrecy.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6(10), 1411-1427.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19895017>.
- Slepian, M. L. (2022). A process model of having and keeping secrets. *Psychological Review*, 129(3), 542-563. <https://doi.org/10.1037/rev0000282>.
- Tufail, H., Majeed, S., & Khan, A. Q. (2015). Perceived 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and its relation with depression and self-esteem in patients with substance abuse disorder. *Journal of Pakistan Psychiatric Society*, 12, 11-14. <https://www.jpaps.com.pk/article/9088Perceived%20Parental%20Acceptance-Rejection%20and%20its%20Relation%20with%20Depression%20and%20self%20Esteem.pdf>

The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Impact of a Daughter Raised by a Drug-Addicted Single mother - A case Study of a Drug-Addicted Young Girl

Ching-Mei Cheng¹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 of a daughter (referred to as “A”) raised by a drug-addicted single mother. A holistic and content-based narrative interview approach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better understand how A’s mother’s use of amphetamine secretly resulted in ACEs and how these experiences impacted A.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Early childhood: Due to her drug use, A’s young unmarried mother was abandoned by her boyfriend (A’s biological father). As a result, A experienced ACEs, including growing up in a single-parent family, experiencing emotional neglect from her mother, and having housing uncertainty because of her financial problems. Experiencing such ACEs resulted in A developing the perception that “no one wants me/I’m not important”, and adopting a parentification strategy as a coping mechanism. (2) Late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 A discovered her mother’s secret drug use and responded by denying and concealing the truth of the situation. Because of her mother’s long-term neglect, the bond between A and her mother was broken. To cope with the loneliness stemming from this lack of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A started to spend time with deviant peers. In response, she was often subjected to physical abuse by her mother in an attempt to discipline her for her various

¹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fe and Death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behavioral problems. A felt extremely ashamed of her mother due to her covert drug use, lowly occupation, and frequent violence. A concealed such feelings from others externally, but accumulated internal resentment eventually culminated in A responding to her mother's abuse with violence. (3) Late-adolescence: A spent long periods of time away from home to stop the physical abuse by her mother. At the same time, she began taking drugs in response to the invitations of her peers. As A was being placed on probation several times due to her drug abuse, her mother's parenting attitude switched from rejection to more positive interaction and display of love.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and her mother began to transform, A gradually develop the belief that "I am important". However, the drug abuse problem continued to erode the trust between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A's past traumas, that resulted in the perception that "I'm not important and I don't trust mother" continued to influence her emotional regulation skills. This triggered high levels of conflicts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The mother-daughter boundary remained enmeshed, and therefore A, accustomed to parentification and feared the breakdown of her family, was spurred on to quit drugs to act as a role model for her mother.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counseling for drug-addicted single-parent families.

Keywords: drug-addicted single mother,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intergenerational drug addiction

收稿日期：2023 年 07 月 20 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3 年 12 月 20 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3 月 11 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4 月 18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4 年 04 月 22 日

父母衝突對青少年人際問題之影響： 人際環狀模型的應用

劉蓉果*

佛光大學
心理學系

摘要

延伸過去探討父母衝突對於子女心理適應影響的豐富成果，本研究聚焦於青少年可能受父母衝突而產生的人際問題，依人際環狀模式來切入三種人際問題：懷恨報復、冷漠無情、社交退縮。此外，進一步檢驗因父母衝突引起的威脅感和降低的效能感使得青少年人際問題惡化的影響歷程，並加以考量子女性別的調節效果。研究對象為台北市和新北市八所公私立國中共 599 位學生，平均 14.3 歲，女生占 52.6%。分析方法以 PROCESS 分析模組檢驗平行中介模式和調節式中介模式。結果顯示頻繁激烈的父母衝突對青少年人際問題之直接效果顯著外，子女在人際關係上的懷恨報復與冷漠無情主要來自於因其父母衝突所引起的威脅感受；男生更因父母衝突減損其人際效能而導致人際關係上的懷恨報復、冷漠無情、社交退縮。最後針對本研究結果之應用與限制進行討論。

關鍵詞：人際環狀模型、人際效能、父母衝突、青少年人際問題、威脅感受、調節式中介模型

*本篇通訊作者：劉蓉果，通訊方式：rongkou@gmail.com。

本研究未獲得經費補助，未在研討會上發表。

壹、緒論

青少年不僅是從小孩轉變成大人的過渡時期，更是追求自我認同及渴望確立定位的時期，除了要面對生理上明顯而具體的變化，社會心理上也負有自我統整的發展任務（Zarrett & Eccles, 2006）。追求獨立自主的過程中，青少年面臨許多內在與外在的矛盾和衝突。

爲了解青少年的處境，康健雜誌（黃惠如，2008）以家長和國中生爲對象進行青少年健康行爲與親子關係大調查，回收 3,435 份有效問卷中，約八成的青少年認爲自己有心理困擾：主要來自升學、人際關係和親子關係。十年後，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中心（2018）針對六都國、高中生青少年憂鬱程度調查，23.9%情緒起伏不定，13.3%有明顯憂鬱情緒，而導致這些情緒困擾的前三大原因是課業考試壓力，對未來不確定性，以及人際關係。兒童福利聯盟（2018）分析青少年撥打求助專線的內容，青少年主要的煩惱是關於自己的心理健康如嚴重情緒困擾，而同儕相處是青少年排名第二的煩惱。這些調查結果共同指出人際關係占青少年生活很大的部分，應正視青少年因人際問題導致心理困擾的現象。

另一方面，家庭乃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的重要場域，對其行爲、情緒與認知發展影響甚大，家人間的互動於個體社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每個家庭是一個複雜的、且不斷地在改變的社會體系，因應著每位家庭成員變化，同時也影響其他的成員。以家庭生命週期來看，青少年面臨急速自己身心急速變化的階段，而青少年的父母處於中年危機（midlife crisis）的轉捩點，此階段的家庭可能面臨變動，整個家庭運作如婚姻關係、親子關係需要調整，父母衝突或家庭衝突達到最高峰，而這些家人關係的變化都會影響青少年的發展（Laursen & DeLay, 2011; Martin et al., 2011）。雖然父母間的不愉快或摩擦在所難免，但是子女們若是長期暴露於激烈地、沒有解決的父母衝突之下，很難避免地會產生負面作用（e.g., Cui et al., 2005; Cummings et al., 2014; Erel & Burman, 1995; Grych & Fincham, 1990; Harold & Sellers, 2018; van Eldik et al., 2020; Zimet, 2001）。

延伸過去探討父母衝突對於子女各種心理適應影響的豐富成果，本研究將

聚焦於青少年可能受父母衝突而產生的人際問題，特別是依人際環狀模式（interpersonal circumplex）來切入三種人際問題：懷恨報復、冷漠無情、社交退縮。此外，本研究進一步檢驗可能的影響機制。青少年孩子在情緒和認知能力的發展已逐漸成熟，對於環境的感覺變得敏感，在家庭生活也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可以掌握家人的互動情形，也有足夠的能力去評估父母衝突，以及選擇自己的因應方式。過去研究試圖從情緒感受和認知評估兩種影響途徑來探討其中可能的機制（Buehler et al., 2007; Mann & Gilliom, 2004），其中子女的威脅感受（Davies & Cummings, 1994）與效能信念（Fosco & Feinberg, 2015）是受到關注的中介變項。本研究將檢驗子女因父母衝突引起的威脅感與降低的效能感，是否成為導致青少年的人際問題惡化的關鍵。接下來進一步說明相關理論與研究結果。

一、以人際環狀模式探討青少年人際問題

以心理動力為基礎的人際理論學者們（e.g., Horney, 1945; Sullivan, 1953）強調人的社會性本質，透過各種人際情境，個體才會表現出心理健康或是精神障礙，因此人格、精神症狀、診斷和治療等應該從人際的角度來解釋和處理，強調人際關係為滿足個體愛（love）與權力（power）的基本需求。Leary（1957）以此為基礎提出人際環狀（interpersonal circle or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其模式包含親和（affiliation）和權力（power）兩個基本向度，代表親和橫軸的兩端為關愛（love）和敵意（hate）與代表權力縱軸之兩端為支配（dominance）和順從（submission）組合成環狀排列的人際行為模式。這個人際環狀模式應用於人際行為（e.g., Kiesler, 1983; Tracey et al., 2001）、人際特質（e.g., McCrae & Costa, 1989; Wiggins, 1979; Wiggins et al., 1989），更多學者應用於臨床上的人際問題（e.g., Alden et al., 1990; Horowitz et al., 1988; Monsen et al., 2006）等，為人際關係領域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基本理論與測量結構（Gurtman, 2009; Zimmermann & Wright, 2017）。

Wiggins（1979）以描述人際特質的性格形容詞為材料，找到八個主要的人際特質，形成一個環狀結構，再修訂為人際問題環狀量表（Inventory of the interpersonal problems- circumplex, IIP-C）（Alden et al., 1990），這個量表涵蓋全面且系統地人際問題，有支配（domineering）、懷恨報復（vindictive）、冷漠無

情 (cold/distant)、社交退縮 (socially avoidant)、無法自我肯定 (nonassertive)、過度配合 (overly accommodating)、自我犧牲 (self-sacrificing)、以及侵犯 (intrusive/needy) 等八種 (見圖 1)。

學者們於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語言、一般或臨床樣本等進行反覆驗證，多數結果支持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且環形結構穩定 (e.g., Akyunus & Gencoz, 2016; Boudreaux et al., 2018; Hughes & Barkham, 2005; Soldz et al., 1995; Wu et al., 2015; 洪佳琳、劉同雪, 2013)。本研究將人際問題環狀模式應用到青少年與家庭關係。有少數家庭研究也採用人際環狀模式探討發生在原生家庭的暴力行為會影響子女人際互動模式的發展，例如受虐兒童在兩個基本人際動機 (與他人保持關連、獨立與控制感的養成) 的發展上受阻，因而導致人際關係產生問題。此外，也有將人際問題視為親子代間攻擊行為傳遞的中介，特別是支配、復仇自我中心、侵犯這三類人際問題 (Murphy & Blumenthal, 2000)。本研究著眼於子女的人際問題如何受到父母衝突影響，必得進一步考慮人際問題產生背後的互動原則與相互影響。

Carson (1969) 以 Leary 的人際環狀模式模式為基礎提出人際行為的互補 (complementarity) 原則，包含相互性 (reciprocity) 與對等性 (correspondence) 兩種運作。相互性運作在權力向度上，權力向度的兩端 (支配—順從) 的運作是相對的，即一方的支配行為會引起對方的順從行為，順從的行為會引發支配的行為。而對等原則作用於親和向度上，關愛或敵意的人際行為會引起對等行為，即一方的關愛會引起對方的關愛行為，一方的憎恨行為也會引發對方的憎恨行為。若將兩個向度組合起來，敵意順從的行為會引發對方敵意支配的行為反應，而友善順從的行為易於引起對方友善支配的行為反應。此種人際互動的規律，即是所謂的互補法則 (見圖 1)。這樣的理論預測在一般人際互動得到實徵研究的支持 (Markey et al., 2003; Tracey et al., 2001)。我們欲將這個人際問題的理論結構與運作方式應用在家人互動上，而父母衝突可能引起子女哪些人際問題呢？接下來納入家庭研究的文獻來討論。

二、青少年知覺之父母衝突

對於當代的青少年來說，家庭無疑是他們最熟悉且影響最深的日常生活情境，因此，家庭脈絡中的人事物，成為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的重要結構因

素。依子女知覺父母衝突的概念性定義涉及子女對父母間互動的評估，其中特別強調子女如何感受和理解這些互動中的衝突程度。這包括子女對於父母衝突發生的頻率、強度、解決衝突的方式，以及衝突對家庭氛圍和個人情緒的影響的認知（Cummings et al., 2015; Davies et al., 2012; Grych, 1998; van Eldik et al., 2020）。這種知覺不僅是對具體事件的記憶，也包括了子女對於父母衝突情緒和行為模式的內化與反思，並強調子女知覺的主觀性。

雖然父母間偶有爭吵或不合普遍存在於一般或失能家庭當中，但是高頻率、高強度、具敵意與暴力的衝突型式會引發孩子負面情緒，如憤怒、悲傷、擔心、焦慮、困惑，及無助絕望的憂鬱傾向；反應在人際關係上，容易感受到被拒絕和不被喜愛，因而導致沮喪、退縮或生理上的問題（Benson et al., 2008; Goeke-Morey et al., 2013），以及容易出現外化行為偏差的問題，例如高攻擊性、對人充滿敵意、反叛、不服規則，甚至出現反社會化的犯罪行為（Choe & Zimmerman, 2014; Fosco et al., 2014; Katz & Gottman, 1993; Su et al., 2011）。國內亦有相關研究證據支持（方紫薇，2003）。

從青少年時期培養獨立及自主性的發展任務來看，子女若因受到從父母而來的緊張和焦慮，缺乏足夠心力資源投入各種社會關係，會影響其社交與人際相處技巧、問題解決能力、廣泛的社交能力（Feldman & Masalha, 2010）。人際關係問題包括過度表現自己造成他人反感、尋求被注意與讚美、對別人刻意疏離，及壓抑自己真正想法等，而導致親子衝突增加（Benson et al., 2008），手足關係惡化（Stocker & Youngblade, 1999），同儕關係不佳（Finger et al., 2010），親密關係困難（Cui & Fincham, 2010），甚至於延續到成年期婚姻關係不穩定（Wolfinger, 2000）與暴力行為（Narayan et al., 2013）。除了過去廣被研究者關注的兒童期子女，青少年期的子女同樣深受父母衝突影響，特別是對於人際關係的影響甚至於延伸到成年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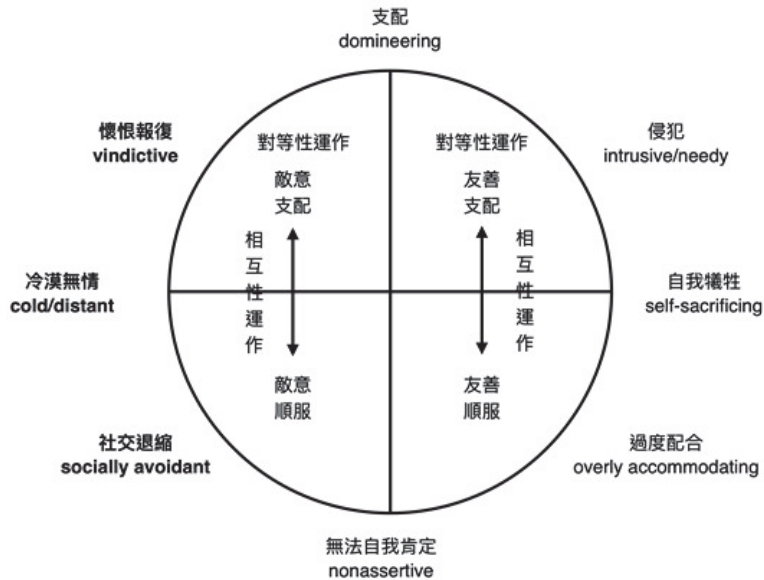
回到人際環狀模式，分別從「親和」和「權力」兩個向度來針對青少年因父母衝突可能產生的人際問題進行概念化的探討。依據社會學習理論，在父母頻繁或激烈衝突的情境下，子女觀察到父母之間的敵對互動，可能會學習並內化與模仿（modeling）這些行為，並在自己的人際關係表現出類似的敵意（Bandura, 2021）。長期處於衝突環境中的子女可能會發展出不適當的情緒調節策略，如敵意和攻擊性行為，以回應父母的衝突行為（Bergman et al., 2014）。根據依附理論，不安全的依附關係可能導致子女發展出攻擊性或防禦性的人際策

略，以此作為自我保護的方式（Buehler et al., 2007; Buehler & Welsh, 2009）。另有研究提供跨代傳遞模型顯示父母的衝突行為和情緒表達方式可以透過跨代傳遞影響或外溢（spillover）到子女的人際關係模式，例如父母彼此的敵意行為可能被子女視為解決衝突的合理方式（Benson et al., 2008; Cui et al., 2010; Li et al., 2023）。

由上述理論與實徵研究推論，若長期面對父母嚴重衝突，子女沈浸於充滿敵意與攻擊的家庭氣氛，依據人際模式親和向度的對等性原則，子女的人際模式較可能落在「敵意」傾向而非友善傾向。而子女觀察父母雙方的互動可能有權力對等，例如雙方都是強勢支配者，或者不平衡等情況，都可能引起衝突（Cummings et al., 2015; Davies et al., 2012），因此子女人際模式在權力向度上「支配」和「順從」兩種情況都有可能發生。組合起來子女可能產生「敵意支配」到「敵意順從」的人際模式。以圖一來看，對應的人際問題包含：(1)懷恨報復：因憤怒、怨恨等激烈的負面情感，人際關係容易以攻擊與自我中心形式發展，產生摩擦和對立；(2)冷漠無情：將負面情感朝向自己，沒有自信，後悔、猶豫不決，對於外界冷漠以對；(3)社交退縮：因被傷害而一直忍耐著痛苦，壓抑自己的感受，採取自我防禦而從社交活動退縮（見圖 1）。或許另有不同的影響歷程導致子女產生其他的人際問題，由於國內外尚無相關文獻應用人際問題環狀模式來探討父母衝突對子女之影響，本研究做為初次嘗試，優先討論長期面對嚴重父母衝突的青少年可能產生懷恨報復、冷漠無情與社交退縮三種人際問題，而非其他可能的人際問題，因為這三種問題直接體現了由於家庭衝突累積而來的敵意。

圖 1

人際環狀模式與運作



註：修改自 Alden et al. (1990)與 Carson (1969)。粗體為本研究關注青少年的人際問題。

三、父母衝突影響青少年人際問題的機制

眾多研究成果支持父母衝突對子女重大影響之後，研究方向轉向探討父母衝突對子女影響的機制。最早由 Grych 與 Fincham (1990; 1993) 提出認知——情境架構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認為兒童的威脅評估是中介父母衝突與兒童內化問題的主要因素；而 Davies 與 Cummings (1994) 的情緒安全感假說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 主張：父母衝突剝奪了兒童在家人關係的安全感。上述兩個理論同樣強調子女威脅感的評估。

因父母衝突引起的威脅評估包括孩子可能擔心衝突會導致不好的結果的普遍性擔憂，或者更具體的焦慮，即衝突可能變得更嚴重、導致離婚、或者有家人受到傷害 (Atkinson et al., 2009; Grych & Cardoza-Fernandez, 2001; Grych et al., 1992)。實徵研究發現父母衝突引起兒童的威脅感與自責感而導致其他不良適應 (Grych, 1998; Gerard et al., 2006)。橫斷研究和追蹤研究一致顯示子女的威

脅感受與其情緒困擾（即內化問題）相關（Fosco & Grych, 2008; Gerard et al., 2006），威脅感也與問題行為有關（Gerard et al., 2006; Rhoades, 2008）。

綜合來說，學者們以過程取向（process-oriented）的觀點，強調情緒上或認知上受到威脅的評估是父母衝突和兒童適應關聯的中介變項，也就是父母衝突使得孩子有較高、較多的憤怒或苦惱等負向情緒，造成其不安全感，因而影響孩子因應生活問題的能力。換言之，是威脅感受代表著情緒上的不安全感降低孩子因應生活壓力與挑戰的能力，並降低情緒和行為的調節能力。Cummings等學者（2015）追蹤於兒童時期接觸到的父母衝突，透過子女威脅評估的中介歷程，影響延續到青少年時期的內、外化適應問題。尤其是加入子女年齡做為調節變項，威脅感的作用對青少年更為顯著，此結果擴展傳統依附理論認為安全性依附作用在嬰兒與兒童早期的看法：子女成長過程經歷越多父母衝突並承受隨之而來的家庭劇變，親子關係中的不安將帶來全面與持續性的結果。此外，威脅感受做為中介歷程也得到跨文化的支持（Li et al., 2016）。然而過去實徵研究關注於子女情緒困擾和行為問題，本研究將著眼子女的人際關係問題，延伸檢驗威脅感受做為父母衝突導致子女人際問題的中介影響。

除了威脅感受外，以社會認知理論為基礎的「認知——情境架構」學者們亦重視父母衝突對子女影響的中介歷程是子女對於自己因應父母衝突的效能預期（Grych & Fincham, 1990; 1993），也有更多研究延伸到孩子的一般自我效能信念（general self-efficacy belief）（Compas, 1987; Fosco & Feinberg, 2015）。效能信念除了涵蓋整體性的自我評價外，更可指涉具有任務與範疇特定性（task- and domain-specific），是個體針對特定情境或特定任務中的自我判斷（Bandura, 1982）。自我效能應用於社交或人際範疇得到許多研究支持，即社交或人際自我效能（social/ interpersonal self-efficacy）可以提升人際壓力因應技巧，並降低降低青少年人際關係的焦慮（Matsushima & Shiomi, 2003）。學者試圖整合人際理論與社會認知理論，強調人際效能信念主導人際互動狀態，以減少人際問題產生（Locke & Sadler, 2007；蔡順良，2008）。

人際效能在青少年的人際關係和互動中扮演決定性角色（Coleman, 2003; Matsushima & Shiomi, 2003）。具體來說，Innes 和 Thomas（1989）研究發現人際效能較低的學生，伴隨著沒有解決人際問題的能力，而有社交退縮行為。另一方面，高人際自我效能則有助於青少年勇於社交、參與團體或活動、展現友好行為以及獲取和提供幫助等技能（Connolly, 1989）。

目前已有豐富的實徵研究提供父母衝突有害於子女一般自我效能的證據（e.g., Fosco & Feinberg, 2015; McCauley et al., 2019; Siffert et al., 2012），雖然直接針對子女人際效能的研究尚付之闕如。不過仍有一些相關研究說明這個可能性，表示父母衝突可能作為長期壓力因素，逐漸侵蝕青少年的人際自我效能。Reed-Fitzke（2020）整理多個自我概念的系統性文獻回顧，認為自我效能，特別是範疇特殊性的效能如人際自我效能，適合作為家庭層面因素（如父母衝突或教養方式）影響青少年心理適應的一種機制。而曾目睹家庭暴力（父母之間肢體與言語攻擊）更被證明與青少年社交和人際效能低落有顯著關聯（Karakuş & Göncü-Köse, 2023）。

綜合上述相關理論與研究的整理，本研究將以子女的「威脅感受」和「人際效能」分別做為父母衝突對於子女人際問題的兩個中介影響因子，檢驗這兩個平行中介歷程的效果。

四、青少年性別差異

在父母衝突對子女影響的研究脈絡下，過去關於性別差異上的問題著重在男孩還是女孩容易受到父母衝突的影響，但結果相當歧異；亦有研究者認為在高度父母衝突的家庭裡，男孩和女孩都受到影響，但是影響的機制可能是相當不同的。有些研究顯示男孩和女孩在評估父母之間的衝突時是不同的過程，女孩會傾向自己必須為父母衝突負責任，也因此比較容易有責備自己的傾向（Vuchinich et al., 1988; Davies & Lindsay, 2004）；而自我責備這樣的傾向，使得女孩在面對父母的衝突時，容易出現所謂內化的適應問題，例如憂鬱和難過等情緒上的問題。而男孩在面對父母的衝突時會知覺到較大的威脅，使得他們在行為上表現出較高的憤怒和攻擊性，即男孩會容易出現外化的行為問題（Cummings et al., 1994; Hosokawa & Katsura, 2019）。

父母衝突對男孩和女孩的影響可能隨著年齡不同，在兒童早期或中期的發展階段時，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受到父母衝突的負面影響，而造成男孩有更多的心理困擾和行為問題；但到了兒童晚期及青少年時期，男孩女孩產生問題的機率相當（Zaslow, 1989）。在一個長達三十年的臨床研究中（Werner, 1989），高危險群的孩子在青少年時期以前，男孩比較容易受到環境的傷害影響而產生心理問題，但女孩在青少年時期比男孩更容易產生心理病理症狀。

在青少年人際關係的研究，有些證據顯示青春期的女孩比男孩報告更多的人際關係壓力（Ge et al., 1994; Hankin et al., 2007; Rudolph, 2002）。同樣，女孩對於來自家人和同儕人際壓力有更大的反應而導致其人際困擾（Flook, 2011; Shih et al., 2006）。然而，也有其他研究顯示女孩比男孩有更多的人際因應技巧，引發人際嚴重衝突的情況少見，人際問題特別是關於暴力行動也比男生少（Black, 2000; Rose et al., 2016）。Rose 和 Rudolph（2006）的回顧研究整理許多青少年同儕關係研究，強調人際關係包含許多層面與歷程，更是影響兩個性別的社會與情緒發展。

據此，我們試圖在本研究檢驗父母衝突對於子女產生威脅感受、人際效能、及三種人際問題的影響，可能對於男生和女生有不同的效果。性別代表著不只是生理因素，更是個體社會化的過程，因此性別在父母衝突對於子女適應的影響歷程中扮演複雜的角色（Snyder, 1998），從過去實徵研究也很難得到一致的結果，也因此不少研究直接忽略性別差異。但由於本研究關注對象是青少年，正值性別發展與認同階段，欲探討父母衝突透過威脅感受和人際效能而與子女人際問題相關的影響歷程中，將子女性別視為調節變項，除各個心理構念的性別差異，可以進一步分析男生與女生可能有不同的影響機制。

五、研究目的與假設

家庭是重要的人際互動與社會化的場所，子女在家庭內若身處在家人的衝突當中，也必然發展長期適應結果。本研究希望藉由文獻整理提出的研究架構，使父母衝突與子女人際問題之關係的呈現更有理論意涵，並佐以實徵資料的支持。本研究主要有三個研究目的。(1)以「人際環狀模式」之運作提出父母衝突可能導致子女的三種人際問題：懷恨報復、冷漠無情、社交退縮。(2)探討「認知——情境架構」、「情緒安全感假說」和「社會認知理論」等各相關理論提出的可能影響機制，這些理論彼此不互斥也不互相排擠，因此本研究同時檢驗威脅感受和人際效能的平行中介效果。(3)性別差異在青少年的友誼發展和人際關係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因此加入子女性別做為父母衝突對子女影響歷程的調節因素。研究架構圖見圖 2。

此外，不少文獻討論父母教養、父母衝突與子女適應之關係，即親職行為和父母衝突之間的相互影響是透過家庭系統的動態互動進行的。父母的教養方

式可能會影響家庭中的衝突模式，例如過度控制或忽視的教養可能加劇父母衝突。另一方面，持續的父母衝突可能削弱親職效能，導致不一致的親職行為，進而影響子女的心理社會適應。例如，父母難以一致地施行規則，或可能因為衝突而分散了注意力，無法對子女的需要做出適當回應。過去研究呈現父母衝突影響親職行為，或是不當的親職行為引發父母衝突（Block et al., 1981），而父母衝突也會擴大彼此在教養觀念上的差距，出現更多不一致教養（徐麗瑜，2012; Kerig et al., 2012），因此本研究加入父母教養的測量做為控制變項，希望在排除父母教養的影響之外，得以呈現父母衝突對於子女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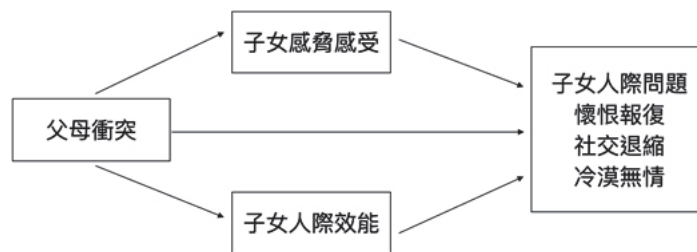
假設一：父母衝突會對子女的人際問題（懷恨報復、冷漠無情、社交退縮）產生顯著影響，意味著父母衝突的增加會導致這些人際問題的增多。

假設二：子女的威脅感受和人際效能在父母衝突與子女人際問題之間扮演中介作用。具體來說，預期父母衝突會增加子女的威脅感受，降低人際效能，進而加劇人際問題。

假設三：基於既有研究發現性別的影響方向分歧，本研究探索性地檢驗前述中介歷程在青少年兩性是否具有不同的影響。換言之，子女的性別調節父母衝突與子女人際問題之間的中介關係，即女生與男生的威脅感受和人際效能對於衝突與人際問題關係的中介作用會有不同的影響程度。

圖 2

研究架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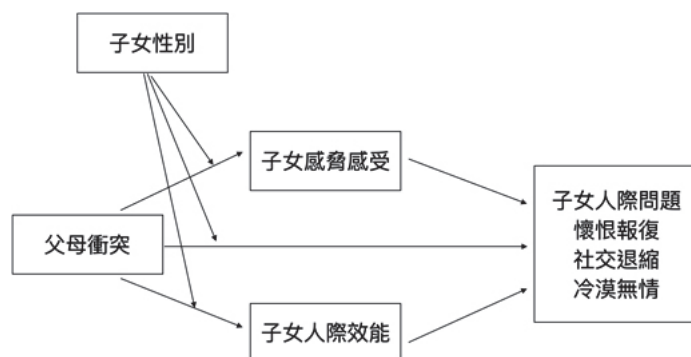


平行中介模式

（續下頁）

圖 2

研究架構圖（繪）



加入子女性別的調節式中介模式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取方便取樣（convenience sampling），選取大台北地區八所國中，涵蓋市區與近郊等不同地區之公私立學校，分別是台北市南港國中、仁愛國中、信義國中、天母國中，新北市福和國中、永和國中、五股國中，以及私立恆毅中學各兩個班級。發放研究說明和知情同意書的學生共計 651 名，其中 8 名學生因家長或自己不同意參與研究沒有進行後續施測。施測後回收問卷扣除 25 位因父母離異和父親去世而未能完整回答問卷，加上 19 位明顯亂答者共 44 位，有效問卷為 599 份。

有效問卷中女生 315 位（52.6%），男生 284 位（47.4%），平均年齡 14.3 歲，範圍由從 12 歲到 16 歲。父親平均年齡是 44.3 歲（31 到 66 歲，標準差 4.62），母親的平均年齡為 41.23 歲（31 到 69 歲，標準差 4.01）。父母親的婚

姻狀況，90.2%是父母同住，7.5%為離婚或分居，1.2%父親去世，其他例如因工作分居的情形 1.2%。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多在高中職與大專以上，所占的百分比分別是 69.9%（父）和 63.3%（母），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呈現正相關，而父親的教育程度略高於母親。其他家庭背景資料，72%為父母和孩子組成的小家庭，和祖父母同住的比率是 18.3%，和其他親戚同住的比率為 6.7%。子女六歲以前的主要照顧者為母親或母親和其他家人占了 77.13%，其中由父母共同照顧的比率最高（34.4%），母親為主要照顧者次之（27.0%），還有母親與其他家人（15.7%）；另外孩子由祖父母或外祖母照顧的比率則有 14.8%。資料請見表 1。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包含個人與家庭背景資料、父母衝突、父母教養、人際效能、人際問題，分別說明如下。

（一）個人與家庭背景資料

個人與家庭背景問題包括子女性別（0：女生，1：男生）、子女年齡、父母年齡、父母教育程度（1：國小及以下，2：國中，3：高中職，4：大專及以上），子女在六歲前的主要照顧者（可以複選，選項有父親、母親、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他）以及父母的婚姻狀況（1：同住，2：離婚或分居，3：父親過世，4：母親過去，5：其他）。資料請見表 1。

表 1
參與者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子女性別	女生	315	52.6
	男生	284	47.4
子女年齡	12 歲	5	0.8
	13 歲	79	13.2
	14 歲	285	47.5
	15 歲	196	32.7
	16 歲	34	5.7

（續下頁）

表 1

參與者基本資料 (續)

		人數	百分比
父親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69	11.5
	國中	106	17.7
	高中職	217	36.2
	大專及以上	202	33.7
	不知道	5	0.8
母親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91	15.2
	國中	119	19.9
	高中職	246	41.1
	大專及以上	133	22.2
	不知道	10	1.7
同住家人	只有父母和兄弟姊妹	431	72.0
	與祖父母同住	109	18.3
	與其他親戚同住	59	6.7
六歲前主要照顧者	雙親	205	34.3
	母親	102	17.0
	母親與其他家人	94	15.7
	祖父母	129	14.8
	其他家人	413	16.9
	沒作答	8	1.3
父母婚姻狀況	同住	540	90.2
	離婚或分居	45	7.5
	父親過世	7	1.2
	其他	7	1.2
小計		599	100.0

(二) 父母衝突

子女知覺父母衝突測量修訂自「兒童知覺父母親衝突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s; Grych et al., 1992) 之衝突性質 (conflict properties) 分量表, 原題項包含子女知覺父母衝突發生的頻率、強度、衝突型式、解決衝突方式等多向度的評估。本研究做了兩項修訂: (1) 將其中單題、概

括性的頻率測量，改以台灣父母最常引起五大類不愉快或爭執：子女管教問題、父母個性不合、與家事有關的衝突、因家族事務發生衝突、外遇問題（瞿海源，2015），請子女回答知道父母發生這些衝突的頻率。(2)參考「衝突策略量表」（Conflict Tactics Scales; Straus, 1979），調整單題衝突型式，區分為言語攻擊「當爸媽吵架時，他們會向對方說出難聽的話」和暴力「當爸媽發生衝突時，他們會丟東西」兩種衝突型式。修訂後整份量表共 11 題，從 1 代表「完全沒有」到 6 代表「常常」六點量表測量，Cronbach's α 為.82。

（三）威脅感受

子女因父母衝突導致的威脅感受取自「兒童知覺父母親衝突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s; Grych et al., 1992）之「受威脅感」分量表，題目例如「我擔心爸媽可能會離婚」、「爸媽吵架時。也會對我大吼大叫」等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六點量表測量，共有四題，本研究得到的 Cronbach's α 為.78。

（四）人際效能

取自吳英璋（1993）編製「自我效能量表」之分量表「合群圓熟自我效能」，題目例如：「我對自己的社交能力感到很滿意。」、「我和別人一起合作會使事情做得很好。」、「我的家人朋友對我都很有重視。」等。以 1 分代表「完全不符合」到 6 分為「完全符合」的六點量尺計分，人際效能測量共六題，Cronbach's α 為.72。

（五）人際問題

本研究欲探討懷恨報復、冷漠無情、社交退縮三種人際問題，測量取自李錦虹（1997）依人際環狀模型理論（Kiesler, 1983）編製「人際困擾量表」三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原題數比較多，本研究選取因素負荷量高於 0.45 的題目，懷恨報復的題目如：「我常常因為懷恨某些人而心情惡劣」、「我無法忍受和我所看不慣的人相處一起」等。冷漠無情的題目如：「我對人太冷淡，以致於享受不到友情的溫暖」、「我對別人缺乏興趣，常和別人聊不到幾句話便感到無聊」等。社交退縮的題目如：「我不夠主動、常被人遺忘」、「我不喜歡待

在人群中，所以很難交到知心朋友」等。以 1 分代表「完全不符合」到 6 分爲「完全符合」的六點量尺計分。懷恨報復的題目共六題，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爲.75。冷漠無情的測量共七題，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爲.83。社交退縮共八題，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爲.85。

（六）父母教養

父母教養行爲以溫暖和控制兩個向度測量，取自朱瑞玲（1989）親子關係量表與吳英璋（1993）父母親管教態度量表。「溫暖」的題目例如「爸爸（媽媽）很關心我的事」、「在我害怕或難過的時候，爸爸（媽媽）會想辦法幫助我」等有五題。「控制」的題目例如「我做錯事情的時候，爸爸（媽媽）會罵我或處罰我」、「爸爸（媽媽）會定出一些規則來規範我的行爲」等有四題。溫暖和控制教養行爲針對父母親各回答一次，以 1 分代表「完全不符合」到 6 分爲「完全符合」的六點量尺計分。因溫暖和控制兩種教養在父親與母親測量相關達.79 和.69，參考其他學者處理方式（e.g., Park et al., 2021），將父親和母親兩份測量合併計算爲父母教養指標。「父母溫暖」教養共 10 題，Cronbach's α 爲.79。「父母控制」教養共八題，Cronbach's α 爲.72。

三、統計分析

爲檢驗假設一，先進行迴歸分析，以父母衝突（加上父母教養爲控制變項）去預測三個青少年人際問題。接著檢驗假設二爲兩個中介變項的平行中介模式（parallel mediation）與假設三的調節式中介模式（moderated mediation），本研究採用 Hayes（2017）所發展的 SPSS 巨集 PROCESS 3.4，以採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經由多次重複抽樣來估算中介效果的直接效果和間接效果的信賴區間，95%的信賴區間未包含 0 即代表具有顯著性。

過去中介模式採用 Sobel test 檢驗間接效果的顯著性，但中介模式愈複雜時，Sobel test 變得複雜、更難計算（MacKinnon et al., 2002）。Bootstrapping 是一種無母數重複抽樣方法，優勢在於抽樣分配不需符合傳統常態分配假設的要求，亦比 Baron 與 Kenny 的因果步驟法（causal steps approach）有較大的統計力（power）與更能控制第一型錯誤（type I error）（Preacher & Hayes, 2008）。

平行中介模式使用 PROCESS Model 4 分析，分別以子女三種人際問題爲依

變項，同時考量兩種中介變項子女威脅感受和人際效能，檢驗父母衝突影響的直接和間接效果。調節式中介模式使用 PROCESS Model 8 分析，加入子女性別檢驗男生和女生其中介模式的直接與間接效果是否不同。父母的溫暖與控制教養可能影響子女威脅感受、人際效能與人際問題，加入兩個模式分析做為控制變項。

參、研究結果

一、描述性分析

關於各變項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結果列於表 1。父母教養兩個向度：溫暖與控制呈現正相關（男生 $r = .24$ ，女生 $r = .14$ ），男女生都認為父母提供相當程度溫暖和控制教養，沒有性別差異，但是男生比女生更知覺到父母的控制。子女知覺父母衝突的嚴重度普遍不高，但是女生顯著高於男生，同時女生感受到的威脅評估也高於男生。子女的人際效能高於 4 分，沒有性別差異，顯示男女生對於自己的人際能力有信心，不過青少年們仍有一些人際問題的報告，其中男生比女生有社交退縮的困擾。

表 2
男生各變項的敘述性統計

	相關							
	父母溫暖教養	父母控制教養	父母衝突	子女威脅感受	子女人際效能	子女懷恨報復	子女社交退縮	子女冷漠無情
父母溫暖教養								
父母控制教養	.25***							
父母衝突	-.25***	.18**						
子女威脅感受	-.28***	.13*	.65***					
子女人際效能	.39***	.11	-.26***					
子女懷恨報復	-.07	.07	.30***					
子女社交退縮	-.07	-.03	.21***					
子女冷漠無情	-.11	.05	.22***					
男生平均值 (標準差)	4.13(1.02)	4.06(1.04)	1.96(0.78)	2.05(1.16)	4.18(0.89)	3.05(1.12)	2.69(1.10)	3.12(1.09)
女生平均值 (標準差)	4.10(1.05)	3.79(1.06)	2.14(0.92)	2.26(1.21)	4.14(0.87)	2.90(1.09)	2.50(1.17)	3.26(1.17)
t 檢定	.31	3.18***	-2.54**	-2.17*	.52	1.69	1.96*	-1.50

* $p < .01$; ** $p < .01$; *** $p < .001$

相關部分左下角為男生資料，右上角為女生資料

二、假設一檢驗

以迴歸分析檢驗假設一，子女性別和父母教養（控制和溫暖）為控制變項，父母衝突為獨變項分別去預測三個人際問題為依變項，結果見表 3。結果顯示父母衝突與懷恨報復、社交退縮、冷漠無情三個青少年人際問題有顯著正相關（標準化迴歸係數：懷恨報復 $\beta = .29, p < .001$ ；社交退縮 $\beta = .15, p < .001$ ；冷漠無情 $\beta = .20, p < .001$ ）。亦即父母衝突愈嚴重，子女報告三類人際問題愈多。

表 3

父母衝突預測青少年人際問題的迴歸分析

	人際問題		
	懷恨報復	社交退縮	冷漠無情
子女性別	.10(.09)*	.10(.09)*	-.04(.09)
父母控制教養	.01(.04)	-.04(.05)	.02(.05)
父母溫暖教養	-.08(.04)	-.06(.05)	-.11(.05)*
父母衝突	.29(.05)***	.15(.06)***	.20(.06)***
R^2	.11	.04	.06
F	F(4,594)=17.62***	F(4,594)=5.84***	F(4,594)=10.14***

註：子女性別：0 代表女生，1 代表男生

表中數值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 $p < .05$, ** $p < .01$, *** $p < .001$

三、假設二檢驗

檢驗假設二採用平行中介模式，以拔靴法多次重複抽樣估算中介效果的直接效果和間接效果的信賴區間，中介模式結果於表 4。

（一）控制變項的效果

初步分析加入兩類控制變項，分別是人口背景變項的子女年齡與父母最高的教育程度，以及父母教養變項的控制教養和溫暖教養。人口控制變項節子女年齡和父母教育程度的分析結果顯示：(1)這兩個變項對中介變項（人際效能、

威脅感受)與依變項(懷恨報復、社交退縮、冷漠無情)的迴歸係數都不顯著，(2)加入子女年齡和父母教育兩變項模式總效果量分別為.36(懷恨報復)、.18(社交退縮)、.28(冷漠無情)，與不加模式總效果量.35、.18、.27的增加量不顯著，(3)檢查模式其他變項的迴歸係數稍有增減，不過顯著效果都沒有改變。依循模式精簡的科學原則，之後分析則不再加入。

關於父母教養變項的效果，父母的控制教養與子女威脅感受成正比($\beta = .07$ ，95%信賴區間[.01~.14])，即父母平時對子女的嚴格管教，讓子女面對父母衝突時所引發的威脅知覺提高；另一方面，父母的溫暖教養減少子女的威脅感受($\beta = -.11$ ，95%信賴區間[-.19~-0.04])，或許可以調節子女面對父母衝突的緩衝。同時，溫暖教養也可以提升子女的人際效能($\beta = .33$ ，95%信賴區間[.27~.40])。但是父母教養對於子女人際問題沒有顯著相關，顯示父母教養對於子女人際問題的影響不比父母衝突來得顯著。

(二) 中介路徑的效果

檢驗威脅感受和人際效能兩個中介變項的效果。父母衝突愈嚴重，子女感受到愈多的威脅感($\beta = .69$ ，95%信賴區間[.60~.70])，而且子女的人際效能也降低($\beta = -.10$ ，95%信賴區間[-.18~-0.02])。人際效能到三種人際問題為顯著負相關(懷恨報復 $\beta = -.30$ ，95%信賴區間[-.40~-0.20]；社交退縮 $\beta = -.67$ ，95%信賴區間[-.77~-0.57]；冷漠無情 $\beta = -.43$ ，95%信賴區間[-.53~-0.32])。威脅感受會使懷恨報復的問題嚴重($\beta = .09$ ，95%信賴區間[.02~.16])，也導致冷漠無情的情況增加($\beta = .09$ ，95%信賴區間[.02~.17])，但是對於社交退縮的影響不顯著。綜合來說，父母衝突透過削弱子女人際效能而使得三種人際問題增加，這三個中介效果是顯著的，而子女的威脅感受的中介效果則出現在懷恨報復與冷漠無情這兩項人際問題。

(三) 直接路徑的效果

除了上述中介效果外，父母衝突到子女的人際問題的直接效果在懷恨報復($\beta = .26$ ，95%信賴區間[.13~.39])和冷漠無情($\beta = .16$ ，95%信賴區間[.03~.29])仍維持顯著，為部分中介效果。而父母衝突到社交退縮的直接效果則不顯著，由子女的人際效能做完全中介效果。

表 4
父母衝突對於子女人際問題的中介分析

控制變項	中介變項		人際問題	
	人際效能	威脅感受	懷恨報復	社交退縮
父母控制教養	.03(.03)[- .03~.09]	.07(.04)[.01~.14]	.03(.04)[- .05~.12]	.00(.04)[- .08~.08]
父母溫暖教養	.33(.03)[.27~.40]	-.11(.04)[- .19~-.04]	-.02(.05)[- .07~.11]	-.02(.05)[- .06~.24]
直接路徑				
父母衝突			.26(.07)[.13~.39]	.16(.07)[.03~.29]
中介路徑				
父母衝突	-.10(.04)[- .18~-.02]	.69(.04)[.60~.70]		
人際效能			-.30(.05)[- .40~.20]	-.43(.05)[- .53~.32]
威脅感受			.09(.04)[.02~.16]	.09(.04)[.02~.17]
直接效果量			.26(.07)[.13~.39]	.16(.07)[.03~.29]
間接效果量(人際效能)			.03(.01)[.01~.06]	.04(.02)[.01~.08]
間接效果量(威脅感受)			.06(.03)[.02~.15]	.06(.03)[.03~.16]
綜合效果量			.35(.05)[.25~.46]	.27(.06)[.16~.37]

註：表格內數字分別為標準化迴歸係數（標準差）〔95%信賴區間〕。
信賴區間若沒有涵蓋 0，表示係數（或是直接、間接效果）顯著，以粗體表示。

四、假設三檢驗

檢驗假設三以調節式中介模式，加入子女性別去預測威脅感受、人際效能和人際問題，結果見表 5。性別在中介模式的調節效果發生於父母衝突對於子女人際效能的影響（ $\beta = -0.16$ ，95%信賴區間 $[-.31 \sim -.01]$ ）。針對調節效果之簡單斜率檢驗（simple slope）（Cohen et al., 2003; Hayes, 2017）如圖 3 所示，父母衝突對女生的人際效能無顯著影響（原始迴歸係數 $b = -0.04$ ， $p = .43$ ），但是男生的人際效能則明顯受到父母衝突影響（原始迴歸係數 $b = -0.20$ ， $p < .01$ ），因父母衝突愈高，人際效能下降愈多。

以中介模式整體來看，男生因為父母衝突減損其人際效能導致三種人際問題（間接效果：懷恨報復 $\beta = 0.06$ ，95%信賴區間 $[.02 \sim .12]$ ；社交退縮 $\beta = 0.14$ ，95%信賴區間 $[.04 \sim .24]$ ；冷漠無情 $\beta = 0.09$ ，95%信賴區間 $[.02 \sim .12]$ ），而女生的人際效能不因父母衝突影響。而威脅感受在男女生身上都有中介效果（間接效果：懷恨報復，男 $\beta = 0.07$ ，95%信賴區間 $[.02 \sim .15]$ ，女 $\beta = 0.07$ ，95%信賴區間 $[.02 \sim .16]$ ；冷漠無情，男 $\beta = 0.06$ ，95%信賴區間 $[.03 \sim .16]$ ，女 $\beta = 0.06$ ，95%信賴區間 $[.03 \sim .15]$ ），即子女人際關係上的懷恨報復與冷漠無情來自於因其父母衝突所引起的威脅感受。除人際效能和威脅感受的中介效果外，父母衝突的直接效果影響子女的懷恨報復（男 $\beta = 0.27$ ，95%信賴區間 $[.09 \sim .45]$ ，女 $\beta = 0.28$ ，95%信賴區間 $[.13 \sim .43]$ ），還有女生的冷漠無情也受到父母衝突的直接影響（ $\beta = 0.17$ ，95%信賴區間 $[.02 \sim .3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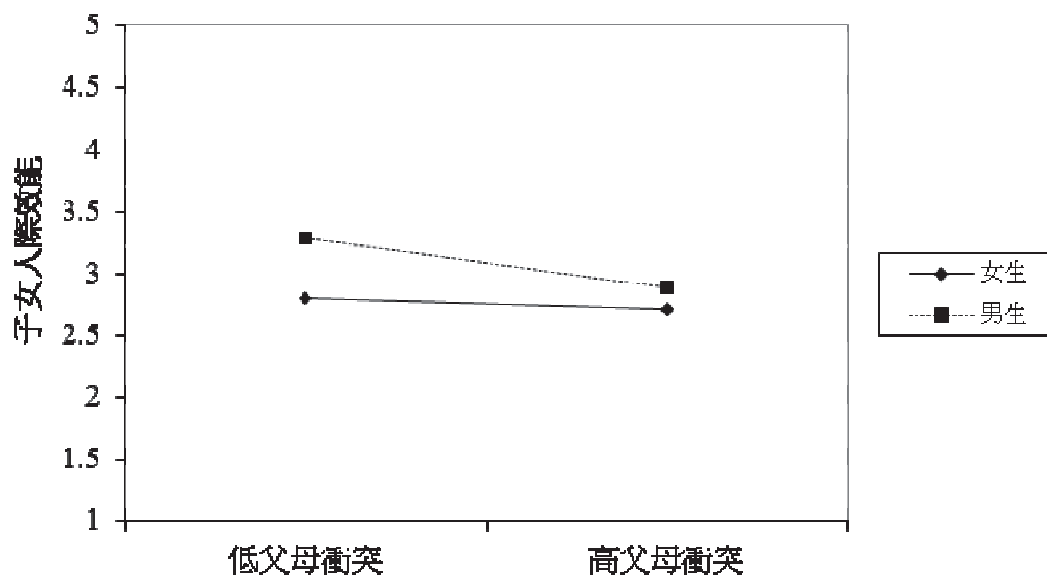
表 5
加入子女性別，父母衝突對於子女人際問題的調節式中介分析

	中介變項		人際問題	
	人際效能	威脅感受	懷恨報復	社交退縮
控制變項				冷漠無情
父母控制	.03(.03)[- .03~.09]	.08(.04)[.01~.15]	.02(.04)[- .06~.10]	.03(.04)[- .06~.11]
父母溫暖	.33(.03)[.27~.40]	-.11(.04)[- .19~.04]	-.03(.05)[- .06~.12]	.03(.05)[- .06~.13]
直接路徑				
父母衝突			.28(.08)[.13~.43]	.17(.07)[.02~.33]
中介路徑				
父母衝突	-.04(.05)[- .14~.06]	.66(.06)[.55~.77]		
人際效能			-.30(.05)[- .40~.20]	-.43(.05)[- .53~.32]
威脅感受			.07(.05)[- .02~.17]	.07(.05)[- .03~.17]
調節路徑				
子女性別	.33(.17)[.01~.67]	-.17(.19)[- .54~.20]	.23(.22)[- .20~.66]	.02(.23)[- .43~.46]
子女性別×父母衝突	-.16(.08)[- .31~.01]	.05(.09)[- .12~.22]	.03(.10)[- .16~.22]	-.05(.10)[- .25~.15]
直接效果量 (男)			.27(.09)[.09~.45]	.12(.09)[- .06~.31]
直接效果量 (女)			.28(.08)[.13~.43]	.17(.08)[.02~.33]
間接效果量 (人際效能) (男)			.06(.03)[.02~.12]	.09(.03)[.02~.16]
間接效果量 (人際效能) (女)			.01(.01)[- .02~.04]	.02(.02)[- .02~.06]
間接效果量 (威脅感受) (男)			.07(.04)[.02~.15]	.06(.03)[.03~.16]
間接效果量 (威脅感受) (女)			.07(.03)[.02~.16]	.06(.03)[.03~.15]

註：子女性別：0 代表女生，1 代表男生
表格內數字分別為標準化迴歸係數（標準差）〔95%信賴區間〕。
信賴區間若沒有涵蓋 0，則表示係數（或是直接、間接效果）顯著，以粗體表示

圖 3

性別做為父母衝突與子女人際效能的調節變項



肆、討論與建議

從生命歷程理論 (life course theory) 的觀點，青少年時期的社會關係網絡的發展在其個人的生命歷程中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Shanahan, 2000)。家庭與學校是現代青少年生活的兩大主軸，因此在家裡與家人的相處，在學校師長和同學的互動，對於各種心理、情緒與行為適應有著深遠的影響。本研究以「人際環狀模型」運作提出父母衝突可能導致子女的三種人際問題：懷恨報復、冷漠無情、社交退縮，討論「認知—情境架構」、「情緒安全感假說」和「社會認知理論」等各相關理論提出的影響機制，威脅感受和 interpersonal effectiveness 分別是各理論的精髓。本研究同時考慮威脅感受和 interpersonal effectiveness 的中介效果，再考量性別差異在青少年時期的關鍵影響。應用 PROCESS 分析模組以平行中介模式和調節式中介模式去檢驗父母衝突、青少年子女威脅感受、interpersonal effectiveness、人際問題（懷恨報復、冷漠無情、社交退縮三種）與其性別等概念的關聯。以下分為三部分針對主要結果進行討論。

一、父母衝突與青少年的人際問題（懷恨報復、冷漠無情、社交退縮）存在顯著正相關

在學校的生活中，青少年渴望被同儕接納、喜愛、並被認同為一份子；然而通常人際關係通常不如學業成就般受到重視，培養人際溝通能力亦鮮少被持續關注，甚至有人際關係困擾的青少年也欠缺足夠的資源和機會獲得專業的協助。人際環狀模型由支配和順從、友善和敵意等獨立兩軸所定義出來的人際互動模式行為和問題，提供相對全面、系統地概括了一般的人際問題，常應用於臨床諮商情境。本研究首要的研究目的是以人際環狀模式，更細緻地去了解青少年的人際問題，因受父母衝突影響，以人際互動的互補原則(Orford, 1986)，特別關注子女懷恨報復、社交退縮、冷漠無情三種人際問題。也由迴歸分析結果得到支持。父母衝突引起青少年人際問題，也分別與過去研究關心子女的內化與外化情緒和行為問題相對應(Davies et al., 2015)。特別是許多研究指出童年和青少年所面臨父母衝突的影響延續到成年期，特別是人際關係(Cui et al., 2010; Hare et al., 2009; Heinze et al., 2020; Kim et al., 2009)。代間傳遞是父母與子女兩代的人際關係之關連性的一種途徑(Ehrensaft et al., 2011)。而本研究的觀點是青少年因父母衝突產生其人際互動上的困境，成為其人際關係品質無法提昇的原因。父母衝突對於子女的人際問題有直接的作用，特別是容易產生攻擊和憤怒的人際互動，男生和女生都有，可以呼應過去研究：攻擊性行為透過模仿父母衝突的社會學習過程而展現在子女的人際關係上(Kim et al., 2009)。

二、青少年的威脅感受和人際效能和父母衝突與其人際問題之間扮演中介角色

除了直接影響之外，相關文獻也提供父母衝突透過子女情緒和認知運作歷程而影響其人際能力的證據(Lucas-Thompson et al., 2017)。本研究進一步考量相關理論如「認知——情境架構」、「情緒安全感假說」和「社會認知理論」等所提出可能的影響機制，本研究檢驗了子女威脅感受和人際效能的中介歷程。本結果顯示不同人際問題可能透過不同機制影響。攻擊性的人際問題很容易經驗到及表現生氣與憤怒，對人的不信任和猜忌。壓抑的人際問題總是無法表現真實的自己，以勉強裝出來的自己去與別人相處，心理跟生理都會一直處於太過緊繃的緊張狀態。本研究顯示子女這兩類人際問題可能來自於因其父母

衝突所引起的威脅感受。而退縮的人際問題是在人際互動中感到焦慮、羞怯及困窘的，很難主動地與人社交、加入團體，而有孤立感受，雖然不是因威脅感而導致子女的人際退縮傾向，但由人際效能低落可以解釋。

目前僅少數研究同時比對來自不同理論的影響機制。例如國內學者徐麗瑜與許文耀（2009）綜合兒童的情緒種類、情緒強度、以及對不同內容衝突的情緒反應，依其實徵結果提出情緒安全感假說比社會認知論更能描述兒童面對父母衝突的立即情緒反應。而本研究同時比較威脅感受和人際效能兩種可能的機制。結果支持威脅感受的影響對青少男女都很強烈，因父母衝突威脅感受愈強時，可能產生更多的人際問題如攻擊或壓抑，顯示在青少年階段，情緒安全感仍是子女在家庭生活福祉的關鍵（Cummings & Miller-Graff, 2015; Davies et al., 2012）。

三、性別對父母衝突與青少年人際效能之間的關係有調節作用

綜合描述統計分析、平行中介、調節式中介模式結果顯示：女生感知到的父母衝突嚴重度及威脅評估高於男生，這可能指出女生在面對家庭衝突時更為敏感，這對她們的情緒及行為反應可能有較大影響。雖然男女生在人際效能上沒有顯著差異，表示他們對自己人際能力都持有信心，但男生較女生更多社交退縮的困擾，這可能與男生較少表達情感和尋求社會支持的傾向有關。這些結果暗示性別差異在親子關係和人際互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未來的干預和支持計劃應考慮到這些差異。激烈的父母衝突直接造成青少年人際問題外，也會透過威脅感受的中介效果促進青少年男女懷恨報復和冷漠無情的人際問題，男生還會因為父母衝突減損其人際效能導致懷恨報復、社交退縮、冷漠無情三種人際問題。

因青少年認知能力和自主需求的發展，我們的研究也顯示認知評估對青少年的影響力，特別是人際效能的評估。而且性別差異發生於人際效能信念上。雖然本研究的男生和女生人際效能信念的平均分數沒有差異，女生的人際效能信念不受父母衝突影響，但是對於男生來說，父母衝突高低確實會影響到人際效能信念。這個結果呈現父母衝突對於兒子和女兒的影響歷程並不相同，是值得後續研究進一步澄清的性別議題。

伍、研究貢獻與建議

面臨價值觀急劇變遷與多元化的當代社會，人際互動產生質與量的複雜變化。青少年要面對比過往紛繁的關係網絡和互動管道，想要維繫良好的人際關係並不容易。依據 Bandura (1982) 的想法，個體的效能信念會影響其思考模式、行動和動機，在面臨壓力情境、遭遇困難、面對失敗時，是處理危機或問題的重要心理機制。本研究結果提供相關的證據：青少年的人際效能信念可以減少人際關係問題。另一方面，我們的結果支持青少年人際效能的基礎來自於父母的溫暖和關愛，同時，人際效能也會因父母衝突而受挫。家庭，是人生第一個學習社交及人際關係的場域。子女視他們的父母為主要的學習榜樣，透過父母的示範與引導，小孩逐漸發展出他們的自我概念與思考模式，而我們的結果顯示子女的人際效能信念來自父母的直接對待，也受到父母關係的間接影響。

近十多年來家庭心理學者已注意到，除了直接的家庭暴力，家庭中的壓力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來自父母之間的長期衝突，因此把子女的問題回溯到父母身上時，已不僅是父母的教養行為可以充分解釋的 (Kaczynski et al., 2006; Noller & Callan, 2016)，就本研究結果顯示：嚴重的父母衝突也是造成子女人際關係問題的原因之一，若要協助子女處理其人際困難時，不能忽視父母衝突所造成家庭或子女的壓力 (Davies et al., 2018)。華人文化重視家庭與婚姻關係的完整性，在這樣的集體與文化規範下，能否做為青少年受家庭衝突影響的保護性因子？例如其他家人能否提供支持、引導和模範，做為緩解父母衝突對子女的負面影響。又或者反而是另一種壓力的形成。還有其他重要的文化價值，例如重視和諧的價值，對於家庭壓力事件的影響機制也有不同面向 (Li et al., 2016)。在家庭找出可能做青少年發展韌性的因素是重要的 (Fergus & Zimmerman, 2005)。

陸、研究限制

除上述提及本研究研究的重要性與接續研究可以著力之處，本研究有幾項限制是必須注意的。首先，本研究樣本來自大台北地區的國中生資料，家長教育程度偏高，研究結果的推論須先保守限制在於城市中產階級家庭，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檢驗城鄉差異、家庭社經背景的影響。再來，由於社會變遷，家庭結構受到衝擊，產生多元家庭型態；非主流型態之家庭，雖然家庭結構有所差異，各有其困境與優勢，我們認為家人關係與品質才是個體與家庭福祉的基礎。而這些異性父母衝突的相關研究能否延伸到子女與其他家庭型態之主要照顧者等也需要進一步檢驗。第三，本研究利用橫斷式的相關資料進行影響歷程的推論，有待長期追蹤資料重複檢驗，獲得有時序性的關聯資料，更能釐清其間因果關係，呈現動態變化的歷程（Davies et al., 2018; El-Sheikh et al., 2019; Fosco et al., 2016）。最後，本研究尚有其他力有未逮之處。本研究設計基於多個理論觀點，但未涵蓋這些理論中的所有多樣觀點。例如，社會認知理論的交互決定論提出了個體、行為和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概念，而此研究主要集中於個體與環境的互動，並未深入探討個體行為對環境的反作用力。同樣地，情緒安全感理論中的安全感概念在本研究以威脅感受為指標，還有其他指標可用於全面衡量安全感。關於人際環狀模型應用於父母衝突與子女適應的影響歷程，本研究雖然考慮了一些人際互動模式，但對等性和相互作用歷程的驗證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同時友善支配和友善順服的影響未得到充分探討，以及子女「侵犯(intrusive/needy)」、「自我犧牲 (self-sacrificing)」、「過度配合(overly accommodating)」等適應不良的人際問題亦是值得再深入探討的議題。這些缺口是後續研究得以開展的方向。

參考文獻

方紫薇（2003）。青少年所知覺之父母衝突及其因應。*教育心理學報*，35，79-97。

<https://doi.org/10.6251/BEP.20030326>

- 朱瑞玲（1989）。親子關係：子女的知覺與解釋及其影響。見伊慶春、朱瑞玲（主編），*台灣社會現象的分析：家庭、人口、政策與階層*，頁 181-246。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李錦虹（1997）。案主意圖與互補因素對治療關係形成的影響（未出版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 吳英璋（1993）。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心理病理長期追蹤研究（一）（NSC82-0301-H002-026）。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兒童福利聯盟（2018）。你的煩惱不是我的煩惱?!2018 兒少煩惱與家長教養態度分析報告發表記者會。https://www.children.org.tw/news/advocacy_detail/2047
- 洪佳琳、劉同雪（2013）。以壓力生成模式與素質壓力模式探討大學生之人際行為、人際困擾與憂鬱症狀。*輔仁醫學期刊*，11，85-99。
- 徐儷瑜（2012）。親職行為在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問題之間的關係探討。*中華心理學刊*，54(2)，149-167。<https://doi.org/10.6129/CJP.2012.5402.02>
- 徐儷瑜、許文耀（2009）。從情緒與認知反應探討父母衝突對兒童適應的影響。*中華心理學刊*，51，483-500。<https://doi.org/10.6129/CJP.2009.5104.06>
- 黃惠如（2008）。青少年身心健康與親子關係大調查。*康健雜誌*，113。
- 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中心（2018）。臺灣六都國、高中職學生對校園心理健康資源的應用及憂鬱情緒現況調查。
<http://www.etmh.org/CustomPage/HtmlEditorPage.aspx?MId=1346&ML=3>
- 蔡順良（2008）。青少年多向度自我效能量表編製與驗證。*教育心理學報*，39，105-126。
- 瞿海源（2015）。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1996 第三期第二次：家庭組（限制版）（R090015）。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https://doi.org/10.6141/TW-SRDA-R090015-1>
- Akyunus, M., & Gencoz, T. (2016).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Inventory of Interpersonal Problems Circumplex Scales short form: A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tudy. *Düşünen Adam: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Neurological Sciences*, 29(1), 36-48.
<https://doi.org/10.5350/DAJPN2016290104>
- Alden, L. E., Wiggins, J. S., & Pincus, A. L. (1990). Construction of circumplex scales for the Inventory of Interpersonal Proble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5, 521-536.
<https://doi.org/10.1080/00223891.1990.9674088>

- Atkinson, E. R., Dadds, M. R., Chipuer, H., & Dawe, S. (2009). Threat is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exploring the role of children's threat appraisal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7(2), 281–292.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08-9275-z>
- Bandura, A. (1982). Self-efficacy mechanism in human agen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2), 122–147.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37.2.122>
- Bandura, A. (2021). Analysis of modeling processes. In A. Bandura (Ed.), *Psychological modeling: Conflicting theories: Classic edition* (pp. 1–62).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 <https://doi.org/10.4324/9781003110156-1>
- Benson, M. J., Buehler, C., & Gerard, J. M. (2008). Interparental hostility and early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Spillover via maternal acceptance, harshness, inconsistency, and intrusiveness.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28(3), 428–454. <https://doi.org/10.1177/0272431608316602>
- Bergman, K. N., Cummings, E. M., & Davies, P. T. (2014). Interparental aggression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The role of emotional insecurity and adrenocortical activity.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9, 763–771. <http://dx.doi.org/10.1007/s10896-014-9632-3>
- Black K. A. (2000).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s' behavior during conflict resolution tasks with best friends. *Adolescence*, 35(139), 499–512.
- Block, J. H., Block, J., & Morrison, A. (1981). Parental agreement–disagreement on child-rearing orientations and gender-related personality correlates in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52(3), 965–974. <https://doi.org/10.2307/1129101>
- Boudreaux, M. J., Ozer, D. J., Oltmanns, T. F., & Wright, A. G. C. (201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ircumplex Scales of Interpersonal Problem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30(5), 594–609. <https://doi.org/10.1037/pas0000505>
- Buehler, C., Lange, G., & Franck, K. L. (2007). Adolescents'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to marital hostility. *Child development*, 78(3), 775–789.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07.01032.x>
- Buehler, C., & Welsh, D. P. (2009). A process model of adolescents' triangulation into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 The role of emotional reactivit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3, 167–180. <http://doi.org/10.1037/a0014976>
- Carson, R. (1969). *Interaction concepts of personality*. Chicago: Aldine.

- Choe, D. E., & Zimmerman, M. A. (2014). Transactional process of Afr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family conflict and violent behavior.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4(4), 591–597. <https://doi.org/10.1111/jora.12056>
- Cohen, J., Cohen, P., West, S. G., & Aiken, L. S. (2003). *Applied multiple regression/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rd ed.).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Coleman, P. K. (2003). Perceptions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Peer Relationships in Middle Childhood.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12(4), 351–368. <https://doi.org/10.1002/icd.316>
- Connolly, J. (1989). Social self-efficacy in adolescence; Relations with self-concept, social adjustment, and mental health.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r Science Review*, 21, 258–269. <https://doi.org/10.1037/h0079809>
- Compas, B. E. (1987). Coping with stress dur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1(3), 393–403.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01.3.393>
- Cui, M., Conger, R. D., & Lorenz, F. O. (2005). Predicting change in adolescent adjustment from change in marital problem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1(5), 812–823.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41.5.812>
- Cui, M., Durtschi, J. A., Donnellan, M. B., Lorenz, F. O., & Conger, R. D. (2010).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elationship aggression: 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4, 688–697. <https://doi.org/10.1037/a0021675>
- Cui, M., & Fincham, F.D. (2010).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arental divorce and marital conflict on young adult romantic relationship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7, 331–343. <https://doi.org/10.1111/j.1475-6811.2010.01279.x>
- Cummings, E. M., Cheung, R. Y., Koss, K., & Davies, P. T. (2014). Parental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a prospective test of an explanatory model for the role of marital conflict.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2(7), 1153–1166.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14-9860-2>
- Cummings, E. M., Davies, P. T., & Simpson, K. S. (1994).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ren's appraisals and coping efficacy as mediators of child adjustmen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8, 141–149. <https://doi.org/10.1037/0893-3200.8.2.141>
- Cummings, E., Koss, K., & Davies, P. (2015). Prospective relations between family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maladjustment: Security in the family system as a mediating process. *Journal of*

-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3(3), 503-515.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14-9926-1>
- Cummings, E. M., & Miller-Graff, L. E. (2015). Emotional security theory: An emerging theoretical model for youths'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across multiple developmental context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3), 208-213.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14561510>
- Davies, P. T., Coe, J. L., Martin, M. J., Sturge-Apple, M. L., & Cummings, E. M. (2015). The developmental costs and benefits of children's involvement i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1(8), 1026-1047. <https://doi.org/10.1037/dev0000024>
- Davies, P. T., & Cummings, E. M. (1994).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An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6(3), 387-411.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16.3.387>
- Davies, P. T., & Lindsay, L. L. (2004).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Why does gender moderate early adolescent vulnerabilit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8(1), 160. <https://doi.org/10.1037/0893-3200.18.1.160>
- Davies, P. T., Martin, M. J., & Cicchetti, D. (2012). Delineating the sequelae of destructive and constructive interparental conflict for children within an evolutionary framework.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8(4), 939-955. <https://doi.org/10.1037/a0025899>
- Davies, P. T., Martin, M. J., & Cummings, E. M. (2018).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children's social problems: Insecurity and friendship affiliation as cascading mediato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4(1), 83-97. <https://doi.org/10.1037/dev0000410>
- Ehrensaft, M. K., Knous-Westfall, H. M., & Cohen, P. (2011). Direct and indirect transmission of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across generation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5, 942-952. <https://doi.org/10.1037/a0025606>
- El-Sheikh, M., Shimizu, M., Erath, S. A., Philbrook, L. E., & Hinnant, J. B. (2019). Dynamic patterns of marital conflict: Relations to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 adjust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5(8), 1720-1732. <https://doi.org/10.1037/dev0000746>
- Erel, O. & Burman, B. (1995). Interrelatedness of marital relation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8, 108-132.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18.1.108>
- Feldman, R., & Masalha, S. (2010). Parent-child and triadic antecedents of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Cultural specificity, shared proces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6(2), 455-467.

<https://doi.org/10.1037/a0017415>

- Fergus, S., & Zimmerman, M. A. (2005). Adolescent resilience: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healthy development in the face of risk.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26*, 399–419.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ublhealth.26.021304.144357>
- Finger, B., Eiden, R. D., Edwards, E. P., Leonard, K. E., & Kachadourian, L. (2010). Marital aggression and child peer competence: A comparison of three conceptual model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7*(3), 357–376. <https://doi.org/10.1111/j.1475-6811.2010.01284.x>
- Flook, L. (2011).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s' daily interpersonal events and well-Being. *Child Development, 82*(2), 454–461.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10.01521.x>
- Fosco, G. M., & Feinberg, M. E. (2015). Cascading effects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in adolescence: Linking threat appraisals, self-efficacy, and adjustment.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7*(1), 239–252.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14000704>
- Fosco, G. M., & Grych, J. H. (2008). Emotional, cognitive, and family systems mediators of children's adjustment to interparental conflic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2*(6), 843–854. <https://doi.org/10.1037/a0013809>
- Fosco, G. M., Lippold, M., & Feinberg, M. E. (2014). Interparental boundary problems, parent–adolescent hostility, and adolescent–parent hostility: A family process model for adolescent aggression problems. *Couple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3*(3), 141–155. <https://doi.org/10.1037/cfp0000025>
- Fosco, G. M., Van Ryzin, M. J., Xia, M., & Feinberg, M. E. (2016).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 hostile-aggressive behavior and family climate: Longitudinal implications for young adult romantic relationship compet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2*(7), 1139–1150. <https://doi.org/10.1037/dev0000135>
- Ge, X., Lorenz, F. O., Conger, R. D., Elder, G. H., & Simons, R. L. (1994). Trajectories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adolesc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0*(4), 467–483.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30.4.467>
- Gerard, J. M., Krishnakumar, A., & Buehler, C. (2006). Marital conflict, parent-child Relations, and youth maladjustment: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spillover effect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7*(7), 951–975.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X05286020>
- Goeke-Morey, M. C., Papp, L. M., & Cummings, E. M. (2013). Changes in marital conflict and youths' responses across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 test of sensitization. *Development and*

- Psychopathology*, 25(1), 241-251.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12000995>
- Grych, J. H. (1998). Children's appraisals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ituational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2(3), 437-453.
<https://doi.org/10.1037/0893-3200.12.3.437>
- Grych, J. H., & Cardoza-Fernandes, S. (2001).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on children: The role of social cognitive processes. In J. H. Grych & F. D. Fincham (Eds.),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child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pp. 157-18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527838.008>
- Grych, J. H., & Fincham, F. D. (1990).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2), 267-290.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08.2.267>
- Grych, J. H., & Fincham, F. D. (1993). Children's appraisals of marital conflict: Initi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Child Development*, 64(1), 215-230.
<https://doi.org/10.2307/1131447>
- Grych, J. H., Seid, M., & Fincham, F. D. (1992). Assessing marital conflict from the child's perspective: The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Child Development*, 63(3), 558-572. <https://doi.org/10.2307/1131346>
- Gurtman, M. B. (2009). Exploring personality with the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3(4), 601-619.
<https://doi.org/10.1111/j.1751-9004.2009.00172.x>
- Hankin, B. L., Mermelstein, R., & Roesch, L. (2007). Sex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depression: Stress exposure and reactivity models. *Child Development*, 78, 279-295.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07.00997.x>
- Hare, A. L., Miga, E. M., & Allen, J. P. (2009).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ggression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ttachment securit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3, 808-818. <https://doi.org/10.1037/a0016740>
- Harold, G. T., & Sellers, R. (2018). Annual research review: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youth psychopathology: An evidence review and practice focused update.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9(4), 374-402. <https://doi.org/10.1111/jcpp.12893>
- Hayes, A. F. (2017).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2 ed).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Heinze, J. E., Hsieh, H., Aiyer, S. M., Buu, A., & Zimmerman, M. A. (2020). Adolescent family conflict as a predictor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emerging adulthood. *Family Relations*, 69(5), 996–1011. <https://doi.org/10.1111/fare.12493>
- Horney, K. (1945). *Our inner conflicts; a constructive theory of neurosis*. W W Norton & Co.
- Horowitz, L. M., Rosenberg, S. E., Baer, B. A., Ureño, G., & Villaseñor, V. S. (1988). Inventory of interpersonal problems: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6(6), 885–892. <https://doi.org/10.1037/0022-006X.56.6.885>
- Hosokawa, R. & Katsura, T. (2019) Exposure to marital conflict: Gender differences in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among children. *PLoS ONE* 14(9): e022202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2021>
- Hughes, J., & Barkham, M. (2005). Scoping the inventory of interpersonal problems, its derivatives and short forms: 1988–2004. *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y & Practice*, 12(6), 475–496. <https://doi.org/10.1002/cpp.466>
- Innes, J. M., & Thomas, C. (1989). Attributional style,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avoidance and inhibition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7), 757–762. [https://doi.org/10.1016/0191-8869\(89\)90122-0](https://doi.org/10.1016/0191-8869(89)90122-0)
- Kaczynski, K. J., Lindahl, K. M., Malik, N. M., & Laurenceau, J. P. (2006). Marital conflict, maternal and paternal parenting, and child adjustment: a test of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 JFP : Journal of the Division of Family Psychology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Division 43)*, 20(2), 199–208. <https://doi.org/10.1037/0893-3200.20.2.199>
- Karakuş, C. & Göncü-Köse, A. (2023). Relationships of domestic violence with bullying, silencing-the-self, resilience, and self-efficacy: Moderating roles of stress-coping strategies. *Current Psychology*, 42, 13913–13926.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22-02726-7>
- Katz, L. F., & Gottman, J. M. (1993). Patterns of marital conflict predict children'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9, 940–950.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29.6.940>
- Kerig, P. K., Schulz, M. S., & Hauser, S. T. (Eds.). (2012). *Adolescence and beyond: Family processes and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736546.001.0001>

- Kiesler, D. J. (1983). The 1982 Interpersonal Circle: A taxonomy for complementarity in human transactions. *Psychological Review*, 90(3), 185–214.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90.3.185>
- Kim, H. K., Pears, K. C., Capaldi, D. M., & Owen, L. D. (2009). Emotion dysregulation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 conflic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3, 585–595. <https://doi.org/10.1037/a0015935>
- Laursen, B. & DeLay, D. (2011).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Encyclopedia of adolescence* (Vol. 2, pp. 233-240). Elsevier Inc. <https://doi.org/10.1016/B978-0-12-373951-3.00075-2>
- Leary, T. (1957). *Interpersonal diagnosis of personality: A function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for personality evaluat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 Li, Y., Cheung, R. Y. M., & Cummings, E. M. (2016). Marital conflict and emotional insecurity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Cultural value moder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6(2), 316–333. <https://doi.org/10.1111/jora.12193>
- Li, S., Ma, X., & Zhang, Y. (2023).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ggression: A meta-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of children and youth. *Current Psychology*, 1-16.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22-04219-z>
- Locke, K. D., & Sadler, P. (2007). Self-efficacy, values, and complementarity in dyadic interactions: Integrating interpersonal and social-cognitive theor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 94-109.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6293375>
- Lucas-Thompson, R. G., Lunkenheimer, E. S., & Dumitrache, A. (2017). Associations between mari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conflict appraisals, stress physiology, and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46(3), 379–393.
<https://doi.org/10.1080/15374416.2015.1046179>
- MacKinnon, D. P., Lockwood, C. M., Hoffman, J. M., West, S. G., & Sheets, V. (2002). A comparison of methods to test mediation and other intervening variable effects. *Psychological Methods*, 7(1), 83–104. <https://doi.org/10.1037/1082-989X.7.1.83>
- Mann, B. J., & Gilliom, L. A. (2004). Emotional security and cognitive appraisal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 and adjustment in older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65(3), 250–271. <https://doi.org/10.3200/GNTP.165.3.250-271>
- Markey, P. M., Funder, D. C., & Ozer, D. J. (2003). Complementarity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s in dyadic interac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9), 1082-1090.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3253474>

- Martin, M. J., Bascoe, S. M., & Davies, P. T. (2011). Family relations. In B. B. Brown & M. Printstein (Eds.), *Encyclopedia of adolescence* (Vol. 2, pp. 84–94). Maryland Heights, MO: Elsevier. 10.1016/B978-0-12-373951-3.00053-3
- Matsushima, R., & Shiomi, K. (2003).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interpersonal stress in adolescence.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1(4), 323–332.
<https://doi.org/10.2224/sbp.2003.31.4.323>
- McCauley, D. M., Weymouth, B. B., Feinberg, M. E., & Fosco, G. M. (2019). Evaluating school and peer protective factors in the effects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on adolescent threat appraisals and self-efficacy. *Journal of Adolescence*, 71, 28–37.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18.12.005>
- McCrae, R. R., & Costa, P. T., Jr. (1989). The structure of interpersonal traits: Wiggins's circumplex and the five-factor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586–595.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6.4.586>
- Monsen, J. T., Hagtvet, K. A., Havik, O. E., & Eilertsen, D. E. (2006). Circumplex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 correlates of the Interpersonal Problems Model (IIP-C): Construct validity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8(2), 165–173.
<https://doi.org/10.1037/1040-3590.18.2.165>
- Murphy, C. M. & Blumenthal, D. R. (2000). The mediating influence of interpersonal problems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elationship aggressi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7, 203–218. <https://doi.org/10.1111/j.1475-6811.2000.tb00012.x>
- Narayan, A. J., Englund, M. M., & Egeland, B. (2013). Developmental timing and continuity of exposure to interparental violence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as prospective predictors of dating violence.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5(4), 973–990.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1300031X>
- Noller, P., & Callan, V. J. (2016). *The adolescent in the family*. Routledge.
- Orford, J. (1986). The rules of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Does hostility beget hostility and dominance, submiss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3(3), 365–377.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93.3.365>
- Park, S.-Y., Lee, J., & Cheah, C. S. L. (2021).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perceived parental control and warmth on self-esteem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sian American youth. *Children*

-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26, Article 105999.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21.105999>
- Preacher, K. J., & Hayes, A. F. (2008).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0(3), 879–891. <https://doi.org/10.3758/BRM.40.3.879>
- Reed-Fitzke, K. (2020). The Role of Self-Concepts in Emerging Adult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search Synthesis.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27, 36–48.
<https://doi.org/10.1007/s10804-018-09324-7>
- Rhoades, K.A. (2008). Children's Responses to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 Meta-Analysis of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Child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79(6), 1942–1956.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08.01235.x>
- Rose, A. J., & Rudolph, K. D. (2006). A review of sex differences in peer relationship processes: potential trade-offs for th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evelopment of girls and boy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2(1), 98–131.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32.1.98>
- Rose, A. J., Smith, R. L., Glick, G. C., & Schwartz-Mette, R. A. (2016). Girls' and boys' problem talk: Implications for emotional closeness in friendship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2(4), 629–639. <https://doi.org/10.1037/dev0000096>
- Rudolph, K. D. (2002).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responses to interpersonal stress during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30(4, Suppl), 3–13.
[https://doi.org/10.1016/S1054-139X\(01\)00383-4](https://doi.org/10.1016/S1054-139X(01)00383-4)
- Shanahan, M. J. (2000). Pathways to adulthood in changing societies: Variability and mechanisms in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1), 667–692.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26.1.667>
- Shih, J. H., Eberhart, N. K., Hammen, C. L., & Brennan, P. A. (2006). Differential exposure and reactivity to interpersonal stress predict sex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depression.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35, 103–115.
https://doi.org/10.1207/s15374424jccp3501_9
- Siffert, A., Schwarz, B., & Stutz, M. (2012). Marital conflict and early adolescents' self-evaluation: the role of parenting quality and early adolescents' appraisal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1(6), 749–763.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1-9703-1>
- Snyder, J. (1998).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What About Gender? *Developmental*

- Review*, 18(3), 390–420. <https://doi.org/10.1006/drev.1998.0469>
- Soldz, S., Budman, S., Demby, A., & Merry, J. (1995). A short form of the inventory of interpersonal problems circumplex scales. *Assessment*, 2(1), 53–63.
<https://doi.org/10.1177/1073191195002001006>
- Stocker, C.M., & Youngblade, L. (1999). Marital conflict and parental hostility: Links with children's sibling and peer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3, 598.
<https://doi.org/10.1037/0893-3200.13.4.598>
- Straus, M. A. (1979). Measuring intrafamily conflict and violence: The Conflict Tactics (CT) Sca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1(1), 75–88. <https://doi.org/10.2307/351733>
- Su, X., Simons, R. L., & Simons, L. G. (2011). Interparental aggress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among African American youth: A simultaneous test of competing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0(11), 1489–1502.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1-9673-3>
- Sullivan, H. S. (1953).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W W Norton & Co.
- Tracey, T. J. G., Ryan, J. M., & Jaschik-Herman, B. (2001). Complementarity of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trai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7(7), 786–797.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1277002>
- van Eldik, W. M., de Haan, A. D., Parry, L. Q., Davies, P. T., Luijk, M. P. C. M., Arends, L. R., & Prinzie, P. (2020). The interparental relationship: Meta-analytic associations with children's maladjustment and responses to interparental conflic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6(7), 553–594. <https://doi.org/10.1037/bul0000233>
- Vuchinich, S., Emery, R. E., & Cassidy, J. (1988). Family members and third parties in dyadic family conflict: Strategies, alliances, and outcomes. *Child Development*, 59(5), 1293–1302.
<https://doi.org/10.2307/1130492>
- Werner, E. E. (1989). High-risk children in young adulthood: A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birth to 32 year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9(1), 72–81.
<https://doi.org/10.1111/j.1939-0025.1989.tb01636.x>
- Wiggins, J. S. (1979). A psychological taxonomy of trait-descriptive terms: The interpersonal doma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3), 395–41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37.3.395>
- Wiggins, J. S., Phillips, N., & Trapnell, P. (1989). Circular reasoning about interpersonal behavior: Evidence concerning some untested assumptions underlying diagnostic class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2), 296–305.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6.2.296>

Wolfinger, N.H. (2000). Beyo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ivorce: Do people replicate the patterns of marital instability they grew up with?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1, 1061–1086.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00021008006>

Wu, L. Z., Roche, M. J., Dowgwillo, E. A., Wang, S., & Pincus, A. L. (2015).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Inventory of Interpersonal Problems–Short Circumplex.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97(2), 153–162. <https://doi.org/10.1080/00223891.2014.971461>

Zarrett, N., & Eccles, J. S. (2006). The passage to adulthood: Challenges of late adolescence. In S. Piha & G. Hall (Eds.),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pp. 13–28). <https://doi.org/10.1002/yd.179>

Zaslow, M. J. (1989). Sex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response to parental divorce: 2. Samples, variables, ages, and source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9(1), 118–141. <https://doi.org/10.1111/j.1939-0025.1989.tb01640.x>

Zimmermann, J., & Wright, A. G. C. (2017). Beyond description in interpersonal construct validation: Methodological advances in the circumplex structural summary approach. *Assessment*, 24, 3–23. <https://doi.org/10.1177/1073191115621795>

Zimet, J. (2001). Influences of marital conflict on child adjustment: Review of theory and research.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4(4), 319–335. <https://doi.org/10.1023/A:1013595304718>

Influence of Parental Conflict on Adolescents'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pplying the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Model

Rong-Kou Liu¹

Abstract

Building upon the considerable existing research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conflict on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childre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terpersonal problems that adolescents may experience due to such conflict.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employs the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model to examine three distinct types of interpersonal issues, namely, vindictive, cold/distant, and socially avoidant behaviors. Moreover,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increased perceptions of threat and diminished interpersonal efficacy, which are induced by parental discord, in exacerbating these interpersonal issues in adolescents. Furthermore, it consider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child's gender in these dynamics. The study sample comprises 599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eight school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y. The sample has a mean age of 14.3 years and 52.6% of the sample is female. The analytical procedures include the PROCESS analytic module, which is used to examine the parallel mediation and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 of frequent and intense parental conflict on adolescent interpersonal difficulties, vindictive and cold/distant interpersonal issues in adolescents are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perceived threat that stems from parental conflict. Boys, in particular, exhibit increased problems across all three dimensions of interpersonal issues due to decreased interpersonal efficacy resulting from

¹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o Guang University.

parental conflict. This study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nd its limitations.

Keywords: adolescent interpersonal problems,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model, interpersonal efficacy,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parental conflict, perceived threat

收稿日期：2023 年 08 月 04 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1 月 29 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4 月 11 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5 月 07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4 年 05 月 08 日

社區與家庭之高齡者的未來： 由代間視角分析

林如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

余佳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家庭研究與發展中心

陳怡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

壹、前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於民國 113 年 10 月 5 日舉行「2024 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家庭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湯玲玲博士（Dr. Thang Leng Leng）進行專題演講。湯博士是一位社會文化人類學家，任職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日本研究系副教授，並擔任系主任長達 12 年，目前仍為副主任。湯玲玲博士在高齡化、代間關係、家庭和移民等研究領域發表了眾多的論文。目前參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國立大學衛生系統以及住宅發展委員會的長期合作計畫，擔任新加坡皇后鎮衛生區計畫——「the Purposeful Longevity Workstream」之共同主持人。湯博士長期致力於促進代間聯繫，並透過社區建設推動長者賦權。除了學術成就外，湯玲玲博士積極參與學術社群及社區服務，擔任新加坡老年學會（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Singapore）主席、飛躍社區服務（Fei Yue Community Services）主席以及長老會社區服務（Presbyterian Community Services）副主席，前述的參與都使她更瞭解當地社區的需求，進而為研究提供資訊。

湯博士的研究聚焦關注亞洲，與臺灣的學術界亦有長久的合作友誼，例如：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家庭研究與發展中心主任林如萍教授合作，針對年輕

*本篇通訊作者：林如萍，通訊方式：t10016@ntnu.edu.tw。

世代探討與老年父母的代間支持，由亞洲的家族主義、孝道文化規範與性別議題切入，進行新加坡、臺灣及日本的跨國比較研究，並於 2019 年的「國際老年學暨老年醫學——亞太區域會議」(IAGG Asia / Oceania Regional Congress) 中，發表論文 *Attitudes of female student towards the support for older par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 Singapore and Taiwan*。此次演講湯博士以「代間視角」(Intergenerational Lens)，針對社區與家庭之高齡者的未來，提出她的近年研究發現以及實務推廣、政策等相關建議。

貳、專題演講內容

湯玲玲博士的演講，首先由亞洲人口結構實況切入，分析高齡趨勢的變遷，並提出：面對高齡社會的憂慮及願景。繼之，提出「代間視角」(the Intergenerational Lens)，強調以世代連結 (Connection) 觀點進行探究的策略及重要性。最後他由「社區」及「家庭」的代間互動及祖父母角色，分享研究及實務推動的經驗及成果，以下是專題演講的重點摘述。

一、亞洲高齡趨勢及挑戰

由亞洲的人口老化、出生及平均餘命等資料，可以發現：高齡趨勢及人口結構變遷及對亞洲的臺灣、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等國將帶來極大的挑戰。就聯合國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提出的報告 (McCormick, Mandryk, & Saldiba, 2023) 指出「人口老化」趨勢的特徵如下：

- 史無前例：歷史上絕無僅有，老化速度將越來越快；
- 普遍存在：影響每個人的全球現象，無論是成人或兒童；
- 意義深遠：在各方面都有重大影響；
- 持續：一個個世代，一去不復返；

聯合國呼籲：在人口老化的趨勢中，主要的關注及挑戰包括了「年齡歧視、孤獨及失智症」。

二、「代間視角」(the Intergenerational Lens) 的定義及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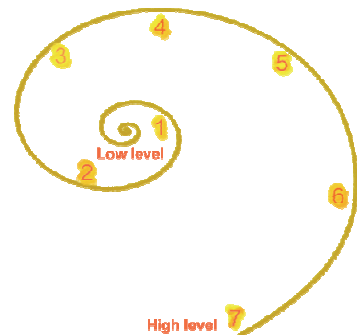
以 Marc Freedman 所寫的書「How to Live Forever: The Enduring Power of Connecting the Generations」，來思考：隨著高齡趨勢，人們將體驗「多世代」(Multigeneration) 的到來，並須在兩條進路中做出選擇：「缺乏、衝突和孤獨」(Scarcity, Conflict and Loneliness) 或是「豐富、相互依存和連結」(Abundance, Interdependence and Connection)。而什麼是「代間」(Intergenerational)？可將「inter」視為「between」，意味著：世代之間發生的事情，如：任何兩代或更多代之間分享技能、知識、專業，或是連結老年世代和年輕世代的訊息。由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論」來看，人類發展的第七階段「傳承創新」(Generativity) 的概念，被定義為「對建立和指導下一代的關注」(Erikson, 1963:267)，此一觀點假設老年人在生命的後期，會致力於貢獻或傳遞對年輕一代有正面影響或有幫助的事物，在最後階段實現「自我統整」，帶著成就感、滿足感和接受感回顧自己的生活，產生正面的「自我榮耀」或「生命統整感」。由前述的人生發展任務觀點出發，代間連結將有助於解決年齡歧視和社會孤立的問題。

三、代間方案的定義與社區推動策略

(一) 代間方案的定義

依據 Beth Johnson Foundation (2011, p.4) 對於「代間方案」(Intergenerational Programs and Practices) 的定義：「立基於年輕人和老年人及周圍的資源，以有目的、互惠的活動將人們聚集在一起，促進不同世代之間的理解和尊重，並有助於建立更具凝聚力的社區」。由 Kaplan 發展的「參與度連續性量表」來看，可以有不同參與程度的「代間方案」設計：

1. 向其他年齡層的人學習
2. 看到其他年齡層的人，但彼此有距離
3. 不同年齡世代彼此相遇
4. 年度／定期活動



5.示範／試點項目

6.進行代間計劃

7.創造代間社區環境

（二）社區、學校推動代間方案的策略

在新加坡的國宅社區，運用鄰里的公共空間設計，從「空間」到具有關係意義的「場所」之轉變，達成：透過創造和維持空間以提供世代互動的機會，建構充滿活力的代間社會生活，以促進生命全程的社區參與，並防止高齡者的社會孤立（Kaplan, Thang, Sanchez, Hoffman, 2021）。社區代間方案，可能產生的效益包括：

- 1.對於老年人：認知、社會和物理情境（正向的健康效益）、重申價值、增強自尊心、減少社會孤立、教學與學習的能力，以及建立有意義的關係。
- 2.對於兒童／青少年：擴大關懷者的圈子、獲得歷史、正面的榜樣、文化和價值觀、提高自尊和自我價值、提升溝通技巧、提升學術和社交技能、了解老化和壽命發展，以及促進對家庭中代間關係的反思，對自己的祖父母關懷。
- 3.對於社區：滿足社區需求、提供／加強老年人照護、促進青少年發展、提供家庭支持、兒童保育，以及建立社區（跨年齡層和文化）的歷史文化傳承。

新加坡推展的社區「代間方案」策略眾多，包括：藝術活動，以及長者提供高風險家庭兒童，說故事課業指導及關懷等服務。再者，以學校為主的策略，包括：Methodist Girls' School 的「代間中心——ICZ 空間」，供社區長者進行代際活動，如烹飪、園藝；學生參加學校活動小組（如：IG 合唱團）和課程，學校對社區長者開放空間和餐廳等。新加坡國立大學也提供學分課程，促進代間聯繫。

（三）多世代共享的空間設計策略

「聖若瑟之家」（St Joseph Home）（2017 年）是新加坡第一家在同一地點設有嬰幼兒保育中心，以及失智症照護和臨終關懷、物理和藝術治療的療養院。

他們將代間互動融入幼兒保育課程，包括：見面會或現場自發性互動，以及結構化、有計劃的項目安排到療養院居民和兒童的日常生活中，活動包括：唱歌、講故事、藝術活動、體育活動和音樂活動。

2022 年 9 月推出的「聖約翰聖瑪格麗特村」(St. John St Margaret Village)，是新加坡第一個專門建造的 3G 設施，擁有 400 床的療養院、老人日間照護中心及托兒所(200-300 名兒童)。發展不同世代的共享空間，仍存在需要突破的障礙，包括：需要加強員工生命歷程知識和技能的培訓，如：兒童保育和老年護理人員需要了解 IG 計劃的技能和知識，以及可能的挑戰和解決方法。再者，官僚體系的障礙，例如：缺乏 IG 建築規範，管理部門各自為政，缺乏以 IG 為重點的規劃和設計等。

四、家庭中的代間連結

家庭中的代間連結，Thang (2016) 在 *Grandfathers* 一書中的 "What Do Grandfathers Value? Understanding Grandfatherhood in Asia Through Chinese Grandfathers in Singapore" 研究，透過對祖父的角色和功能的認知，探討了亞洲祖父與孫輩的參與。特別考慮了文化連續性、價值傳播及其對祖父身份的意義建構和實踐的影響。透過對新加坡華裔祖父寫給孫子的三十封信內容分析，提出三個可供討論的廣泛主題：遺產、價值傳承以及提供關懷和支持。主題在新加坡華人特有的男性氣質、教育和社會歷史環境脈絡中，揭示了「傳承創新」(Generativity) 的概念，賦予當代新加坡華人祖父代間聯繫的顯著意義。

隨著社會變遷，家庭中的代間連結也存在許多障礙因素，包括：核心家庭規範變遷、代間聯繫的機會減少，祖父母和成年子女因育兒方式差異而產生的關係緊張，以及祖父母不願意放棄個人自由，擔心身體需求和壓力等。新加坡政府也致力於推動祖父母節等祖孫互動方案，2023 年的 ACTION PLAN FOR SUCCESSFUL AGEING 方案倡導 "3 'C's": Care, Contribution, Connectedness"，鼓勵年輕人欣賞家中的老人，為父母和祖父母提供積極的育兒計劃，以及為老年家庭提供諮詢和調解支持，協助老年世代順利過渡到祖父母身份。

參、啓示：論臺灣家庭的代間關係研究

湯玲玲博士的專題演講提出呼籲：在面對高齡社會的發展願景，以「代間視角」(the Intergenerational Lens)及「世代連結」(Connection)的觀點進行研究探究及推廣策略十分重要，同時，不論是由「社區」或「家庭」切入，代間互動、連結，皆是研究及實務推動的重要議題。就臺灣而言，面對人口高齡化帶來的機會與挑戰，2021 年提出的「高齡社會白皮書」，揭示了我國高齡社會發展的四大願景：「自主」、「自立」、「共融」及「永續」(衛生福利部，2021)，其中「共融」便是強調：國家應促進高齡者與其他年齡群體的互動，去除社會對於高齡者的刻板印象與年齡歧視，強化世代連結與融合。

一、臺灣家庭內的代間關係研究的發展

以家庭內的代間關係研究來看，臺灣自 1984 年以來，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長期支助、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的一項全臺抽樣調查研究計畫——「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簡稱「社會變遷調查」)，旨在提供社會變遷研究資料檔案為主要目的。有鑑於「家庭」不僅是重要社會制度，更是華人社會組成與運作互動的基本單位，因此，自 1984-5 年第一期調查起，家庭議題即為正式規劃的核心主題之一。在 2006 年第五期第二次「家庭組」調查計畫，臺灣與日本、韓國及中國等共同發起「東亞社會調查」(East Asian Social Survey, EASS)計畫，以「代間關係」為重點，立基於「連帶(Solidarity)」的觀點，將家庭中父母與成年子女的代間關係及孝道規範、家庭價值等題組加以統整深化，並進行跨國比較。2021 年「社會變遷調查」第八期第二次「家庭組」調查更加入「祖父母」題組，完整建構多世代家庭的題項設計。「社會變遷調查」一系列的「代間關係」發展，提供了臺灣學術領域豐富的資源，也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果，包括：探討家庭中不同世代的支持、代間關係與中老年福祉的關聯(如：林如萍, 2012；Lin, Chang, & Huang, 2011)，進行東亞家庭的代間關係之跨國比較研究(如：Lin, & Yi, 2011；Lin, & Yi, 2013)，以及家庭代間關係與照顧政策的探究(如：Lin, Yu, & Huang, 2021)等。

二、祖孫關係研究

聚焦家庭代間關係的祖孫關係而言，臺灣的傳統俗諺「做豬呷餵，做嬖遶孫」，將祖父母照顧孫子女比喻為「天職」，是天經地義之事。農家老人談及祖孫關係時亦因照顧經驗而充滿情感，論及分家產部份老人亦有「長孫責任重」、「公嬖疼大孫」等觀點，主張：財產分配應「搭大孫份」（高淑貴、林如萍，1998）。2019 年全臺調查研究顯示：祖父母認為自己的角色主要是「救火隊」（80%）、「照顧者」（73.5%）（林如萍、傅從喜，2019）。整體來說，臺灣目前有關祖父母的研究，相較於西方來說仍十分有限。對於「祖父母照顧」的研究多僅關注於「隔代教養」議題，研究也以質性研究居多。少數以量化研究主要是關注：照顧孫子女對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如：Ku, Stearns, Van Houtven, Lee, Dilworth-Anderson and Konrad, 2013; Tsai, 2016）。

隨著社會變遷，家庭型態核心化，祖父母對個人的照顧角色認知及照顧行為，與文化規範的關聯性以及對高齡者的福祉影響為何？林如萍和黃秋華（2022）運用「社會變遷調查」第八期第二次調查的「家庭組」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臺灣祖父母認同祖父母的照顧角色，且認同程度與孝道、生育價值等規範價值有關。祖父母提供孫子女照顧具有臨時性救急、支持補充的重要功能，而祖母仍是孫子女照顧的主力，但祖父亦扮演合作的角色。代間居住安排攸關祖父母提供照顧，並且，祖父母與成年子女存在勞務協助互惠。祖父母越認同祖父母角色、生活滿意越佳，但照顧對生活福祉的影響存在性別差異。對於祖父而言，在非因規範責任的前提下，投入照顧越多、生活福祉越佳，可能是因擔負主要照顧者角色其實有違傳統的家庭性別分工，因而產生的效應。就祖母來說，照顧孫子女的時數越多、生活滿意越差，而配偶的照顧投入有助祖母的生活滿意，換言之，減緩祖母照顧負擔是避免照顧孫子女而產生負面影響的關鍵。持續探究祖父母的角色及性別等社會文化規範的影響機制，並分析在不同家庭結構中祖父母照顧者的異質性，深入了解照顧孫輩與祖父母福祉之間的關聯，進而為不同祖父母照顧者提供適切的支持政策作為，應是重要的議題。

三、展望：家庭代間關係與老年照顧

2025 年臺灣即將步入超高齡社會，家庭的組成與結構也隨之改變。越來越多人在生命歷程中可能經歷三代或更多之家庭結構，家庭的世代數增加、但各代人數卻下降，家庭結構往「垂直化」發展（Vertically Extended）也呈現出家庭組成「頭重腳輕」（Top-heavy）的現象。再者，肇因於離婚、再婚等家庭的組成多樣性，多世代家庭中不同世代之間的互動關係日趨複雜，代間關係不僅是高齡社會關鍵的家庭議題，更與老年照顧的福利政策存在關聯。研究指出：個人的需求、資源以及家庭的代間關係及孝道規範等，皆對人們的老年福利態度及照顧偏好具有影響力（林如萍，2021）。家庭中的不同世代之間的互動經驗，包括：代間情感、衝突，以及相互支持皆是人們考量「家庭」與「政府」在照顧責任分工以及對於老年照顧期望的基礎。整體來說，持續探討臺灣的家庭代間關係，並分析民眾對於福利國家政策的態度、老年照顧的期望，以及家庭代間關係對於個人態度的影響，將有助於臺灣發展福利政策之辯證中，提供本土之思維觀點。

參考文獻

- 林如萍（2012）。臺灣家庭的代間關係與互動類型之變遷趨勢。**臺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婚姻與家庭，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系列三之一**（ISBN：978-98-603-2403-7）（75-124）。臺北市：中央研究院。國科會 98-2410-H-003-064。
- 林如萍（2021）。高齡社會的家庭代間關係與老年照顧。**社區發展季刊**，176，66-77。
- 林如萍、黃秋華（2023 年 1 月 6 日）。阿公阿嬤帶孫：祖父母角色、照顧孫子女與生活福祉。家庭與生活：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三十九次研討會會議。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https://www.ios.sinica.edu.tw/msgNo/20230106-1>
- 林如萍、傅從喜（2019）。臺灣民眾之祖孫互動專題調查分析。教育部委託計畫。
- 高淑貴、林如萍（1998）。農村老人與成年子女之代間交換。**農業推廣學報**，15，77-105。
- 衛生福利部（2021）。**高齡社會白皮書**。取自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1372&pid=11419>

- Brandt, M. (2021). *Intergenerational Contact Zones. Place-base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Social Inclusion and Belonging*. In Kaplan, M., Thang, L. L., Sánchez, M., & Hoffman, J. (E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Lin, J. P., Chang, T. F. & Huang, C.H. (2011).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Older Women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47-58.
- Lin, J. P., & Yi ,C.C. (2011). Filial Nor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o Aging Parents in China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109-120.
- Lin, J. P., & Yi ,C.C. (2013).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8(3), 297-315. NSC 98-2410-H-003-064.
- Lin, J. P., Yu, C. W. & Huang, C. H. (2021)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impact on preferences for meeting future care needs among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in Taiwan. In Merrill D. S. (Eds.), *Aging Families in Chinese Society*.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pp. 234-250.
- Kaplan, M., Thang, L.L., Sánchez, M. & Hoffman, J. (Eds.) (2020). Intergenerational contact zones. *Place-base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social inclusion and belonging*.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Ku, L. J. E., Stearns, S. C., Van Houtven, C. H., Lee, S. Y. D., Dilworth-Anderson, P., & Konrad, T. R. (2013). Impact of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on the health of grandparents in Taiwan.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8(6), 1009-1021.
- Mandryk, J., McCormick, T., & Saldiba, A. (2023). What Are the Emerging Demographics?. *Global Aging Population*. The Lausanne Movement.
- Thang, L. L. (2016). What Do Grandfathers Value? Understanding Grandfatherhood in Asia Through Chinese Grandfathers in Singapore. In Buchanan, A., Rotkirch, A. (eds) *Grandfathers*. Palgrave Macmillan Studies in Family and Intimate Life.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 Tsai, F. J. (2016). The Maintaining and Improving Effect of Grandchild Care Provision on elders' Mental Health-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Study in Taiwan.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64, 59-65.

Janet F. Werker 教授特邀演講 「語言習得的感知基礎」學術活動紀實

楊雯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

周姍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

王馨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

壹、序曲

民國 113 年 10 月 5 日，「2024 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隆重舉行，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及其他相關單位聯合主辦。本次盛會邀請兩位國際知名學者擔任特邀講者，其中之一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 Janet F. Werker 教授。Werker 教授長年致力於運用行為以及大腦神經科學技術，探討嬰幼兒語言習得機制，40 年來累積了豐富的實證研究成果，為我們解開了人類如何開展語言能力的神秘面紗，榮獲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及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等多項殊榮，並獲得 2019 年心理科學協會（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的威廉詹姆斯研究獎（William James Fellow Award）和 2017 年加拿大發展心理學傑出貢獻皮克林獎（Pickering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in Canada）等獎項。

在此次「語言習得的感知基礎（Perceptu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演講中，Werker 教授從關鍵期（critical periods）的角度，探討嬰幼兒如何透過語音感知與多感官輸入（如視覺、聽覺和動作）建立語言能力，

*本篇通訊作者：王馨敏，通訊方式：s.wang@ntnu.edu.tw。

說明 6 個月大嬰兒能夠區辨任何語言的音素（phoneme）差異，是語言的世界公民，然而此能力於 8 個月大至 12 個月大逐漸消失，僅能專精於環境中能夠觸及的語言。她強調，不同感知經驗對語言發展具有長期影響，因此我們需特別關照聽覺或動作障礙兒童的語言發展。此外，她指出語言習得受神經系統成熟與環境經驗的交互影響，強調大腦可塑性在此過程中的關鍵角色。整場演講透過一系列實驗展示這些理論的實證依據及其應用，帶領與會者一步一步回顧過往研究的進程，闡釋迄今實證研究對於嬰幼兒語言發展的意義。

貳、特邀演講內容

語言是人類有別於其他物種的獨特能力，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語言讓我們能夠溝通交流，傳承知識與文化，連結著我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而語言習得仰賴個體的感知系統（perceptual system），引領我們探索母語的複雜世界，深遠影響著日後的閱讀、學習成就以及各方面的發展。

一、嬰兒天生具備學習語言的能力

從嬰幼兒時期開始，我們就可以看見孩子驚人的語言學習能力，每一個年齡階段皆有不同的語言發展里程碑。孩子大約 8 個月大左右開始牙牙學語；大約 10 至 12 個月左右能夠說出第一個單詞；一歲半的時候可以組合單詞表達；到兩至三歲即可說出較複雜的句子，例如：去商店買糖果。相較於語言表達，語言理解則更早就開始展現，大約 4 個月大的孩子聽見自己的名字就能夠做出反應；到 6 個月大時能夠聽懂一些簡單的單詞。

嬰兒似乎一出生就準備好要學習語言，過去的實證研究證實大腦天生擁有良好的「語言準備度（readiness for language）」。剛出生的寶寶對語音就已展現明顯的偏好，遠勝於非語音，表示一出生便能區辨語音和非語音¹。更有趣的是，相較於其他語言，新生兒偏好他們在子宮裡聽到的特定語言，突顯自懷孕

¹ 延伸閱讀：Vouloumanos, A., & Werker, J. F. (2007). Listening to language at birth: Evidence for a bias for speech in neonates. *Developmental Science*, 10(2), 159-164.

第三週期起環境輸入便開始影響大腦運作²。另外，透過功能性近紅外光譜儀（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的神經影像技術，觀察新生兒對不同聽覺刺激（聽正常語音、倒播放語音和安靜無聲）的大腦活動，亦發現相較於其他聲音，嬰兒只在聽到正常語音時，大腦中處理語言的區域會活化³，此現象表示，人類在生物學上已經準備好接觸語言，具備處理語言所需的神經機制，為日後語言學習奠定了基礎。

二、語音區辨的起源至知覺調適

語音區辨（phonetic discrimination）是指分辨語言中音素細微差異的能力，例如：「ba」和「da」等，為語言習得的重要基石。年幼的嬰兒能夠區辨任何語言中的音素差異，而這樣的能力隨著母語接觸量的累積，大約在一歲左右時逐漸消退，使個體成為母語聲音的專家，提高對母語語音的區辨能力，同時對其他非母語的語音區辨能力減弱，此歷程被稱之為知覺調適（perceptual attunement）。

Werker 教授早年進行一項著名的研究指出6個月大的寶寶可謂是「世界公民」⁴，利用條件性轉頭程序（conditioned head turn procedure），發現6至8個月的母語為英語寶寶能夠區辨印地語（Hindi）和薩利甚語（Salish）兩種非母語的音素差異。然而，母語為英語寶寶在這兩種語言中的音素區辨能力在8到10個月之間逐漸減弱，

小知識



- **條件性轉頭程序（conditioned head turn procedure）：**用於評估嬰兒的聽覺區辨能力，首先，訓練嬰兒將聲音的特定變化（例如兩種語音之間的切換）與視覺增強物（例如玩具或閃光燈）聯結起來，每當聲音改變時，利用增強物鼓勵孩子轉頭。接著，只有當嬰兒聽到聲音變化時轉頭，增強物才會出現；也就是說，如果孩子在沒有任何變化時轉頭，則沒有增強物。研究人員透過此設計判斷嬰兒是否的確能夠區辨聲音異同，而不僅是隨機反應。

² 延伸閱讀：Moon, C., Cooper, R.P., & Fifer, W.P. (1993). Two-day-olds prefer their native language.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16, 495–500.

³ 延伸閱讀：Pena, M., Maki, A., Kovačić, D., Dehaene-Lambertz, G., Koizumi, H., Bouquet, F., & Mehler, J. (2003). Sounds and silence an optical topography study of language recognition at birth. *PNAS*, 100(20), 11702–11705.

⁴ 延伸閱讀：Werker, J. F., & Tees, R. C. (1984). Cross-language speech perception: Evidence for perceptual reorganization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life.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7(1), 49–63.

大約在 10 到 12 個月左右消失。反觀，母語為印地語和薩利基語寶寶能夠繼續區辨其母語中的音素，這項研究顯示嬰兒在語言發展過程中的「知覺調適」現象，說明語言環境在生命初期如何塑造大腦的語音處理能力。上述研究結果在許多實驗中得到重複的驗證，也同時在不同語言中獲得相似的結果⁵，驗證知覺調適對於語言習得的重要性。另外，針對英語單語、法語單語及英法雙語嬰兒的研究發現，6 到 8 個月時單語和雙語嬰兒皆可以區辨母語和非母語中的音素細微差別，然而到 10 至 12 個月左右，雙語嬰兒仍能夠像同齡的英語單語嬰兒一樣辨別/d/的牙齒和牙槽音，法語單語幼兒則已無法區辨，顯示雙語嬰兒保留了區辨兩種母語特有音素的能力，證實感知系統適應多種語言輸入的靈活性⁶。

母語語音區辨能力的發展在詞彙學習上扮演重要角色，若將語言比喻為一棟高樓，語音區辨能力則是建構大樓所需要的鷹架。過去實證研究發現，6 個月大時的語音區辨能力與兩歲時的詞彙理解語表達之間存在顯著預測力，顯示早期的知覺調適能力為未來詞彙學習奠定基礎⁷。為了深入了解這一現象，Werker 教授進行一系列實驗，探討不同語音區辨能力與詞彙學習之間的關係。其中一項研究比較母語分別為荷蘭語和英語的寶寶語音區辨能力，發現一歲半的荷蘭語寶寶能夠區辨荷蘭語中重要的短元音和長元音音素，並利用這樣的能力促進詞彙學習；相對地，因英語裡缺乏這種細微的音素差異，英語寶寶無法區辨短元音和長元音的不同⁸。

嬰幼兒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另一個重要的學習機制為統計學習（statistical learning / distributional learning），指能夠從環境經驗中發現和提取出規律的能力，這種學習機制幫助孩子進行「知覺調適」，使孩子能夠區辨自己母語中最常見和最有意義的音素，進而為未來的語音分類奠定基礎⁹。Werker 教授指出，6 至 8 個月大孩子，在經過 2.4 分鐘學習後，就能夠建立新的語音類別界限（phonetic category boundaries），學習新的音素區辨（如：非母語中的音素），

⁵ 延伸閱讀：Bosch, L., & Sebastián-Gallés, N. (2003). Simultaneous bilingualism and the perception of a language-specific vowel contrast in the first year of life. *Language and Speech*, 46(2-3), 217-243.

⁶ 延伸閱讀：Sundara, M., Polka, L., & Molnar, M. (2008). Development of coronal stop perception: Bilingual infants keep pace with their monolingual peers. *Cognition*, 108(1), 232-242.

⁷ 延伸閱讀：Tsao, F. M., Liu, H. M., & Kuhl, P. K. (2004). Speech perception in infancy predicts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year of life: A longitudinal study. *Child Development*, 75(4), 1067-1084.

⁸ 延伸閱讀：Dietrich, C., Swingle, D., & Werker, J. F. (2007). Native language governs interpretation of salient speech sound differences at 18 months. *PNAS*, 104(41), 16027-16031.

⁹ 延伸閱讀：Werker, J. F. (2024). Phonetic perceptual reorganization across the first year of life: Looking back.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75, 101935.

而此現象在 12 個月大時就消失了，因為語音知覺調適的關鍵期已過。Werker 教授於 2021 發表的研究中，以 4 個月大、9 個月大、12 個月大的英語嬰兒為研究對象，利用實驗操弄，在學習階段，讓原本應該區分的/ra/-/la/，不再需要被區分，4 個月大和 9 個月大嬰兒經過學習階段後，在測試階段，果然不再區分/ra/-/la/，但 12 個月大嬰兒仍舊會區分/ra/-/la/¹⁰。Werker 教授認為這反應在關鍵期之後，已經建立的語音類別界限已經穩固，不再容易隨環境調整。緊接著，Werker 教授與聽眾分享語言習得關鍵期概念。

三、語言習得的關鍵期

Werker 教授與美國哈佛大學神經科學家 Hensch 教授合作，針對語言發展的關鍵期提出新興的見解，指出關鍵期並非恆常固定不變的，其開啓和關閉皆是受到特定神經迴路內興奮 (excitatory) 和抑制 (inhibitory) 間的複雜平衡所調節，而成熟和經驗在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¹¹。大腦具有持續學習的傾向，但這一過程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因此在關鍵期開啓前，抑制功能會顯現，防止大腦因學習而消耗能量；當抑制和興奮的平衡達到最佳時，關鍵期便會開啓，使大腦對於與該能力相關的經驗特別敏感。

影響語言習得關鍵期的因素錯綜複雜，大致可分為生物和環境因素，Werker 教授測試出生於 28 至 32 週的早產嬰兒（無其他健康問題）的語音區辨能力，結果顯示嬰兒在 10 到 12 個月大時才逐漸失去對非母語音素的辨識能力，這是因為相對足月兒，早產兒在出生後需要額外的時間等大腦成熟，大腦較晚進入語音區辨關鍵期，關閉時間也延後，所以才會到 10 到 12 個月大時才逐漸失去對非母語音素的辨識能力¹²。另外，在妊娠期接觸特定抗憂鬱藥物 SSRIs 的嬰兒，在 6 到 8 個月時即失去非母語音素辨識能力，因為抗憂鬱藥物加速關鍵期開啓時間，因此也提早結束大腦語音調整關鍵期。反之，未服藥的憂鬱母親之嬰兒直到 10 到 12 個月才展現語音區辨能力，可能因為母親憂鬱症減

¹⁰ 延伸閱讀：Reh, R. K., Hensch, T. K., & Werker, J. F. (2021). Distributional learning of speech sound categories is gated by sensitive periods. *Cognition*, 213, 104653.

¹¹ 延伸閱讀：Werker, J. F., & Hensch, T. K. (2015). Critical periods in speech perception: New direc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6, 173-196.

¹² 延伸閱讀：Pena, M., Werker, J. F., & Dehaene-Lambertz, G. (2012). Earlier speech exposure does not accelerate speech acquisitio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2(33), 11159-11163.

慢嬰兒大腦發展速度，進而延後大腦語音調整關鍵期開啓時間¹³。上述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大腦生物結構成熟需要一定的時間，而藥物、孕婦情緒等因素皆會影響大腦生物結構的成熟速度。

四、語音感知中的多感官整合

在自然情境下，嬰兒從出生就開始於多感官的環境中接觸語言，透過整合聽覺、視覺和動作訊息，逐步建構對口語的全面理解。語言的多感官整合能力從嬰兒期一直持續至成年期，我們會透過說話者臉部的視覺線索，例如：嘴唇動作、表情，來協助理解語言訊息，特別是在吵雜的環境中。Werker 教授提及，著名的麥格克效應（McGurk Effect）¹⁴反映聽覺感官中的經典錯覺現象，生動地說明視覺線索如何影響聽覺感知。與成人相同，嬰兒亦表現出視聽匹配（auditory-visual matching）能力，優先看向發出語音的對應面孔。有趣的是，視聽匹配能力同樣經歷知覺調適，約 10 個月大時嬰兒會開始特別聚焦於與母語相關的視聽訊息。

除了聽覺和視覺之外，動作訊息在語音感知中也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嘴巴的動作。針對成人的研究表示，口腔發音動作和語音感知存在密切的

關聯性，我們可以透過操弄口腔動作影響人對於語音的辨識力。Werker 教授曾探究口腔動作對嬰幼兒語音感知的影響，發現阻止嬰兒進行口腔動作會破壞他們辨別語音的能力，顯示口腔動作某種程度參與知覺處理的歷程。後續實驗亦顯示，以平奶嘴限制舌尖動作會顯著降低嬰兒對印度語裡齒音與卷舌音的區辨

小知識



- **麥格克效應（McGurk Effect）：**
Harry McGurk和John MacDonald於1976年發現的一種感知現象，展示了大腦如何在言語感知中整合聽覺和視覺訊息。當人們在觀看影片時，眼睛看到影片中人嘴型為/ga/的時候，耳朵卻聽到/ba/聲音，他們可能會將這個聲音感知為/da/或兩者的另一種混合。當一種語音的聽覺成分與另一種語音的視覺成分對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導致人們感知到混合了這些相互衝突的線索的第三種聲音。

¹³ 延伸閱讀：Weikum, W. M., Oberlander, T. F., Hensch, T. K., & Werker, J. F. (2012). Prenatal exposure to antidepressants and depressed maternal mood alter trajectory of infant speech perception. *PNAS*, 109(suppl.2), 17221-17227.

¹⁴ 小知識資料來源：McGurk, H., & MacDonald, J. (1976). Hearing lips and seeing voices. *Nature*, 264(5588), 746-748.

力，但對不依賴舌尖動作的英語/ba/音則影響較小¹⁵。這些發現顯示嬰兒在處理語音輸入時，口腔同時模擬說話者發音動作模擬，試圖以此加強語音感知，說明語音處理同時仰賴發音器官動作訊息，是多感官整合之下的產物。

參、終章

在這場專題演講中，Werker 教授深入淺出地引領我們揭開人類如何展開語言學習旅程的神秘面紗，Werker 教授從嬰幼兒是天生的語言學家談起，接著分享語音知覺調適，強調語音習得存在「關鍵期」，即大腦在此階段處於最佳的語音輸入接受狀態，且語言學習是一個多感官整合的過程，不僅依賴聽覺，還需要視覺和口部構音動作的協同作用。Werker 教授豐富的實證研究成果對嬰幼兒發展，特別是具有聽力或視覺障礙的嬰幼兒，具有重要啓示。對於聽力障礙兒童，早期提供多樣的語言輸入（如手語與口語）有助於語言發展；而對於視力受限的嬰幼兒，提供多感官的語言支持有其必要性；此外，構音器官障礙嬰幼兒的語言發展，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Werker 教授從大腦神經科學的角度揭示嬰幼兒語言習得的感知基礎，包括語音區辨、關鍵期及多感官整合等現象，為語言學習機制提供新穎的視角，拓展了我們對語言發展的科學理解，短短 60 分鐘的演講，教科書中的人物現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漫談 40 年來科學界對於人類語言學習機制的認識與理解，除了吸收知識也讓人讚嘆人腦運作的奧妙，我們對於人類大腦運作機制的理解真的是鳳毛麟角，未來希望能有更多研究者一起投入嬰幼兒大腦發展研究，一起解開人腦奧秘。

對話 Q&A

Werker 教授的演講引起與會者熱烈的迴響，以下簡要紀錄 Werker 教授和與

¹⁵ 延伸閱讀：Bruderer, A. G., Danielson, D. K., Kandhadai, P., & Werker, J. F. (2015). Sensorimotor influences on speech perception in infancy. *PNAS*, 112(44), 13531-13536.

會者的提問交流。

首先，關於安撫奶嘴使用對語言發展的影響，Werker 教授認為偶爾使用安撫奶嘴有助於穩定情緒，不見得會帶來負面影響，因為穩定情緒和安全感是學習的基礎。近期研究發現奶嘴使用與未來詞彙量之間存在關聯性，但目前尚未有研究者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未來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擴充我們對此議題的了解。

接著，討論嬰兒如何感知聲調及其與感覺運動的關聯性。Werker 教授表示，即使非聲調語言環境中的嬰兒也能區分聲調，但若未持續接觸，這能力會逐漸下降；反觀，在聲調語言環境中長大的嬰兒約四個月大時便表現出對母語聲調的偏好，這樣的偏好延伸到區分不同方言的聲調，甚至可區分這類部分聲調重疊的方言（如：普通話與粵語）。簡而言之，聲調感知受感覺運動因素的影響較小。

最後，關於嬰兒如何透過偏好或分類能力區分聲音，特別是父母的聲音。Werker 教授指出，新生兒對母親聲音有強烈偏好，四個月大時，嬰兒能將特定聲音與臉孔連結。Werker 教授提到過去一項研究發現，嬰兒對視覺對象進行分類的的能力與其非母語感知能力下降的時間點存在關聯，但此類認知任務的相關性尚需更多研究的驗證。

若欲了解更多關於 Janet F. Werker 教授及其實驗室所進行的相關研究，請掃描以下 QR code：



邀稿日期：2024 年 10 月 07 日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

徵稿簡則

一、「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所發行之學術性期刊，提供國內外教師及研究人員發表未曾發表過之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的原創性研究論文。本刊以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為主要領域，議題包含：認知發展、語文發展、社會情緒發展、身體動作發展、大腦發展與學習、幼兒教育、教保環境與經驗、家庭資源與管理、婚姻關係、親密關係、家人關係、親職與教養、家庭型態、家庭動態歷程、家庭教育、家庭政策與服務、多元文化教育或其他相關議題，旨在提升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的品質及促進學術與實務之交流。一年發行一期，全年徵稿。

二、著作財產權事宜

- (一) 投稿之論文，不得有一稿多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違反學術倫理等情事。如有違反，一切責任由作者自負，且本刊於三年內不接受該作者來稿，並視情節嚴重程度求償。
- (二) 已接受刊登之論文，作者需簽署「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交予本刊，該篇論文之著作財產權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所有。「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可至本刊網站「相關表單」查詢下載。

三、文稿類型

- (一) 研究論文：原創性（包括基礎與應用研究）且未發表過之學術論文。中文文長以不超過兩萬五千字為原則，英文文長以不超過八千字為原則(含中英文摘要、圖表與參考文獻)。
- (二) 研究紀要（research brief）：整理初步研究結果，旨在引導後續研究與討論之簡要報告。中文文長以不超過一萬字為原則，英文文長以不超過六千字為原則（含中英文摘要、圖表與參考文獻）。
- (三) 文獻評論（critical review）：以新興或重要之學術議題撰寫之論文，針對相關文獻進行深入評析，並提出未來研究之潛力與展望。中文文長以不超過一萬字為原則，英文文長以不超過六千字為原則（含中英文摘要、圖表與參考文獻）。

- (四) 書評：採邀稿制，就國內外出版之相關學術專書所撰寫之評論。中文或英文以五千字為原則（包括圖表）。
- (五) 學術活動紀實：國內、外學術活動及專題演講紀錄，以五千字為原則（包括圖表）。

四、投稿原則

- (一) 本刊已加入本校圖書館學術期刊線上投稿審核與出版系統（OJS），僅接受線上投稿，網址為：<http://ojs.lib.ntnu.edu.tw/index.php/hdfs>。
- (二) 稿件格式：來稿內文以 A4、12 號字、1.5 行間距電腦打字。中文字體為標楷體、英文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並於內文左側編入行號、內文中下側編入頁碼。文稿格式請依 APA 第七版格式（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th ed.）撰寫。來稿除論文本文外，尚需附加如下文件（需簽名處，請親筆簽名掃描後，再上傳）。

1. 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2. 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1) 論文題目。

(2) 作者姓名：作者姓名中英文並列。一位以上者，請在作者姓名處及任職機構前加註釋(1)(2)(3)等符號，以便識別。通訊作者並請加註。

(3) 任職機構及單位：請寫正式名稱，分就每位作者寫明所屬系所或單位。

(4) 通訊作者及每位作者之通訊地址、電話和電子郵件地址。

(5) 頁首短題（running head），以不超過十五個字為原則。

(6) 作者註（author note）：說明與本篇研究相關的資訊，例如：本研究的經費來源（如獲科技部補助請註明計畫編號）、改寫自那篇學位論文（本論文係 OOO 提 OOO 大學 OOO 研究所之碩（博）士論文的部份內容，在 OOO 指導下完成）、曾在那些研討會上發表。

- (三) 文稿全文字數規範請見文稿類型，「研究論文」、「研究紀要」及「文獻評論」需包含中英文摘要。摘要不分段，段首不縮排，中文摘要以不超過 500 字、英文摘要以不超過 300 字為原則。摘要之後請列明關鍵詞（KEY WORDS），關鍵詞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並依筆劃（或英文字母）順序排序。

五、文稿審查

(一)「研究論文」、「研究紀要」及「文獻評論」來稿，審查程序如下：

1.預審：稿件格式審查。

2.實質審查：通過稿件格式審查後，由本刊負責該稿件的主編或副主編決定是否送審。若決定送審，請稿件議題相關領域編輯委員推薦審稿人，並由編輯委員會聘請二位審稿者進行匿名審查。若審稿者對於採用與否意見有出入時，則另聘第三位審稿者匿名審查。依據匿名審查之結果，交由本刊編輯委員會進行最後之決定審。

3.決定不送審之稿件，則以電子信件通知。

(二)「書評」及「學術活動紀實」來稿，以本刊編輯委員會審查為主。

(三)文稿通過審查者，依本刊撰稿體例完成修改的最後定稿之稿件，需提供 WORD 電子檔一份，以方便排版作業。

(四)「研究論文」、「研究紀要」及「文獻評論」文稿通過審查者，需於接獲「投稿文章接受函」一星期內，以郵政劃撥方式，繳交英文摘要編輯費用新臺幣 500 元整（劃撥帳號：00032050；戶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學系），逾期將視情況延後論文刊登順序。

(五)文稿的一校與二校稿將交作者自行校閱，校稿須在通知期程內寄回。

六、印製

(一)文稿的一校與二校稿將交作者自行校閱，作者應負論文排版完成後的校對責任，校稿須在通知期程內寄回，本刊僅負責格式上之校對。

(二)本刊將致贈作者當期刊物一本及論文之 PDF 檔，不另致稿酬及抽印本。

七、連絡資訊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

E-mail：hdfs@ntnu.edu.tw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

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投稿題目 (中、英文)	中文： 英文：			
姓 名 (中、英文)	中文： 英文：	投稿日期	年 月 日	
共同撰稿者	請依作者之排行順序列出全部作者，如為單一作者免填 1. _____ 2. _____ 3. _____ 4. _____ (通訊作者請加註)			
任職機構 (中、英文正式名稱及所屬系所、單位)	中文： 英文： (於作者姓名處及任職機構前加註釋(1)(2)(3)等符號。通訊作者並請加註)			
稿件字數	稿件全文(含摘要、關鍵詞、正文、註釋、附錄、圖表等) 共 _____ 字(請務必填寫)			
通訊地址	中文： 英文： (每位作者之通訊地址，加註釋(1)(2)(3)等符號)			
聯絡電話	機關： 行動電話：	住宅： 傳 真		
電子郵件	(每位作者之通訊地址，加註釋(1)(2)(3)等符號)			
頁首短題	(以 15 字為原則)			
作者註				
茲保證以上所填資料無誤，且本文未同時一稿多投、違反學術倫理、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如有違反，責任由作者自負。				

1. 投稿者投稿時務必在稿件正文之外填寫本表，將本表連同稿件一併寄交編輯部：個人基本資料請勿出現在正文中，以利作品匿名送審事宜之進行。
2. 本表請自行影印或上網下載，下載網址為臺師大幼家科學系網站
(網址：<https://www.cfs.ntnu.edu.tw/>)。
3. 作者一位以上者，請分別寫明每位作者之作者姓名、任職機構、通訊地址、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地址，並加註釋(1)(2)(3)等符號，以便識別。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104.03.24 103 學年度第三次學報會議修正通過

茲同意投稿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之

○○○○○○○○(論文篇名)

一文，在著作人於本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將本著作財產權全部無償讓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並得再行使相關發行權利。惟著作人保有下列之權利：

- 1.本著作相關之商標權與專利權。
- 2.本著作之全部或部分著作人教學用之重製權。
- 3.出版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分用於著作人之書中或論文集中之使用權。
- 4.本著作用於著作人受僱機關內部分送之重製權或推銷用之使用權。
- 5.本著作及其所含資料之公開口述權。

著作人同意上述任何情形下之重製品應註明著作財產權所屬，以及引自「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

著作人擔保本著作係著作人之原創性著作，僅投稿「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且從未出版過。如果本著作之內容有使用他人已具著作權之資料，皆已獲得著作權所有者之（書面）同意，並於本著作中註明其來源出處。著作人並擔保本著作未含有誹謗或不法之內容，且未侵害他人之權利。

如果本著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下列簽署之著作人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本同意書之條款，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且獲得授權代為簽署本同意書。如果本著作係著作人於受僱期間為僱用機構所作，而著作權為該機構所有，則該機構亦同意上述條款，並在下面簽署。

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係屬（請勾選一項）

- ☐ 著作人所有
☐ 著作人之僱用機構所有

立同意書人(著作人或僱用機構代表人)簽章：_____

著作人姓名或僱用機構名稱：_____（正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No.25 . December, 2024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DDIE Model in Developing and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ldren's Emotional Education Programs

Jo-Chien Liu/ Miao-Ju Tu.....1

The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Impact of a Daughter Raised by a Drug-Addicted Single mother
- A case Study of a Drug-Addicted Young Girl

Ching-Mei Cheng.....45

Influence of Parental Conflict on Adolescents' Interpersonal Distress: Applying the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Model

Rong-Kou Liu.....80

Academic Activity Documentary – Keynote Speech by Thang Leng Leng at 202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ld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Ju-Ping Lin/Chia-Wen Yu/Yi-Chun Chen.....122

Academic Activity Documentary – Keynote Speech by Janet F. Werker at 202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ld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Wen-Hsuan Yang/Shan-Shan Chou/ Shinmin Wang.....131

Department of Child and Family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SSN 2076-8591